



童世骏 何锡蓉 等著

# 中国发展的 精神因素

ZHONGGUO FAZHAN DE  
JINGSHEN YINSU



世纪出版

上架建议：中国政治

ISBN 978-7-208-10877-6



9 787208 108776 >

定价：35.00元

易文网：[www.ewen.cc](http://www.ewen.cc)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童世骏 何锡蓉 等著

# 中国发展的 精神因素

ZHONGGUO FAZHAN DE  
JINGSHEN YINS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童世骏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877-6

I. ①中… II. ①童…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论-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5545 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封面设计 范昊如

**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

童世骏 何锡蓉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182,000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77-6/D·2112

定价 35.00 元

## 序言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神州大地“社会存在”的巨大改观,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社会意识”的深刻变化;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得到了丰富而生动的体现。本书所讨论的“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属于这种“社会意识”的范畴。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精神因素”一方面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又渗透到这些状况之中,成为“社会存在”区别于“自然存在”的内在依据,也成为中华民族崭新生命的内在灵魂和外在风采。同时,“精神因素”既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也是中国发展的结果和表征。对走过的发展历程无论是进行因果说明还是进行意义理解,对未来的发展道路无论是进行总体展望还是进行步骤筹划,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状况及其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考察视角和研究领域。全面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历史进程,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包括许多方面和层次。在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这些方面和层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与改革开放时期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发生着上面所说的种种相互作用。在肯定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在整个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这种总体地位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对其中的不同方面和层次在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特殊作用作出一些区分。大致来说,我们可以把1978年以来的改

改革开放分为三个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可称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着重从“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的角度讨论“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可称为改革开放的第二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着重从“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时期,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可称为改革开放的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着重从“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来讨论“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

当然,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和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这三者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来说,都非常重要。比方说,不仅对于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启动和起步,而且对于30多年后即今天的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发展的精神动力显然都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在解释我们为什么能取得举世公认的发展成果的时候,而且在展望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关注各个领域的巧妙的机制设计和体制安排,而且要寻找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的宝贵的人性潜力和精神品质。同样,不仅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绩的今天,而且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发展的精神境界的问题也都是一个虽然看上去不那么直观和紧迫,但却是不应忽略和不该轻视的重要问题。

但是,比较起来,改革开放第一时期思想领域的最迫切任务,确实是寻找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无论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还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巩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都特别重要。改革开放以后几个时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初期在这些方面奠定的精神基础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不断得到更新。

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个关键任务是要像对待能源、材料和环境等物质资源那样,高度重视对人民群众的追求、情感和理想等精神资源的发掘提炼、有效利用和悉心守护。物质资源滥采滥用的危害性有目共睹,因此克服起来不算太难,但精神资源滥采滥用的危害性则不那么容易界定,因此更值得我们高度警觉。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全速发展的时期。从 1992 年到 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1%。到 200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5 933 亿元,比 1989 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 9.3%,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各个方面努力奋斗、开拓创新、战胜困难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久经考验的民族性格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发挥作用的结果。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是广大普通劳动者成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是我们经受住国际、国内风浪考验的一个重要基础。前无古人的改革事业,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浪潮,既激发了中华儿女的创业激情,也升华了古老民族记忆中的忧患意识。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全球化浪潮迅猛波及各国、信息技术全面影响生活、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都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和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既大胆尝试、勇敢闯关,又虚心学习、认真反思;既在辉煌成就面前居安思危,又在风云突变之际沉着应对;既努力降低改革成本并使之换取最大收益,又广泛借鉴海外经验使之适应本国国情。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凭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使命感,党领导人民不仅勇敢地突破原有发展模式和习惯思维方式,而且及时地把特殊条件下的改革成就努力转化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理性承

诺和制度安排。这些努力和成就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品质,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精细提炼,并发扬光大。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了中共十七大召开的2007年10月,中国经济达到了总量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三的发展水平,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原先非常突出的“发展不足”的问题有所缓解,而原先尚未引起普遍重视的“发展不当”的问题,一方面在有些领域和有些地区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从总体上说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好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思想条件和精神文化条件。就“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这个主题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精神效应,也是新世纪中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精神条件;这些变化的出现,有利于对中国的发展目标作出更加全面平衡的理解,有利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形成对中国的发展目标更加恰当合理的共识,同时也为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新的精神条件和精神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各阶层人民的精神世界,他们对自己现在生活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对过去生活有什么样的记忆和理解,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样的想象和期待,也对我们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现代化建设更高目标,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任务。为了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一些文化矛盾,为了在文化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在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我们要通过大力气提高中国发展的主体即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境界,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精神境界。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全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有些专家据此作出乐观判断,认为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设想的2050年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提前了40年就已经实现。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判断,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以及与这种成长相伴随的一些相关变化(如全国城镇人口数超过50%,60岁以上人口超过13%,全国人大通过法律文件确定政府教育支出不低于GDP的4%,2009年才开设的网络微博服务很快吸引了将近一半中国人口,加上分别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先后举办……),无疑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正在并必将越来越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国外,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呈现的中国成就,使重视、钦佩和羡慕的人更多了,也使忧虑、惧怕甚至仇视的人更多了;在国内,当前发展阶段所存在的客观困难和特定挑战,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之间的相对落差,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生活世界之间的重要区别,加上公共生活中不同程度存在的言而无信、言而无物和言而无文现象,则既可能成为人们头脑发热、思想封闭的原因,也可能成为人们精神懈怠、方向迷茫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继续解决“发展不足”的问题,不仅要着重应对“发展不当”的问题,而且要高度重视和有效避免“发展不稳”的问题,使中国下一步发展具有更新更强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为了更好地发挥精神因素在中国下一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省”之间建立恰当平衡,以真正实现费孝通先生曾大声呼吁的“文化自觉”;要在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和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之间实现有效结合,以大力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梁漱溟先生多年前把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

## 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

概括为两点,一是“向上之心强”,一是“相与之情厚”。为了使更多人自觉自愿地从不同角度支持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共同事业,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传统、中国发展的此类精神因素,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童世骏

2012年7月

序 言 .....1

## 上篇 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

第一章 打破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 .....2

一、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道路 .....3

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突破极左思想束缚的艰苦努力 .....5

三、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1

四、不同领域的思想解放 .....13

第二章 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 .....25

一、物质生活、个人利益和主体意识的重新认识 .....27

二、打破“大锅饭”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2

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5

四、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38

### **第三章 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45**

- 一、辉煌的古代历史与屈辱的近代遭遇是中国人民  
爱国为国的精神源泉和动力 .....47
- 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  
精神支柱 .....50
- 三、海外侨胞同心支持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资源 .....54
- 四、中国要对世界有更大贡献 .....59

### **第四章 巩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65**

- 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制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67
- 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70
- 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 .....75
- 四、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81

## **中篇 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

### **第五章 坚忍不拔,艰苦奋斗 .....90**

- 一、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1
- 二、普通劳动者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92
- 三、在国际国内风浪面前清醒而又顽强地扎实奋斗 .....100
- 四、中国达到“小康社会”以后仍然需要艰苦奋斗 .....103

## **第六章 大胆尝试,勇敢闯关.....109**

- 一、打破小生产方式和计划经济模式的习惯思维 .....111
- 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体制和机制.....117
- 三、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120
- 四、政治勇气和历史责任的高度统一 .....126

## **第七章 不断学习,与时俱进.....129**

- 一、重视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31
- 二、改革开放时期执政党的“学习”品质 .....134
- 三、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的“学习”品质 .....139
- 四、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通百姓的“学习”品质 .....144
- 五、“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 .....148

## **第八章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53**

- 一、“三省吾身”、“居安思危”的民族传统 .....155
- 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160
- 三、成绩面前特别要防止骄傲自满 .....165
- 四、“风险社会”中更要有忧患意识 .....169

# **下篇 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

## **第九章 改革开放的精神效应.....174**

- 一、人们对现在生活的感受和评价 .....175

二、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信心 .....	181
三、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状况 .....	184
四、人们对人生和命运的看法 .....	189
<b>第十章 当代中国的文化张力 .....</b>	<b>193</b>
一、拉动消费与艰苦奋斗 .....	195
二、提倡创新与脚踏实地 .....	201
三、与时俱进与坚守信念 .....	204
四、宽容多样与把握导向 .....	208
<b>第十一章 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 .....</b>	<b>213</b>
一、大国崛起与大国责任 .....	215
二、和为贵: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支撑 .....	220
三、中国道路的形成与价值贡献 .....	225
四、精神资源整合与文明重建 .....	228
<b>后 记 .....</b>	<b>235</b>

# 上 篇

## 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

## 第一章

# 打破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

精神枷锁是对思想的束缚,也是对行动的钳制。精神枷锁既有来自本本主义的,也有来自上层意志的,更有来自人们自己内心深处的。而中国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打破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而放开手脚搞建设的历程。

## 一、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道路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从社会主义革命转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设计是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1949年6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1953年12月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报告,多次提到这个目标,并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两个目标。

确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两化”目标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状态,连建筑用的钢钉和点灯的煤油都要进口,故称洋钉、洋油。生产力发展极度落后,国民经济中近代工业只占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50美元,年钢产量18万吨,人均不过500克,只能打一把菜刀。然而,到1952年,经过仅仅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全国钢产量就达到134.9万吨,工业总产值为39.9亿,工业和农业生产都已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sup>①</sup>尤其是,到1956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成就,使中国领导人深受鼓舞,认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能够提前实现。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成绩的取得,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也是人们昂扬的精神状态焕发出强大的建设热情的结果。从备受屈辱的近代历史走过来,人们饱尝了太苦太穷的生活,经受了连年不绝的战争,多么想从此过上自由幸福的新生活。“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

---

<sup>①</sup> 高雄飞主编:《当代中国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区的人民好喜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灿烂的前景，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热情和信心，激发出极大的积极性，人们愿意为之去努力、去奋斗。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顺应人们的期待，采取了政治动员与精神鼓励为主的激励手段来发动人们的积极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这种精神动员手段在革命时期对于发动人民参加和支持正义之战发挥了很大作用，这种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阶段，对于动员各种资源和保证国家确定的重点部门和重点建设项目，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投身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多少热血青年加入建设队伍，多少“光荣妈妈”<sup>①</sup>做了全职工人，迅速集合起了一大批产业大军；抗美援朝时，全民齐动员，符合条件者踊跃参军，后方群众捐钱捐物，用捐的钱款购买飞机大炮；许多技术人员坚决服从党的召唤，放弃城市生活，义无反顾地到边远地区搞研究，一干就是十几年。终于换来了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钢铁大国形成、综合国力提高。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精神的巨大推动力。

但是，精神的推动力一旦脱离实际，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人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摆脱出来，渴望发展、渴望快速发展、渴望高速发展的急切心情得到了各级政府的积极助推，于是，在“多、快、好、省”口号的指引下，掀起了“大跃进”，同时，由于“左”的蔓延，“大跃进”非但未实现，在相当多的干部中，还刮起了“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制造了诸多“人间神话”，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玉米秸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一颗白菜五百斤”；“水稻亩产十万斤”；“跑步进入共产

---

<sup>①</sup> 20世纪50年代，为了改善战后国家生产力缺乏的状况，政府号召妇女多生孩子，争当“光荣妈妈”。

主义”，等等。整个中国在“左”倾病、急躁病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近20年过去了，中国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的二元目标似乎还是遥不可及。邓小平后来总结说：“‘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很慢。”<sup>①</sup>

## 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突破极左思想束缚的 艰苦努力

经历了“文攻武卫”的残酷斗争，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的兴奋激动，冷静下来，人们发现，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堆积如山：思想文化上，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盛行；政治上，大量冤假错案需要善后；组织上，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仍然混迹于领导岗位；经济上，物资奇缺，社会贫穷，人民生活困苦……

从某种意义上讲，十年内乱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使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获得了充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感，而“文化大革命”后人们的彷徨和茫然，则孕育了冲破精神枷锁的内在能量。

从何入手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堆积起来的问题？“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思想上革命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毛泽东，这是思想解放的首要问题。

当时面对的障碍就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因为过去的许多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决策,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点过头,甚至是亲自决定的。“两个凡是”是历史上极左思想的继续,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在“两个凡是”口号的束缚下,人们无法放下思想包袱,更新观念,党的工作重心也无法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天安门事件”得不到平反,连清查“四人帮”时也不忘提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一切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以各自的方式来表达这种不满和对冲破“两个凡是”的向往。曾有民谣这样嘲讽“凡是派”:有个凡是派,不是都凡是;有的要凡是,有的不凡是。<sup>①</sup>当时轰动演坛的话剧《于无声处》就是表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作者宗福先是一位工人,他“丝毫不了解中央围绕着这个问题正在激烈斗争”,只是从个人感受出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中,在“四人帮”的高压统治下,那些敢于走到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的英雄们,不应当受到镇压。于是,编写了剧本,排演了话剧,从北京公演并走向全国的舞台,使千千万万人因此受到鼓舞。《于无声处》以文学艺术的表达形式,与当时正在酝酿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谋而合,终于促成了“天安门事件”在1978年11月的彻底平反。

对毛泽东如何评价,既关系到能否推翻“两个凡是”、能否顺利拨乱反正的问题,也关系到能否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党的传统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而挫伤人民的感情,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关于这一点,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回答得非常明白。他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并且回答法拉奇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

---

<sup>①</sup> 南兆旭主编:《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5页。

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sup>①</sup>邓小平精心解决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困惑,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

“两个凡是”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问题,这对于拨乱反正、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同心同德搞建设至关重要。

1957年反右斗争中,有55万余人被划成“右派分子”。20多年里,这些“右派”或被发配农村改造,或到工厂被监督劳动,他们及其家属受到严重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1978年,中央发文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摘帽”和改正正在中央部署下进行,至1980年底,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分子”人数的97%以上。1980年拍摄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就是一部反映反右扩大化的影片,说的是一位名叫罗群的年轻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水库工地劳动,受尽孤独与疲劳的折磨,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一位善良女子的照顾,结为患难夫妻。待到罗群终于平反,妻子则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影片既反映了被错划的“右派”生活的艰辛,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朴实,还反映了在改正错案当中的艰难与斗争。

给“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于恢复和健全正常的民主生活,对于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面,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sup>①</sup>。改正的结果,使那些被错划的同志以及他们的家属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许多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当时在社会上还有一大批生活在精神压抑之下的人,这就是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以及其他一些被错误定性的人及其子女。1981年拍摄的电影《小街》就是“黑帮”子女苦难命运的反映。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释放精神压力的一件重要工作。考虑到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富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这些人作出了“摘帽”的决定。结果,在农村,有440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在城镇,有70多万工商业者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确定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对这些人的子女的成分问题、工作问题、入党入团问题等,都作出了重在表现、不得歧视的规定。这样的举措,使2000多万人的政治命运得到了改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尤其是从长期的精神压力中解脱出来,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解决历史年代相对久远的冤假错案尚且有阻力,要想解决为时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就更为曲折,因为许多涉及案件的当事人还在,“左”的思想还顽固。最大的冤假错案莫过于刘少奇案,最难处理的案件也莫过于刘少奇案,因为这是毛泽东首肯的。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和“工贼”。“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红卫兵屡次揪斗,被逐出北京,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被迫害致死。身后没有鲜花和国旗,没有任何亲人

---

<sup>①</sup> 《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7日。

在场,甚至在火化时都没用自己的名字。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冤案终得昭雪。“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这句充满信心的话得以证实。之后,又将刘少奇案件涉及的26000多件冤案予以平反。<sup>①</sup>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终于胜利完成。几百万名干部得到平反,数千万名受牵连的群众恢复了清白。“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多万人,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2万件。”<sup>②</sup>“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sup>③</sup>

要拨乱反正的不仅是冤假错案,还有被搞乱的人们的思想。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由此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生观问题的全国大讨论。两位青年以笔名诉说了其内心的苦闷:他们从小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等英雄事迹影响下生活,相信共产主义。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尔后愈演愈烈……感到周围的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于是迷茫,不知道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

① 参见张湛彬:《石破天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参见程中原等:《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5卷,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5页。

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如此种种,潘晓得出结论: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一时间,不仅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加入进来讨论;不单是内地、港澳地区,连美国等地的青年朋友也都加入了进来。全国各大报刊都组织讨论,发表评论。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发行量达到369万份,有6万多人看完文章后给编辑写信。讨论涉及自私是不是人的本性,“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命题是否成立,怎样看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怎样看待理想和现实社会、关于幸福的看法和获得幸福的手段、怎样看待生命的价值、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态等一系列问题。

大讨论持续了半年之久。这场讨论的现实语境,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凸显出的一些原有价值观念的衰落,一代中国青年从狂热盲目,转向苦闷迷茫,这是在社会巨变中对新价值观的追问和求索。在讨论中,正反两方面意见都有充分阐述,虽然最后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但通过讨论,或多或少带来一些积极成果。有读者说,讨论不但使年轻人的思想不再迷茫和禁锢,而且还打开了许多年轻人的视野,让我们这一代人看到了希望。当时同样是青年的中央台主持人徐俐说,那场人生观的讨论让她获益匪浅,“虽然不敢说那场讨论影响了我的一生,至少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更加坚强”<sup>①</sup>。

1982年7月,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舍身跳入粪池救农民而牺牲了自己,又引发了关于“大学生救农民值不值”的讨论。一些人认为,即将毕业成为医生的张华,本可以为千千万万的病人治病,却为了一个老农付出生命代价,太不值得。但更多的人认为,生命无价,奉献是一

---

<sup>①</sup> 《徐俐:“孙敏燕”从“信箱”中走出来》,《长沙晚报》2008年6月20日。

种责任。1982年,中央军委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光荣称号,昭示了社会对这种舍身救人精神的肯定,明示了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

“文化大革命”后的人们,经历了思想的彷徨,也有过困惑与焦虑,但终究从僵化的思想桎梏中解脱了出来,经过艰苦的努力和热烈的讨论,随着思想的逐步开放,一桩桩亟待解决的“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各项工作获得了良好启动。

### 三、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30多年前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是一种对常识和理性的回归。解放思想包括几个方面的含义:有意识形态领域与思想领域的解放思想,这就是要破除一切过时的、错误的、阻碍历史前进的观点、理论和思维;有认识领域的解放思想,就是伴随着认识的深入、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解放思想;有社会方面在机制、制度、体制领域的变化而提出思想解放。这几个方面的解放思想,都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真理标准的讨论,源于部分知识分子的敏感,是那个时代民意的最大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标准”文章不是一个人所写,而是一个观点相同的作者群,他们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行者。文章得以发表,因为契合了当时社会酝酿改革的呼声,也契合了上层领导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于是,在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力作用。

张忠民,1978年时任宜昌地委副书记,他对当时的情况回忆说,当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但又不知错在何处,1978年12月13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5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基础上的发挥,把广大干部群众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推动了改革开放深入进行。

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则说,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使自己“恍然大悟”。在入党的时候,自己就认为应当绝对服从,听党的话,党叫你往左你就往左,让你往右就往右,让你说你就说,让你不说你就不说,绝对地拥护党服从党。思想解放运动后才发现,绝对服从是有毛病的。

杨孟琪,1938年出生于武汉,1956年从青岛工学院毕业后,任中央建筑工程部总工程师秘书,并考入清华大学在职攻读建筑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57年受反右牵连,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后来做了中学教师。谈到1978年那个春天,已经70余岁的他仍然难掩兴奋,他说,3月26日那天,当他如往常一样翻开邮局送来的《人民日报》时,无意中发现三版右下方刊登着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评论文章,“当这个标题跃入眼帘时,我感到我的内心深处一些东西被深深地触动了,那就是‘讲真话’”。于是,他敏锐地觉察到这有可能是一个信号,自己的人生也可能会从此发生转机。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在食堂吃饭时,我察觉到不少同事也在低声议论这篇文章,一种想‘讲真话’的冲动此时已在群众中呼之欲出。”果不其然,他后来被平反,从教师做到

校长,并连任几届政协委员和常委。他的命运在1978年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sup>①</sup>

若干年后,很多人都说,一篇文章改变了历史进程。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则说:“说到底,这篇文章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讲了大家都想讲的话。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要出来写文章,要来批判‘两个凡是’。这是历史的规律,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sup>②</sup>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同凡响,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sup>③</sup>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人思想解放的里程碑。此后,思想解放成为改革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极左思想被清除,“两个凡是”遭抛弃,阶级斗争不再提。思想解放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拨乱反正,“天安门事件”平反,右派“摘帽”、错划者改正等,这些都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四、不同领域的思想解放

首先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时隐时现,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走到了极端。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名三高”(名

① 《“真理标准讨论”改变我的命运》,《楚天金报》2008年3月18日。

② 《历史,告诉未来:5.11前夕的一次对话与思考》,《解放日报》2008年5月11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5卷,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8页。

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备遭批判。大学停止招生,科研院所解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科研人员下放五七干校。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明:知识无用,知识分子无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我国与世界拉开的差距,面对国内物资短缺、技术落后、人民贫穷的局面,以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成为时代的共识,成为中央工作的着力点。

要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首先就要推翻“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文化大革命”对前十七年教育的定性,认为那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两个否定性的估计下,教育战线几百万知识分子被遣送劳动改造,甚至遭毒打迫害,有的人丧失了生命。邓小平复出后,主动提出由自己来主管科学和教育,并首先对“两个估计”开刀。他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1977年8月,他特地组织科学家和教育学家开了三天的座谈会。大家非常激动,谈了对“两个估计”的疑惑,谈了目前科学界存在的问题,谈了科学家遭到非公正待遇的事实以及许多冤假错案,也谈了恢复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急迫心情。邓小平在调研之后,作出了与“两个估计”截然不同的结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sup>①</sup>“两个估计”被推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翻,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首先得以恢复。

1977年岁末,全国570万青年参加了高考,共录取27.3万人,录取比例为29:1。由于时间仓促,规模巨大,中央甚至紧急调用了印刷《毛泽东选集》的纸张来解决考卷问题。高考改变了中国,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储备了一大批有生力量;高考也改变了许多青年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而怀才不遇的青年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高考也创造了一系列“奇迹”:有一家三兄弟(姐妹)同时考上大学的,有一个班级年龄相差一轮以上(13岁)的,有父子同时进入学校的(大学和小学),有学生比老师还年长的……77级,在中国教育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知识改变命运”替代了“知识无用”、替代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成为最响亮、最风光的口号。

紧接着,全国科学大会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成为最有力的号召,邓小平坚定有力地宣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作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报告,他以诗句般的语言热情歌颂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科技界、知识界沸腾了,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大有扬眉吐气的感觉。这时,著名作家徐迟采写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之光》和采写数学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相继发表,科学家不畏艰辛、勇攀科学高峰的感人事迹,极大地激发了中国青年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向往、热爱和追求。

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解放,还体现在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上。

中组部在1978年11月就发出了《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提出：(1)对知识分子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继续做好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工作；(3)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4)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5)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6)加强领导，改进作风，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要为科研、生产、文化教育服务，认真贯彻“双百”方针。<sup>①</sup>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国家科委恢复，中科院调整重建，建立科学基金，设立发明奖、进步奖，恢复招收研究生，向海外派遣学者和留学生，恢复技术职称评定……一系列措施出台，使一大批有才能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承认、获得了荣誉，让他们感受到事业上有奔头，经济上有保障，他们的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压抑了十年的潜能得以重新激发。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解放，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柱和精神动力。无怪乎中国工程院院士严东生在回忆30年前的科技大会时会这样说：“改革开放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

同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悄然开始。1978年初的一天，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到安徽定远的一个村庄，“当时看到吃的是地瓜和萝卜秧子熬的粥，大冬天一家人也许只有一条棉裤，住的房子甚至家具都是泥土坯的”。万里问农民有什么要求，不少农民都说，希望吃饱肚子。<sup>②</sup>吃饱肚子，不仅是农民的渴望，也是当时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城市的粮食定量供应也使许多人家食不饱腹。于是，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危险大胆实行包产到户，一年就大见成效，粮食总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5卷，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1页。

<sup>②</sup> 参见《东方周刊》2008年第26期。

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小岗村的这一变化不仅结束了向国家伸手要钱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可以对比的是,凤阳县的县委书记曾这么评价凤阳:“就是这么一个100多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动力,22年没给国家贡献一斤粮食,倒吃国家4亿斤粮食。”<sup>①</sup>小岗村的承包方式迅速传遍了全国农村大地,它带给农民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增收,吹响了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思想理论上的问题。长时期里,“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统治经济领域,这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具体表现就是为高指标而生产,为赶超而生产,为争光而生产,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等,而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甚至在大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比如“大跃进”时期,人民的生活反而更成问题。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经济学家吴振坤写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于1979年9月30日在《理论动态》杂志刊出。10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发。于是,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从经济理论界到经济实践领域,扩展到全国各条战线,讨论延续了一年半。这场讨论比较深入地揭露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启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生产目的上有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工作不能脱离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宗旨,否则就会丧失其社会主义性质。

有了生产目的讨论的结果,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就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是如何在发展中解决人民需求的。让我们先把目光投

---

<sup>①</sup> 转引自焦润明等:《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沈阳出版社2001年版,第635页。

向作为特区试点的深圳。30多年前的深圳是什么样？《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sup>①</sup>描述了1979年百万人四次大逃港事件：仅5月6日这天，就有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人们为什么要逃往香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调查后发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元—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元—70元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实际上，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怎么办？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张列数特区发展的时间表：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作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9年3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与珠海县改为深圳市和珠海市。

1979年4月，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1984年1月24—26日，邓小平视察特区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

<sup>①</sup> <http://book.sina.com.cn/nzt/soc/shenzhenshijian/index.shtml>.

1984年4月,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sup>①</sup>

到1985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榜首,而7年前的1978年仅在第23位。

凡改革得比较早,发展得比较快的地方,一定是那里的人思想比较解放,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善于抓住机遇,勇于头一个“吃螃蟹”。温州就是这样的典型。

有顺口溜这样说温州:“五十年代是前线(东海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武斗典型),七十年代是短线(物资短缺),八十年代站在改革第一线。”这是对温州不管在地理位置还是在人的敏感度、创造性方面都扮演了时代弄潮儿的贴切描绘。改革开放初期,发生过著名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八大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个体户代表,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探路者,但是,他们为此也承担了不小的风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曾因“投机倒把罪”被抓,其中七个人进了监狱,以至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最终成功“翻案”。

温州人以其敢为天下先的气派创造了温州经验。有一位经济学家总结温州经济能够那么快发展,主要掌握了三张好牌:第一张好牌是小市民创大世界。许多城市出国定居者多为有钱、有地位人士,温州偏偏是普通市民打头阵。第二张好牌是小商品走大市场。比如,温州生产的打火机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温州还是全国最大的眼镜生产基

---

<sup>①</sup> 赵海均:《1978—2007年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地。第三张好牌是小企业挥大手笔。温州的一家服装企业曾出价 200 万美元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形象代表。<sup>①</sup>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几种典型,形式虽不同,但总的一条,都是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吃大锅饭”模式,不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也不再有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现象,因为劳动的态度、劳动的成绩与劳动所得直接挂钩,个人的能力可以得到承认,并能增进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无疑给那些有本事、有能力的人注入了极大的精神动力和政策依据。

思想解放,反映在政治体制领域,就是反思过去的干部体制,尤其是领导干部终身制所带来的弊端,并进行拨乱反正。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实行退休制的问题。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官员的职务都是终身制的,终身制导致官僚主义,助长官本位,形成种种特权,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终身制减弱了政治权力机构的自我净化功能,最后导致人亡政息。邓小平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sup>②</sup>1980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丧失工作能力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接着,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党章阐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1982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各种国家最高职务的每届任期为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是领

---

<sup>①</sup> <http://www.cnnb.com.cn/new-gh/duihua/system/2002/05/17/000249080.shtml>.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

导职务终身制废除的信号,退休制度随后正式推行。这场职务革命进行得比较顺利,与邓小平和一批中央老同志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有很大关系。

30 多年来的干部体制改革,经历了终止领导干部终身制的离退休制度和任期制以及公务员制度,经历了反对家长制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民主决议、纪律监督制度,经历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各种考核制度、廉政制度,以及实行了培养干部的培训制度等。干部体制的改革在促进干部年轻化、加强干部服务热情和责任心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在打破束缚思想的枷锁方面,文学艺术以其独特的形式来表达人们的精神需求,在呼吁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人性和人身解放方面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以荒诞的手法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对人们大好时光的浪费,鞭挞“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摧残,向往重新规划新的生活。小说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引起极大反响,以至于“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成为流行一时的口号。

如果说谌容的小说是以荒诞的手法反映时人的情绪和精神状态,那么,1977 年开始出现的“伤痕文学”则是以严肃甚至有点悲怆的手法反思“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深重创伤。

伤痕文学最先问世的开山之作是刘心武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 年 11 月的《班主任》。小说描述了一位中学班主任,同意接收一名受过拘留处分的“小流氓”到自己的班上学习所引起的风波。揭露了“四人帮”对青少年心灵的毒害,呼吁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从拯救自身着手,挽救我们的青年一代,进而复兴我们的国家。小说真实感人、催人泪下的故事情节,震撼着每一位读者。接着是卢新华的小说《伤

痕》，讲的是一位女中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母亲被打成叛徒，她毅然决然和母亲划清界限，同家庭决裂，到农村插队落户。但是，无论她怎么勤奋学习，努力劳动，积极要求进步，但在“唯成分论”的时代，仍然是招工上学没她的份，排挤歧视却始终缠着她。长期的精神摧残，使她成了一个“沉默寡言，表情近乎麻木”的知青。粉碎“四人帮”后，她匆匆回家，欲探望久别的母亲，但母亲已经死了。那个时代留给她的永远是无法弥补的伤痕。

以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都市文学等，层出迭见，文学追随着时代的步伐，在控诉—反思—寻根—探求中表达着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也激励和引导着人们精神的提升。

思想解放不仅表现在揭露与控诉，还表现在解构与多元。1979年“星星画展”的发起人和命名者黄锐在回答为何取名“星星”时说：“‘文革’时候，你可以说星星，可是你不能用在公共场合上。因为只有一个唯一的发光体是太阳，太阳就是毛主席。那时候我们想得非常自然，每一个星星都是独立发光的，它能自己存在，为了自己存在”，表达了当时青年伸张个性的意向。还有朦胧派诗歌群体以反抗主流意识为艺术手段，其作品带有一种叛逆性、先锋性风格，“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至于流行歌曲，则以多样化的格调取代单调的革命歌曲，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徐小凤的低吟浅唱，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罗大佑的“乡韵四愁”，崔健的“一无所有”……歌坛打破了“文化大革命”压制下的文化禁忌，抒发着青年一代的心灵解放，也抒发着他们在变化面前的茫然和沮丧，还抒发着他们对精神归宿的寻求和渴望。这时候的通俗文学以多种体裁多种样式满足着人们不同的精神需求，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作品，三毛的游记，都成为

大家津津乐道的读物和谈资。

与此同时,反映和讴歌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如何士光在198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乡场上》,描写了一个极其普通的乡下农民冯么爸,他“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产了的、顶没价值的庄稼人”,在面对一场普通的乡间纠纷,即两个小孩打架要他做证明人时,他难以抉择。因为说出事实就会“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不说事实又觉得对不起受到欺负的任老大的老婆和孩子。为此,在他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想到自己多年所受的屈辱和近年生活的变化,开始意识到应当恢复做人的尊严,终于说了实话。小说通过一个农村的小人物在乡场上站立起来的故事,描绘了在承包责任制以后不仅逐步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同时还使他们摆脱历史因袭的重负,获得人的尊严和社会权利,在精神面貌上产生可喜的变化。

而张贤亮的《河的子孙》则是以对比的手法描写农村20多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命运。在小说中,担任支部书记的魏天贵历经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变幻和风雨,看到了极左对中国农村带来的破坏。为了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和求得温饱,他利用农民本有的小聪明和计谋,在各个时期以“违规”和“昧心”的办法给乡亲们带来好处,为此他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改革开放以后,结束了“大锅饭”带来的弊端,也带给农村一系列变化,“一些社队干部的瞎指挥、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甚至压迫农民的情况也能杜绝了”。于是,他认识到以前那种委曲求全、偷偷摸摸求温饱的做法不再需要了。

1978年重新启动的现代化,不仅注重“四个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内涵(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而且提出了“精神文明”概念。这一概念是在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明确了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精神文明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也有多种形式和多种内容,总的趋向是由简到繁,由浅入深,步步推进,层层普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以“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抓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形式。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认为,“五讲四美”,是道德突破政治,也是解放思想。在当时,“左”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对于原本包括的“仪表美”由于争议太大而取消,包括对保留的“心灵美”也有诸多疑议。但高占祥认为:“提出了美就是一种成功。”<sup>①</sup>“五讲四美”活动的开展,切实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各地上报的资料里不断讲述着:从前是扒手,现在是突击手;从前是打架大王,现在是突击大王;从前是害群之马,现在是“四化”建设的千里马等。

之后,精神文明建设以新的载体不断向深入发展,如“七不”规范,文明社区、文明班组、文明单位的创建,文明标兵的树立,直到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驾齐驱,推动着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同时,作为精神因素重要方面的宗教活动也得到了恢复,并引导宗教精神生活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补充,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

<sup>①</sup> 参见《北京日报》2008年2月25日。

## 第二章

# 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

现代化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它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百年来,中国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一步步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不论中外思想家在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观点如何不同,现代化进程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则是基本的共识。



## 一、物质生活、个人利益和主体意识的重新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对于物质生活和个人利益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物质利益成了人们追逐的重要对象,物质价值观空前地凸显为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观。从而,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主体意识得到极大的觉醒与高扬,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议,全会公报指出,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sup>①</sup>。党的工作重点从原先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现代化建设上。

社会的发展需要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动力。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动力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有正确而强大的精神支柱。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精神动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信念、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这三者构成一个统一的、缺一不可的精神动力系统。

首先,一般而言,信仰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主体参与实践的一种动力。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

---

<sup>①</sup>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sup>①</sup>邓小平同样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sup>②</sup>

其次,邓小平认为,坚持人民群众的立场,牢固树立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信念,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的强大精神动力。他指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sup>③</sup>由此,邓小平告诫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领头人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做自己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定要牢固树立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信念。

最后,邓小平认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以爱国主义来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民族振兴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有独特作用的强大精神动力。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经常强调爱国主义。为了使改革开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大力倡导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

---

<sup>①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sup>③</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力量。邓小平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sup>①</sup>在他看来，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在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非常重要，对于进一步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能起到十分独特的巨大作用，爱国主义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强大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在邓小平看来，社会的发展既需要物质层面的推动力，也需要精神层面的推动力。邓小平在提倡尊重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合理的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sup>②</sup>在邓小平看来，只讲精神鼓励，不讲物质利益，必然严重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际上，通过肯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激发起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恰恰是改革开放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物质利益得到肯定，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同时，对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也顺应了人提升自我主体意识的需要，使主体意识转化成投入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主体意识或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主体观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sup>③</sup>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主体甚至被消解掉，人完全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改革开放以来，中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35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③ 李德顺：《当前价值观新走向》，《天津日报》2002年7月29日。

国社会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首先,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大解放,逐渐消除了与“左”的思潮相结合的价值观,并对过去一切陈旧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审。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和价值观念障碍。其次,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人们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再次,主体意识既包括群体主体意识也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因此,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就意味着既是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也是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价值主体既对理想目标和精神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又对世俗生活和物质利益表现出最大的热情。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丰富着主体的价值内涵。

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经济逐步放权政策相对应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一场新启蒙运动,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解放力量。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中对于主体性概念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另一方面则试图建立相应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主体性概念在他们的语境中主要指个人主体性和人类主体性。主体性问题首先源自李泽厚对康德哲学的解说,而后他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论纲。1981 年李泽厚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一文中提出了他的哲学是主体性哲学。什么是主体性哲学?他说:“人性便是主体性。”<sup>①</sup>人性“也是今天哲学的中心课题”<sup>②</sup>。这种哲学出来以后,得到不少人的肯定和赞扬,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并非他的

---

① 李泽厚:《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0 页。

② 李泽厚:《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5 页。

天才创造,只不过是康德及其后继者主体性哲学在中国的翻版,其性质是唯心主义的。”<sup>①</sup>但不论反对和赞同,这都说明了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而将李泽厚有关主体性的讨论推向整个思想界的是深受其影响的刘再复及其《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文章。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和《论文学的主体性》先后在《文汇报》和《文学评论》发表后,文艺界就文章提出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展开了讨论。《文汇报》1985年9月30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八位教师有关《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的讨论摘要,后又于11月18日、25日发表了董子竹、何西来的讨论文章,1986年2月18日和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就文学主体性问题组织座谈,并将会上十位同志的发言摘要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红旗》杂志1986年第8期发表的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文汇报》1986年5月11日、6月21日发表的汤学智、敏泽的文章也就主体性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一时间,讨论热潮空前高涨。作为著名哲学家,冯契对毛泽东的主体能动性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他赞同毛泽东对于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看法,即“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sup>②</sup>。冯契提出了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两次飞跃来理解主体的能动性,对毛泽东的认识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1957年出版的冯契所著的《怎样认识世界》一书曾被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推荐;而集中了他“文化大革

① 汤龙发:《试析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及其来源》,《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命”后哲学探索成果的《人的自由与真善美》等三卷哲学理论著作(即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智慧说三篇》),则在反思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实质性贡献。高青海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文章,并从人的主体性入手,进行了哲学教科书的改革,在当时反响很是强烈。

在观念上对于物质生活、个人利益和主体意识的重新认识,一方面为改革更深入的推进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澄清了物质生活、个人利益和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必将预示着在社会的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要发生一场风起云涌的伟大创造。

## 二、打破“大锅饭”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思想解放意味着为物质利益正名、为追求生活富裕正名,如邓小平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sup>①</sup>,“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②</sup>。同时,思想解放也意味着为不同个人及其家庭追求其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为正名,解除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根据邓小平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实现共同富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物质利益原则入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制定了先富带动共富的方针,这个命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题实际上包含着：第一，勤劳致富是正当的；第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他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sup>①</sup>“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sup>②</sup>

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新中国成立后，平均主义事实上成为分配原则，人们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就是平均是合理的道德的，不平均则是不合理不道德的。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sup>③</sup>

打破“大锅饭”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携手迈出的。“包产到户”能够存在和发展下来，与邓小平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sup>①</sup>这推动了包产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步发展,而且为人们进一步探索勤劳致富的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包产到户保证了农民在生产、经营上可以有自主权,从而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80年代初、中叶,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户。一些有地缘优势并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农村率先富裕起来。

在这一时期的文化领域也出版了大量反映这一时期思想的文学作品,一大批表达社会变革的“改革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出来。作家们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用文学作品来为新时代欢呼讴歌。“改革文学”从《乔厂长上任记》起始,80年代中后期到达顶峰,表现出了作家们强烈的政治生活积极性和参与性。其中,优秀的作品有《燕赵悲歌》、《花园街五号》、《新星》、《沉重的翅膀》、《人生》、《平凡的世界》等。

在这一批文学作品中,大多揭示了旧的经济体制、旧观念在新时期的不适应和对改革带来的阻碍,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敢作敢为、思想开放的改革者形象,深刻体现了新时期创业者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张洁《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等,都描绘出了当时时代背景下创业者的精神面貌,以及这种创业者个人精神之后的时代精神特征。

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乔厂长上任记》刻画出了“乔厂长”作为一个改革先行者的坚定、宽容、魄力和为“四化”忘我工作的精神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面貌,真实刻画出了他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一个真实的改革者、创业者形象。他的出现,正好符合了人们渴望改革、渴望涌现出敢作敢为、勇往直前的英雄人物的愿望,使“乔厂长”成为新时期以来的改革者代名词。1981年,张贤亮的中篇《龙种》刻画了改革大潮中的另一种创业者形象。主人公龙种被派到国有重点农场担任领导之后,看到了令他吃惊和伤心的现象:农场的工人们面对被荒弃的土地无动于衷,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毫无热情,对生产的好坏漠不关心。面对这些,主人公深深体会到,在没有激励机制,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再好的机器在工人手中也是一堆废铁,再优秀的工人也会变得懒散和不负责任,正像主人公说的,“我们的农机已经不少了,可是生产还是上不去,年年赔钱,这问题显然不在机械化不足,而在于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他主张打破现有的体制,“走自己的路”,探索全民体制下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在分配制度上加以改革、协调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思路下,他把农场交给工人,充分调动工人的主人翁精神,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把生产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限度。《龙种》探索的是在现有体制下生产关系的改革、运行机制的改革,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用艺术形象的形式进行了展示和阐释。

### 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为人民谋取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真实写照,是“我们党全部奋

斗的最高目的”<sup>①</sup>。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认真实践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观,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并不断获得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利益观,其利益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自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实践本身有对有错,那么衡量实践对错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当时并没有解决。针对全国人民在思想上的困惑和实践上的迷茫,邓小平高举价值标准的旗帜,提出了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幸福三大标准,这是以民为本的真正思想解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突破难关、破浪制胜的根本法宝,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思想遗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认为:“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sup>②</sup>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sup>③</sup>。对“以人为本”这个“核心”,胡锦涛总书记做了这样的解释:“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

<sup>①</sup>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sup>②</sup>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sup>③</sup>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sup>①</sup>

“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标准在中国获得最新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三次发展提法虽然不同,但实质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高价值标准的肯定,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革命本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以从饮食、住房和交通工具这几个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看见变化。

从饮食方面看,在20世纪50—70年代,物资严重缺乏,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低指标,瓜菜代,吃得饱,饿得快,肿了大腿,肿脑袋”,“南瓜北瓜,天天吃它,无油少盐,稀稀呱呱”。80年代,从温饱走向小康的中国人,餐桌上“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盛。80年代后期,粗粮食品逐渐从百姓的餐桌上淡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同时,外国的快餐如麦当劳、肯德基也进入中国市场。90年代,中国菜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口味。法国大餐、意大利匹萨、日本料理、韩国烧烤等纷纷进军中国,中国人不出国门便能吃遍世界。这个时代的你无论走到何方,大街小巷各种档次和风味的餐厅与酒肆都随处可见。21世纪初,人们开始呼应健康主题,对回归自然的“水果蔬菜”重新重视。蔬菜要吃新鲜的,粮食要吃该年的,鸡鸭要吃一秒钟之前的,鱼肉要吃欢蹦乱跳的。中国人的健康观念“清醒而及时地”迈上了一个崭新的

---

<sup>①</sup>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台阶。

从住房方面看,从60年代的平房,70年代的筒子楼,80年代的单元房,90年代的二室一厅、三室一厅到跨入新世纪的小高层、复式住宅、别墅,从“居者忧其屋”到“居者有其屋”再到“居者优其屋”的变化深刻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从交通工具方面看,1978年前后,时髦代步工具是自行车,中国曾经是世界著名的自行车王国,“凤凰”、“永久”无人不知。八九十年代,公交车已经成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给城市居民带来了便捷。进入90年代,出租车业迅速发展,从城市到乡村,招手即停,出租车可以载你到想去的地方,价格水平也能被百姓接受,可以享受到私家车一样的服务。1994年,宝马在北京设立第一个代表处,国人“开宝马、坐奔驰”的财富大梦想由此起步。21世纪,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德国大众第一海外市场,满街都是它的桑塔纳、POLO和帕萨特。同时,以奇瑞和吉利等为代表的中国汽车企业希望获得平等对待,投身自主研发,创造中国汽车产业的希望。他们通过实现较高的性价比,让百姓纷纷将买车目光投向了国产汽车。现在,在一些大城市,有车一族已不稀奇,买车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车辆太多,出现道路拥堵的问题,像上海采用了车牌拍卖的方式,试图通过价格竞争限制车辆过多,但车牌价格的一路飙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四、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幸福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对幸福的感受也与以往有所不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这场变革不仅改变了落后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制度层面,而且也带来了整个社会在价值观念、情感心态等文化心理层面的一系列变革和更新,而幸福观念的变革也是这一系列变革中的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生活的期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等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放在首位,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一是从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实现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规划。30多年来,中国经受住了各种风险和困难的挑战,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死,集中过度,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不断深化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局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

破,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始终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设置沿海经济特区开始,到开放沿海城市,再到沿边、沿疆乃至全国范围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立足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大力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积极参与资本、劳务、产品、技术和信息的国际交流,显著地增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是通过实施扶贫计划,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特殊举措,重点解决低收入居民特别是困难居民家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我们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了扶贫攻坚活动。农村贫困人口从改革之初的2.5亿人减少到1993年的8000万人。针对剩下的贫困人口大都分布在偏远地域,交通十分不便,经济非常落后,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的状况,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各地通过加大扶贫开发资金投入,帮助贫困地区改变生产条件,改善生态环境;通过扶助贫困户开展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直接解决其温饱问题;通过实行科教扶贫、着力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素质以及实施东西扶贫协作计划、实行对口帮扶等一系列力度很大的非常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综合国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改善最大的时期。在这里,我们不必说人均GDP的数字增长,也不必谈新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仅从衣着和娱乐这两个方面来感受民生之变,从细微处就可体会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

成就。

就穿着方面来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时期,有这样的顺口溜:“日本产尿素,做成飘飘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中山装、人民装、军服是那时的首选。70年代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十年“文化大革命”,最时尚的装束莫过于穿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草绿旧军装,扎上棕色武装带,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肩上斜挎草绿色帆布挎包,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脚蹬一双草绿色解放鞋。而在很多人看来,中国服饰发展的春天与中国人时尚观念的复苏开始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人们看到大喇叭裤、蝙蝠衫,还有健美裤和连衣裙。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和港台时尚迅速涌入。90年代,中国服装至少在高端人群中已经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奢侈、豪华、昂贵不再是用来批判西方生活方式的专用词,而成为一些人理直气壮追求的生活目标。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人对服装诉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穿出个性——最好是独一无二。服装的主要作用已经不再是御寒,而是一种个性魅力的体现。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21世纪,世界服装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体现,唐装走俏全球,旗袍热遍世界,中国服装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在全世界受到注目和尊重。

在文化娱乐方面可以叙述的事情实在太多。1980年,偶像时代来临。“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这一年诞生: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对那些听惯了口号式歌曲的男女老少来说,邓丽君那情意缠绵、柔情万缕的歌声,让人着迷。罗大佑1979年创作的《童年》举国传唱。紧跟着是《光阴的故事》、《恋曲1990》、《你的样子》、《滚滚红尘》、《明天会更好》等。

1986年,崔健和中国摇滚乐崛起,《一无所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

心态。从那以后,歌坛分化了,娱乐方式也多元化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人民掌握了自主进入娱乐圈的权力。2005年的“超级女声”可谓是当时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作为传统强势媒体湖南卫视重金打造的电视节目,搭车无线算是无心插柳,而来自网络的热捧更是令人意外,一时间,“玉米”抱团,“凉粉”成行,“粉笔”处处,“超女”江湖纷争无穷。从网上红到网下,从贴吧追星到抢别人手机发短信,愣是捧出来新一代的属于自己的偶像。美国的评论也非常娱乐,美国人说,从超女的成功可以看出中国的民主已经有所进步,因为这次超女的评选是真正的民选。不管怎么样,平民造星,已经真正来到了我们中间!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全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了极大的保护和加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但同时也应看到,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顺应时代的要求,在中共十六大上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十七大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3)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4)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5)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sup>①</sup>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

---

<sup>①</sup>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在当今世界的重大意义。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中共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文化投入,全国文化建设资金呈逐年持续增长的喜人态势。全国文化共享工程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性工程,“十一五”期间取得了全面、快速发展。文化共享工程自2002年实施以来,至2010年底,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专项资金约60多亿元。通过依托各级图书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文化共享工程已初步建立了层次分明、互联互通、多种方式共用的五级信息传输网络。在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重大文化项目的同时,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在全国东、中、西部创建一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2010年3月,中央提出了推进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免费开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指示,文化部积极响应,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深入调研,制定了推进免费开放工作和实施方案。2011年初,文化部、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的意见》。这是继2008年博物馆、纪念馆实现全面免费开放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

各族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既是先前阶段改革发展的胜利成果,也是当前和今后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更好生活”不仅包括更好

的物质生活,而且包括更好的社会生活和更好的精神生活。“更好的物质生活”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消费产品和消费机会,而且意味着更加清洁的生活环境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更好的社会生活”不仅意味着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更加优厚的社会福利,而且意味着更有活力的社会参与和更受尊重的社会权利。“更好的精神生活”不仅意味着人们因此而得到更多的文化娱乐,而且意味着人们更满足自己的创造兴趣,更能关注有关人生目的和人生意义等终极问题。2010年成功举行的上海世博会,使正处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之中的整个中国,都受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世博会主题的深刻影响,为中国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

## 第三章

# 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传统,爱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推动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生生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源泉和内在动力。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自强不息的优秀民族传统在新时代演绎成为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热情在各个领域得到了最酣畅的释放,激励着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 一、辉煌的古代历史与屈辱的近代遭遇是中国人民爱国为国的精神源泉和动力

历史是爱国主义的深厚根源。“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sup>①</sup>中国历史上,我们不但拥有四大发明,并且这些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培根语),并且,中国还因为其他众多的发明而被称为“发明的国度”。中国人足以为古代的辉煌成果而自豪,足以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古老而历史又从未中断过的国家和民族而骄傲,足以为历史上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史学家、军事家等而脸上有光。这些成就和辉煌,在中国人民心中自然形成自豪感并转化成为一种爱国为国的情感和动力。

但,历史悠长,并不总是辉煌。近代中国遭到列强分割,丧权辱国。史学家往往把中国近代史称作一部“屈辱史”,或“救亡图存”史。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屈辱刺痛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屈辱激起了中国人民奋发自强、救亡图存,屈辱反而成为中国人民爱国为国的促动力。正如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文中所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sup>②</sup>屈辱激起了耻感,耻感激发出自强,自强化为了一幕幕爱国为国的切实行动。

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中国人充满着急切的愿望,要实现“四个现

---

<sup>①</sup> 《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页。

<sup>②</sup> 参见《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

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长中国人之气、要弥补“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损失……一个个愿望化作了爱国为国的具体行动。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子排球队以七战七捷的成绩首次获得世界冠军,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一时间,群情沸腾,彻夜欢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兴奋的词语作标题:“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文中写道:“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体育比赛的胜利,承载了太多的意义,上升到了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郎平在自传《激情岁月》中这样描述那时的情景:“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它是80年代的象征。”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戴的女排,从1981—1986年,连续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殊荣。“女排精神”不仅成为对女排队员不怕吃苦、努力奋斗的精神写照,而且成为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的精神象征。

如果说女排是以一个团队成为顽强拼搏的象征,并以其为国争光的功绩载入爱国主义史册,同时代的张海迪则以身残志坚成为青年的榜样,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又一表征。张海迪5岁时患脊椎管瘤,高位截瘫,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和功能。但她不向命运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斗争,写小说,画油画,拍电影,唱歌,读硕士。自学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为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自学了4门外语,翻译了许多作品和资料。她“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一百零一次地爬起来”的精神,感动了整个社会的心。

做“四有新人”,做“新雷锋”,是张海迪事迹赋予这个时代爱国主义的新内涵。有社论这样写道:“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国深

入开展学习张海迪的活动,对于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对于激励和鼓舞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投身到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正确对待人生,首先是要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同整个国家、民族,同党和军队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顽强奋斗,锐意进取。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集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只有把个人的一切融化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中,才会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坚定的革命信仰,高尚的道德情操,人生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个人的前途也会无限光明。”“张海迪的事迹,同我们国家、我们军队众多英雄模范的事迹一样,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sup>①</sup>

爱国不仅表现在像张海迪、女排那样的顽强拼搏、实现有意义的人生,以及为国争光得到荣誉等方面,还表现在受到委屈甚或打击而暂时不被认可的逆境中仍然执著爱国的精神。电影《牧马人》中主人公许灵均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许灵均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偏僻的农场劳动改造,日子过得非常艰苦。1979年,错划的“右派”得以改正,他成为一名乡村小学教师。这时,他的父亲,来自美国的拥有亿万资产的老华侨企业家,试图接他去美国继承自己的事业。但许灵均认为是劳动拉近了他与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感情,是祖国的大自然纯净了他的思想,他决意继续在农场工作,与他患难与共的牧民在一起,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在一起。

因此,热爱祖国、为国奋斗的情怀和行动,源自这个国家的历史(无论是辉煌的还是屈辱的)对人们意识的细雨无声的浸润,源自人民

---

<sup>①</sup> 《像张海迪那样对待人生》,《解放军报》1983年5月12日社论。

对国家的拳拳之心和崇高之爱。这种历史意识所产生出来的爱国为国精神,化作一系列理性的实践。它很宏大,也很细微。它可以表现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成就为国奋斗、为国牺牲的英雄人物;它也可以表现为具体实在地做好每一件小事,成为一个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平凡人。正是这些不同人的不同贡献,形成了爱国为国的庞大群体,推动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推动着祖国走向繁荣富强。

## 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

自强不息,出自中国古代典籍《易经》。其中“乾”卦“象传”里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说,茫茫宇宙(天)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本身不知疲倦地运行着;“君子”应效法天道,永不懈怠,自强不息。这里,我们的祖先找到了“天”之所以“行健”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自强不息,并且以之作为人师法自然的强劲动力。

《易经》强调的这种精神,在中国学术史中有着充分体现。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杀身成仁”,注重的是为了理想勉力而行;孟子的“养浩然之气”,“舍生取义”,要培养的是“大丈夫”人格;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众人”,“天道酬勤”,强调的是自立自强,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奋斗;还有法家的“不法古不循今”,“应时变事变而法变”,主张的是积极有为、通过变革创新达到长治久安;而道家的“以道观之”,“无为而无不为”,则是从另一侧面反映积极有为的精神;还有佛教,虽然是外来学说,其以中国化的面貌展现了“自度度人”、“普度众生”的特别内涵,追求以个人小我成就众人大我的奉献精神,以及历史上那些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等铿锵有力的名句，都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最好的注脚。

自强不息的事件和故事也屡屡在历史上演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诉说着先人的顽强和奋发；岳飞报国、木兰从军等爱国题材，表现着中华儿女的正义和献身；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展示了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与自强不息精神；在积贫积弱、挨打受辱的历史时期，也还是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人民进行着“恢复中华”的不懈奋斗；同时，我们还有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红军长征路的艰辛，延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红岩的不怕牺牲、对敌斗争，西柏坡的“两个务必”、“赶考”态度等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精神，以及在当代和平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世博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在每个特定年代书写的新内容。

“多难兴邦”，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几乎总是伴随着与天灾的抗争，无论是古代女娲补天的传说还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无论是1966年的邢台地震还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以至于1998年的抗击洪水到2008年的战胜雨雪冰冻，都是对中华民族抗击自然灾害、自强不息的生动记忆。尤其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中华民族充分展现了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英雄气概，在灾难中凝聚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抗震救灾精神，筑起了中华民族新的精神长城。人们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中国人以在灾难面前的敢于抗争、勇夺胜利的气概再一次印证了“多难兴邦”这个道理。

民族精神,是推动我们继续前进的内在动力;民族精神,也是生产力。生产力有三要素,即“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简言之就是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这是从经济学范畴或者说从生产力的外延方面来定义生产力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注重从内涵方面定义生产力,这就是“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以及“所谓生产力就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它表示的是生产中人对自然界的联系”等。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强调其外延因素而忽视了内涵,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制度、精神、思想等因素在生产力构成方面的作用。

实际上,最新的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已经将“精神资源”的分析纳入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之中。他们强调企业文化、建立诚信制度、提倡经济伦理、要求回报社会等,都是试图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加入软性因素。马克斯·韦伯关于“清教伦理”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带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的阐述,表达的也是这样的观点。

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受到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影响,也根据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实际体认,中国的企业提出了建设“企业文化”的口号,并视之为企业获得发展的关键。企业文化离不开企业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所以,中国的企业要建立企业文化,一定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细化与深化。从一些企业训言中可以窥见民族精神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如“同仁修德,济世养生”(同仁堂),体现了内修道德、外济民生的理念;“严格苛求的精神,学习创新的道路,争创一流的目标,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宝钢集团),则从传统价值、时代气息、方法途径上表现企业追求;还有“诚信、和谐、进取、务实”,“诚信务实、团结向

上,以人为本,和谐发展”,“行善积德,实事求是”,等等,这些企业文化理念,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企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又如,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大型国际化企业海尔集团,其提出“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真诚到永远”的企业精神,体现了职业态度和社会责任以及追求高标准的文化理念。海尔集团创立于1984年,当时职工不到800人,年销售收入300多万元,亏损147万元。目前已从起初的冰箱这一单一品种发展到拥有白色家电、黑色家电、米色家电在内的96大门类15100多个规格的产品群,并出口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有2万多名职工,加配套厂家有30万之众。2003年,海尔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第一名。2004年,成为唯一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的中国企业。

相反,如果一个企业不注重建设以民族精神为支撑的企业文化,其生产力就一定不能得到发展,至少是不能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大量的“皮包公司”在短暂的疯狂后迅速销声匿迹,就是明证。长期担任联想集团董事长的柳传志曾说,他是1984年创业的,后来与他同台领过奖的著名企业家绝大多数都销声匿迹,翻身落马了。他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把自己企业在改革之中或者是某种变动之中赚钱的方式当做一种铁律。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已经沉寂不再。

需要指出的是,极大推动了改革开放进程的那种民族精神,与狭隘民族主义不是同一回事。1979年进入中国的可口可乐,曾经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代表。“洋快餐”肯德基在1987年登陆中国之前,也经历了多年的争论。在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标志性事件是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加入世贸组织,奥运会和世博会成功申办等)的背景下,如何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同时,避免把中西关系简单地理解为零

和博弈甚至敌我斗争,避免把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争取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博大胸怀简单对立起来,是对中国人民和代表中国人民利益治国理政的人们的智慧和能力的严峻考验。值得庆幸的是,在处理 1993 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1998 年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1999 年的钓鱼岛事件、2001 年的中美撞机事件、2005 年的民间抗议日本反华势力活动、2008 年的民间抗议西方支持“藏独”、阻挠奥运圣火传递等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采取了睿智的策略,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主流媒体与普遍网民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支持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人民群众表达正义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实现对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的理性引导。

### 三、海外侨胞同心支持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资源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另一个独特优势,是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海外侨胞历来具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这是因为除了在祖国有宗亲故友外,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超乎家庭、宗族利益之上的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深厚的爱国情感。在早年,坎坷的道路和悲惨的生活,使千百万华侨深深体会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他们将永远摆脱不了在异国遭受歧视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命运与他们息息相关。

长期以来,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一直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如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六次赴美、九访日本、六下南洋、六赴欧洲,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情相助和支持。他们或变卖家

产,慷慨解囊;或亲身投入,参加革命;或战死沙场,献出生命;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而鞠躬尽瘁。又如抗日战争时期,海外侨胞关注祖国的命运,募款筹资,捐躯报国,媒体声援,拒绝日货等,毛泽东为此赞扬说:“海外华侨也是这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华侨华人为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而欢欣鼓舞,从各方面支援新中国的建设,更有大批归侨抛弃国外优裕的生活条件,满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毅然回国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力量。如钱学森、陈宗基、钱三强、钱伟长、华罗庚、卢嘉锡、吴桓兴、方宗熙、王运丰等一大批著名归国科学家,他们对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仅从1950年到1957年,华侨在国内投资兴办的企业就达50多个,投资额也年年增长,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1978年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探索期,海外华侨给中国带来了大量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其他外资进入起到良好示范作用。他们是投资中国大陆的先驱,是联系中国与各国经贸关系的“红娘”。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与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特别指出:“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80年代之后,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的设立,就充分考虑到华侨的积极因素。这些条件,为侨资侨智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华人企业家谢国民领导的泰国正大集团就是在中国投资项目较多、投资额度较大的侨资集团之一。又如著名侨乡福建省福清市,有80多万人旅居海外,并以每年约2万人的速度增加,足迹遍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称,福清籍海外华人华侨经济实力雄厚,资产总量至少在500亿美元以上,约占世界华侨华人总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1992—2001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积极进入转型期。遍布世界的侨胞以其勤奋、智慧和所拥有的商业网络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凡是去过美国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待你回国前想带点礼物时,发现很难找到不是中国产的商品。有则报道说,2004年圣诞节后的一天,美国商业新闻记者邦乔妮在清理家居时,发现“中国制造”正在占领她的家庭:电视机、球鞋、彩灯、洋娃娃,屋里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经过盘点,发现总共39件用品中,“中国制造”占了25件,中国产品高达64%!圣诞节简直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出来的节日!于是他们夫妻商量,“抵制”中国产品,尝试着一年不买“中国制造”。结果是,这一年里,他们不仅多花了许多钱,多跑了许多路不说,关键的是,换来的是自己的不方便、儿子的抱怨和“反抵制”。

福建省福清的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唯一以“侨”命名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由印尼华侨杨运良的宝力马集团独资兴建,1993年成立,20年来已从一片荒滩发展成目前全球最大的电脑显示器生产基地和全国最大、世界第四大汽车玻璃生产基地。福建晋江鞋都生产的皮鞋、浙江乐清机械有限公司的产品都是侨资生产并销往国外的。浙江青田则有约50万人从事侨资出口,年出口贸易额达50亿美元。2001年以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进入腾飞期。知识经济时代,侨胞在高科技方面又大显身手。

此外如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农业发展等,不可否认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但与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也密不可分。

此外,给祖国大陆亲人的汇款和对祖国、对家乡公益事业的赞助,是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帮助祖国大陆建设的传统形式;还有捐资投资文化教育、卫生、医疗、体育、灾害赈济以及各种慈善事业等,无不表达了他们热爱桑梓的赤子之心。如为了筹建汕头大学,李嘉诚在1979年就

认捐3 000万港元,后来又不断追加到7 000万元、1亿、1.3亿、2.1亿、2.4亿、3.7亿,到1990年2月,汕头大学隆重举行落成庆典时,李嘉诚的捐款已达5.7亿港元。再如浙江省青田县是著名的侨乡,有23万青田华侨居住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侨以结对的方式支助家乡,开展“百侨助百村,千侨扶千户”,已有127个侨团结对85个行政村,1 235名侨胞结对2 169户困难群众,侨胞捐款乡村整治工程金额已达1 200万元人民币。方山乡龙现村是一个山坳里的古老村落,现有700多名侨胞,村中家家户户都是侨眷。村委会主任说:“村里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有90%是侨胞捐建的。”又如广东著名侨乡台山市时任市长吴晓谋说:“改革开放30年来,旅外台山人为家乡文化、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捐款超过13亿元。在捐资家乡公益事业的同时,旅外台山人还掀起了回乡投资的热潮。”<sup>①</sup>汶川大地震后,海外侨胞更是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单项捐赠最高的纪录,全球华侨华人为此赈灾共捐赠款物11.33亿元人民币。<sup>②</sup>

除了在经济上投资祖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海外华侨华人还积极地关注祖国的政治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发展,为祖国的每一个进步而自豪,并自觉维护祖国的尊严和利益。有一位美籍记者这样回忆他的华侨老父亲,说他父亲对中国的看法更新之快总令他感到惊讶。1997年初,他向父亲提及自己将于7月1日在香港报道香港回归的重大事件。父亲当时已是耄耋之年,刚刚接受过心脏手术,但他坚决地说:“我也要去!”在这位记者儿子听起来,这个计划很荒唐。因为乘坐飞机的时间长达18个小时,再说,他为什么要庆祝香港回归?父亲说,他只

---

① 参见《侨报》2008年7月17日。

② 参见《侨报》2008年7月3日。

是想亲临现场，“成为见证这个时刻的无数中国人之一”。后来，父亲果然去了香港，在老朋友的陪伴下观看了交接仪式。这位美刊记者感慨地说：“无数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父亲也不例外。”<sup>①</sup>

广大华侨华人为祖国的每一个重大发明创造而振奋，这种振奋又会激发他们更加积极的爱国报国的举动。像“神舟”飞船的成功上天，激起了多少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华儿女的自豪与骄傲。

同时，在国际政治舞台，为维护中国利益，广大华侨华人在反对“台独”、反对“藏独”和反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等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奋不顾身地与敌对势力作斗争。

尤其是，每当国家困难之际，他们也总是慷慨相助。如2008年，从年初的雪灾，护卫奥运圣火、抵制“藏独”到捐助汶川大地震灾区，华侨华人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有些正在中国的华侨听说奥运圣火在全球传递过程中遇到一些麻烦，他们马上赶回到自己的户籍国，等圣火传递到那里时，出钱组织人力来保护圣火。他们游行抗议、撰文说明真相、募集善款等，以各种形式传递他们对祖国的感情，维护祖国的利益。

“海归”，这一赋予新内涵的名词是大量留学归国人员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表征。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6年底，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7.5万人。而比较集中的回归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8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的出国高潮，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一些海外学子已经成为各界精英。国内的飞速发展，又给他们的回归创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吸引着大批的海外新华侨华人回国寻找发挥才能的机会，寻找报效祖国的途径。“海归”阶层迅速在中国大陆

---

<sup>①</sup> 《从毛时代到现在：美刊记者见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三十年资料汇编》，<http://www.netat.net/news/chinese/2008-01-02/7494.html>。

崛起,逐渐在政界、商界、学界占据了诸多重要的位置,成为我国提倡“年轻化”、“知识化”和“国际化”用人原则的实践者,这些“海归”们正在对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一些“海归”进入企业的领导岗位,有的则自己创办企业。“海归”们不仅了解国外先进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而且拥有在海外企业工作的经历和管理经验,有些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他们的回归,为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自1999年上海实行“聚焦张江”以来,那里以良好的创业环境吸引着全球归国留学人员,一大批“海归”来到张江寻梦、创业。

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海归”们的创业实践表明,“海归”在中国是大有作为的。同时,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创业的经验也表明,我国产业升级的大门已经开启,中国开始步入了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的时代。

## 四、中国要对世界有更大贡献

中国人向来具有“天下”意识。“天下”有空间的意义,来源于古代人对方位的界定,如中国、四方、四海、九州、四夷、五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等。但“天下”并不纯粹是对自然地理的描述,而是更深地包含一种人文内涵,是一个崇高的道德信念,是人们生活的大世界。可以说,中国人的“天下”意识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而且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世界主义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随着现代化目标的推进,不论在地理观方面,还是在人文意识上,更直接和更现实的,在经济规模和发展模式上,

古老的天下观的内涵都得到充实和丰富,并融进世界全球化的大潮。

当“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之时,当国内物资奇缺而发现国外的富足时,当“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观念对人们造成巨大冲击时,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使人们获得精神解放时,人们关于“世界”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转变,逐渐以全球意识来观察中国和世界。“落后就要挨打”、“球籍危机”意识,带来了改革开放强烈的紧迫感和精神动力;加入世贸组织,“与狼共舞”的警句,带来了全球化进程的正负两方面的深切体认和认真应对;“世界一体化”,“为世界增添精彩”的理念带来了更宽阔的视野和更负责任的全球精神。这种精神培育了中国人在各个领域尽量具有和显示世界视野和大局意识。

有一则调查,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通过阅读显示的全球意识的增长。1980—2007年,深圳人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新华书店的一个调查统计结果说明:社会科学类图书销量持续上升。从调查结果来看,该类图书在深圳建市初期的1980年仅占总销量的3.2%,以后逐年攀升,到1996年达到9.7%,1997年以后增至12.5%。社科类图书的消费反映着市民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诸多问题的关怀、探求和参与,也反映出市民的现代意识和全球意识不断增强。<sup>①</sup>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将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承诺表明,在过去的岁月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已经承担了许多的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发展壮大,我国还将为世界的和平和谐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尽到更多责任。

---

<sup>①</sup> 参见《湖南工人报》2008年6月25日。

中国过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许多经济援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如中国在1959年和几内亚建交后就帮助他们建造了道路桥梁等设施;70年代建造了坦赞铁路;从90年代以后,中国成为了非洲最大铁路机车供应国;2006年,又建成了一条非洲最长的现代化铁路——拉各斯至卡诺铁路,全长1315公里,被认为是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献上的一份贺礼。2011年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宣布将给予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的出口产品免关税待遇,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称赞。此外,由于非洲艾滋病、疟疾等疾病流行,中国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捐献药品、派遣医疗队等。

在消除和避免冲突方面,中国也作出了很多努力。如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中国派出维和部队,而且,我们派出的维和部队在那里的表现有口皆碑,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

在国际救援方面,中国的表现同样出色。如参与阿尔及利亚地震、伊朗地震、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地震、印度尼西亚地震以及美国新奥尔良地区飓风袭击等多次国际救援工作。联合国官员评价说:中国国际救援队反应速度超常,已经成为国际搜索救援舞台上一支宝贵的力量。这些救援行动一再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且是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有影响和负责任的国家。

我们还看到,越来越开放的国际化体育浪潮已经改变了国人的心态,有消息评论说中国人的心胸越来越开阔了。《新民周刊》以“走出去,请进来”为标题,列数了许多中国乒乓球教练执教外国球队,如新加坡、德国、日本、奥地利、西班牙、越南、柬埔寨、缅甸、卡塔尔等。<sup>①</sup>许多球队都把中国队当成了最强大的对手,以击败中国队为荣。还有女

---

<sup>①</sup> 参见《新民周刊》2008年第19期。

排、羽毛球、体操、女子举重等很多中国传统优势项目的名帅也给世界体坛带去一片惊喜。郎平 2005 年成为美国女排的主教练,采取中西合璧的执教方式,经过几年拼搏,美国女排重归世界强队之列,并且,郎平带着她的美国女排姑娘们来中国角逐奥运会了。辽宁籍名将姜英执教澳大利亚女排已长达 15 年。还有曾经在 1984 年荣获击剑金牌的栾菊杰,在 24 年后,年届 50 的她代表加拿大参加奥运会。如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坦然面对这一切了。这一现象说明了中国人的国际意识增加,也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参与和起到的积极作用。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更表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尽力。比如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推动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明确提出,针对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应目标明确,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混为一谈。又如,成功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参与六方会谈,加入世贸组织,成功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等。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事务中,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裁军等领域的多边外交舞台上,显示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国际影响力,在国际上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世界所有国家通力合作,共同应对。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不仅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

20 多年前,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提到我国现代化建设

发展战略的大轮廓,即20世纪末达到小康,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进而评价说,“如果达到这一步”,那就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sup>①</sup>如今,“如果”部分变成了现实。十七大报告在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时说:“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一穷二白到小康社会,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面貌。一些百姓的话语最能妥贴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比如“从凭票供应到各色商品应有尽有,从一封家书千里传音到互联网上视频聊天,从看病难到享有医疗保障,从居者有其屋到宜居城市……30年,让老百姓眼中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真实而鲜活的现实生活”<sup>②</sup>。也比如,“过去一衣多季,现在一季多衣”,“吃饱、吃好、吃出文化、吃出健康”,“房屋越换越大”,“从路差车少到路好车多”。<sup>③</sup>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真实地反映出改革开放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变化。

小康生活带来的是幸福指数的提高。据湖南的一个调查,称七成以上受访者感觉“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近八成受访者对个人收入表示“基本满意”、“满意”、“非常满意”;八成以上受访者表示“家庭和睦”、“身心健康”、“心态平和”;八成以上受访者对未来“抱有希望”、“有信心”、“非常乐观”。<sup>④</sup>无独有偶,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对24个国家的民意调查,数据是“86%的中国人肯定国家的前进方向,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② <http://www.hlsxcb.com/view.asp?id=765>。

③ <http://news.rednet.cn/c/2008/01/31/1432634.htm>。

④ 参见《湖南日报》2007年2月14日。

82%的中国人对国民经济感到满意,60%的中国人满意工作和家庭收入”,结论是“中国人最乐观”。<sup>①</sup>

这些鲜活的素材和扎实的数据,让我们形象地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确实,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的生活实现了贫穷—温饱—小康三级跳,使大约2.2亿人初步摆脱了贫困,并且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政府已为2 205万城市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对6 000多万残疾人提供了帮助;中国人的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目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1.9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3亿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这些根本改变,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发展潮流紧密相连。中国还将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

<sup>①</sup> 参见《参考消息》2008年7月24日。

## 第四章

# 巩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自近代以来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更获得了改革开放实践和现实的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体现了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又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统一。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想,中国才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 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制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解决这一历史主题的现实选择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可以说,中国人民是在对自己原来信奉的思想的清算中,在对各种思想、学说、理论的相互斗争、相互比较的争论中,特别是在对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认识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社会主义理想的。

因此,社会主义理想和制度不是历史作为观念直接给予我们的,而是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给予我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意识形态,就在于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的价值追求和现实途径。也正是这些价值追求和现实途径,使得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制度具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而是因为它有符合我们翻身得解放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就在于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获得民主自由权利、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思想武器。

同样,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有建立平等自由正义人道和谐之社会价值理想,并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把其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有空想色彩的部分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生

产力、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方方面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主义也因此显示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据统计,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 624.1亿元。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 553亿元,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 465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2 160元,国家外汇储备为1 450亿美元。199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 054亿元,仍居世界第7位,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 85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2 210元,国家外汇储备为1 547亿美元。<sup>①</sup>至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246 600多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已达到51 3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68%,比2006年增加12 543亿元,增幅达到32.4%,比预算超收7 239亿元;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786元,比上年增长12.2%,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4 140元,比上年增长9.5%;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sup>②</sup>而到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471 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sup>③</sup>一位外国人曾经感叹:中国的数字“令人害怕”:美国为使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50年时间;日本用了33年;韩国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而中国仅用了不到10年的功夫就使其人民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

在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很大进步的同时,中国整体社会主义意识

---

① 参见王秀云:《社会主义三次历史性飞跃新论》,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② 参见 <http://bbs7.news.163.com/bbs/country/74289805.html>。

③ 参见 <http://219.235.129.58/reportView.do?Url=/xmlFiles/d48e481308064b709bfc3d0fa44b18ac.xml&id=4d7cd95e52724019ba95cd931d592559&bgqDm=20114000&118nLang=zh.CN>。

形态建设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有了崭新的面貌,更进一步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感召力。30多年来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时期,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胜利完成了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在内的全面的拨乱反正。第二阶段,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四大。这一时期,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逐步深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第三阶段,从中共十四大到中共十六大。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创新”为灵魂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总体构想。第四阶段,从中共十六大到现在。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到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命题,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 and 心血,也进一步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焕发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社会主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还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受住了一些来自政治上、经济上和自然界的严峻考验。如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夏洪灾,2001年“法轮功”邪教事件,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南方罕见雪灾、汶川大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灾害等。克服和战胜这些困难及挑战,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有足够的力量排除万难,获得自身的发展;也证明了社会主义有足够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能把人民和其他所有

热爱社会主义的人士广泛团结起来,使全国的民众面对困境时能够凝聚成同一种力量,奔向同一个方向,从而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困难,巩固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成果。正如邓小平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 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出现把社会主义与贫穷相等同的谬论,邓小平率先对社会主义重新进行了理性思考。

早在1978年9月,他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sup>①</sup>这里,邓小平实质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标准问题,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标准”一词,但已明确地把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标志。在几个月后的讲话中,他更进一步指出:“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sup>①</sup>这一论述使生产力标准不仅内涵明晰具体(涵盖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福利两个层面),而且成为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具体尺度。

1984年6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sup>②</sup>1986年9月,他在答记者问时又进一步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sup>③</sup>

社会主义是人民相信、人民满意的。“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2页。

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sup>①</sup>“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sup>②</sup>“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sup>③</sup>

正是因为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重新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取得了实质上的突破性认识,继而以此认识为基础,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有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加强。

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服饰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服饰可以用朴素单调来形容,改革开放后转向丰富多彩和时尚个性,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年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就是当时场景的真实写照。《庐山恋》完美地呈现出了庐山的景色,是“文化大革命”后国内首部表现爱情主题的电影,其中女主角张瑜片中的服装,就换了43套,远远超过《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23套旗袍,这更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成为当时年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同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时尚,很多年轻人从服饰中找到了个性和自我感觉。1981年,中国大陆成立了第一支时装模特队,3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从服装的变化上,可以看出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也体现出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人们日益丰富的饮食也是生活质量逐步改善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50年代初我国粮食一度短缺。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干货果品,而且分量都极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一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等,也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同样,居民住房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相比较于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居住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新型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政府也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危改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通过经济适用房,人们理解了什么叫“破旧立新”。一大批居民走出没有厨房、厕所,没有上下水道的老房子,搬进房屋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方便的新楼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风格多样的装修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体现了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

交通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铁路、公路和民航航线增长很快。城市

的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公交线路增多、设施改善,地铁、轻轨等新型交通工具出现,人们的交通观念也大为转变。同时,假日旅游增多,国内游、出国游开始由观光型走向休闲度假型,个性化旅游悄然升温,人们开始真正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

正是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使得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和中国政府的信任度极大提高,这尤其体现在人民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态度上,以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由于当时政府采取了及时处理对策并实话实说,给市民“吃了定心丸”,因此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信任和理解。正像当时哈报网讯采访报道的:原打算带领全家飞往海南躲避的小老板王亮退了一家三口的机票,说政府处理水污染事件的力度让他心里不慌了,有了主心骨。一位叫陈莫的老师退了儿子排了一整夜买来的火车票,很踏实地说:政府说了,停水只有四天,这些日子我哪儿也不去了。

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之所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制度特征,其最直接而现实的根据就在于,它们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种矛盾,然而,这些矛盾的最终解决受制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解决,后者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作为优越于其他旧制度的新型制度,决定了它在解决这一矛盾时不可能像旧制度那样通过削减或遏止人民的需要来实现,而只能去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需要。发展生产力正是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是真正关心民生的。

以1988年发生在全国的抢购风潮为例。这次抢购风潮使整个社

会的经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严峻的形势不仅引起了国际的普遍关注,也导致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极大地影响了民众对改革和政府的信心。中国政府时刻以每个老百姓的生活为根本点,选择了“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方式”。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能够保证多数社会成员分享到改革的成果,使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获得一定的补偿,从而逐步提高民众对改革的心理和经济承受力。

### 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

共同富裕是人类共同理想,自人类有文明史以来,人们就为之探索 and 奋斗。虽然社会每前进一步,就向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更靠近一步,但真正为实现共同富裕理想提供现实可能的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了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这里的“共同富裕”不是一个仅限于物质财富分配的范畴,而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在中国,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体现着中国国情下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公正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在中国国情下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所进行的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是一个游离于人之外的预定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参与其间并影响其进程的历史过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它将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和价值选择统一起来,内涵了社会主义本身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价值内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

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sup>①</sup>。但怎样使全体人民富裕,“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sup>②</sup>。所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内,有一个内在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取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价值目标问题。坚持价值原则,就是用真正反映了人的需要和要求的价值目标指导实践,实践的结果要符合和实现人的需要,否则就不是成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取得的文明成果应该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只能实现少数剥削者的利益需要,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却得不到实现和保障。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全体人民利益的实现,体现了人类主体需要的客观规律,即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尺度,赋予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

所以,如果改革出现两极分化,就将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可以说,共同富裕直接体现为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两者互为条件、内在统一。

而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公正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公正有其自身特有的内涵,真正体现了马克思的名言:“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揭示了社会主义道德所认可的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均衡状态,指明了人们应有的权利义务观念,从而为一切社会利益(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合理分配提供了价值尺度。当代中国,应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当以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判断中国社会公正与否的基本标准。为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经济领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政治领域,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文化领域,应当“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应当包含政治公正、经济公正和文化公正三方面的实质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主体意识、民主法制观念、自主和自治观念增强;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壮大,公民通过非政府力量和途径满足自身需求、保护合法权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社会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补充,成为国家权力回归为社会权利、回归为群众民主自治权利的重要桥梁。这些变化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朝着公正的正确方向发展和完善。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们普遍认识到平等、自由是基本人权,从改革开放前的看重结果均等逐渐转向看重起点平等。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等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人们越来越看重起点的平等,认识到由于发展潜力的不同而造成的机会拥有方面的某些“合理的”“不平等”,逐步摒弃平均主义而逐渐认同机会平等的理念,期望自身能够在有序竞争的条件下获得公平的发展。对平等、自由的理解越来越全面和深入,由过去的“做法律或上级所允许做的事”而发展为“做一切法所不禁之事”。人们对政府组织和领导的依赖性乃至依从性和隶属性也大大减弱。

第二,人们的行为取向已经明显地从先赋性转向自致性。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平等竞争的法则对整个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先赋性的成分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趋于认同靠自身的后天努力、靠个人的能力以及业绩来获得较为满意的社会位置。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时,也逐渐以个人的能力等基本素质为依据。单位在提拔员工时,也逐渐以能力和业绩为重要考核依据。<sup>①</sup>

第三,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增强,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实现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人们积极运用投票选择、自治管理、协商对话、信访和舆论等多种手段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声音。特别是村委会、居委会的直接选举和自治,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参政的责任感和依法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同时,一旦个人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利用法律武器来伸张正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已经不再是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人们已经不再是消极的维权客体,而是积极的维权主体。

第四,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方式逐渐由“人均一份”转向按照贡献进行分配。改革开放以来,按照贡献进行分配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分配方式。它强调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方面的付出数量和付出质量同自己的获得(收益)之间的对称,劳动、资本、技术甚至包括管理技能等均能参与初次分配,是一种公正的分配方式。

第五,个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变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改革开放前过多地强调集体的权利和个人的义务,个人只有为国家和集体做贡献的义务,个人谋取正当的个人利益往往被看做是个人主义。而现在,个人与集体之间不再是行政隶属关系,不再

---

<sup>①</sup> 参见吴忠民:《中国社会公正的现状与趋势》,《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

是简单的目的和手段相分离的两极,而是站在同一个法律平台上的平等关系,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而且随着政府文明的建设,政府等集体为个体服务的功能越来越明显。出现的许多以前从未有过的民告政府的案例,就是个体与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组织之间新型的平等关系的写照。<sup>①</sup>

但是,不容乐观的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社会公正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事实问题。就实际而言,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还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同时,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行业分配差距过大;在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种种投机暴富、不劳而获、不平等竞争等社会不公现象;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没能得到公平解决。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影响社会稳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力。可见,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

中国对和谐价值观念的探索,古已有之。古代就有“和为贵”的理念,体现了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孔子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sup>②</sup>,墨子所说“兼相爱交相利”<sup>③</sup>等也是一种人道和谐的价值观。

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同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都有由其自身基本矛盾决定的特殊社会性质,有其矛盾存在状态和解决方式的不同特点。历史上各个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

① 参见侯惠勤等:《冲突与整合——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50页。

② 《论语·颜渊》。

③ 《墨子·兼爱中》。

都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因而在阶级对立中发展的阶级社会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社会和谐。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所以和谐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人类孜孜以求但还未实现的和谐状态也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的内涵:一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自然界优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的发展要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sup>①</sup>。因此,人既是自然性存在物,也是社会性存在物,既是个体性存在物,也是类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性存在物,只有与自然界保持和谐关系,才能有利于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物和类的存在物,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是通过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界发生物质变换关系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和谐关系。只有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达到了和谐状态,社会和谐才有可能。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生活在由其组成的社会里,通过协调好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推动民主和法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构筑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培育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也是使社会达到和谐状态的必不可少的方面。三是人的各种需求和功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能之间的和谐。人们不仅对物质生活的提高有很大需求,而且对精神生活也有较高追求。不同方面的具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需要和要求不同,尤其要高度重视那些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各方面需求,切实尊重和满足那些曾经为改革作出巨大牺牲的群众的各种正当合理要求,真正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个和谐是社会整体和谐的最终表象,人的各种需求和功能之间达到了和谐,也就意味着社会最终达到了和谐状态。总之,只有这三方面内涵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形成社会的“和谐”状态。

追求和谐,是因为存在着不和谐,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大量不和谐因素。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大量涌现,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我们不能回避,否认和回避矛盾反而会阻碍矛盾的正确解决。要在正确认识各种矛盾的基础上,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增强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综合国力,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全面和谐。

社会和谐的美好前景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映照,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清醒地把握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和共同愿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 四、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古代就有“民为邦本”的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也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民本思想反映出我国古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疾苦的体察和对民众力量的一种认知，在客观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减轻百姓疾苦。但这种民本思想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在古代，民本思想被视为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手段，实质上是一种“驭民”、“治民”之术，是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手段而提出的。古代民本思想在重民、亲民同时又有畏民、愚民倾向，甚至把人民群众看做是无知无识的“群氓”。即使是所谓的“重民”、“亲民”，也是把它看做是对老百姓的恩赐。显然，这种民本思想是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矛盾的。这与社会主义社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不同的。

而社会主义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表达了“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唯物史观就是群众史观。唯物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出发，揭示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史，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劳动人民的历史。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等全部文明成果都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sup>①</sup>“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sup>②</sup>为此,中共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强调以人为本为核心,在对以人为本的诠释中,更加突出了民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sup>③</sup>这段对以人为本的诠释蕴涵了新的内容,标志着我们党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理解更加深刻。一是首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这意味着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二是提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这意味着在以人为本的内涵中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即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这正是党之所以自觉地坚持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根据所在。

仅以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事件为例。1988年1月至3月,上海

---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②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爆发了一次严重的甲肝流行事件,30万人感染甲肝。当时全国有很多单位支援上海58万公斤药材,但各地药价普遍高于国家规定的牌价,高于上海的牌价。如果制成成药按上海的价格出售,全部要赔本倒挂,但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上海市药材公司决定把这些药材一律低价出售。这样高进低出的头10天,就赔了130多万元,但这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尤其是它凝聚了多少民心,增强了多大的政治凝聚力,是无法用130万元的金钱来衡量的。

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本”,不只是一个价值判断,而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即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上,集中体现了科学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以及价值观的统一。因为任何价值观都以一定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为前提,没有脱离世界观、社会历史观而孤立存在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本”,既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上认定人是社会历史生存和发展的主体的意义,又有价值观上指导和评价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意义。

以人为本准确精辟地概括了实现科学发展观所必须坚持的出发点、主体、动力、目的等基本原则,而这些正是构成科学发展观核心内容的基本要素,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统筹兼顾能否实现的前提和关键。“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一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有自觉能动性的基本观点贯彻于社会发展论。在尊重自然、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主体性,表达了人类应该如何能动地改变客观世界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以及这一主体和客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所持的基本观点。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贯彻于社会发展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理应成为社会的主人和社

会财富的享用者。所以,把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充分肯定了人、人民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从实践角度看,把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抓住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总体战略。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本质规定,主要是指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和超越各种内在和外在于的限制与束缚,从而在关系、能力、素质和个性等诸方面所获得的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的过程和境界。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人的素质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关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人本身的发展正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和动力,人本身的天赋、创造性和能力的充分发展是最大的社会财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标准将不再是劳动的耗费,即不再是工作时间和数量,而是组成社会的人的能力和素质的发展。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和改造,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对自身素质和知识的改造和掌握。因此可以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由不自觉地到自觉的过程,在其发展和实现过程中表现为一定的具体性、过程性和相对性。它不是按照抽象的原则推出的结论,而是从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所确定的一个目标;它不是一蹴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而就的,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恒定的标准,其内涵的丰富程度与历史的发展阶段是相关联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程度和评价标准。因此,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一个在不同发展阶段包含有高低不同实现程度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在社会主义社会就要努力争取、到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类所追求的大同理想社会,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才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和竞争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上,同时还体现在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生产力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不能自发地带来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相反,却会使人处于异化状态,导致了人的畸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这种制度把通过消灭剥削和压迫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社会本质,它把如何改变现实中人的存在状态和在这种状态下如何提高人的自身素质等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人的全面发展规定为人在各方面的充分而最大限度的发展,是人由片面到全面、由畸形到完善、由贫穷到富裕、由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做到的。正因为如此,能否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成为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

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正因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高,给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人的全面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和起步。人们的精神状态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个体的存在价值得到进一步肯定,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民主观、健康观、娱乐观等都注入了现代因素,大家普遍思想解放、观念新颖、好学奋进、勇于开拓、修养品德、善于创新、追求幸福、享受休闲,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的整体素质有了全面提升。但也应该看到,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一些党员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有些腐败现象仍然还很突出。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sup>①</sup>由此可见,人的全面发展必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奠定基础、准备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条件的重要过程。

因此,现阶段更应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主人翁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发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引导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他们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全面的发展,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最终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 中 篇

## 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

## 第五章

# 坚忍不拔,艰苦奋斗

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于面对和战胜各种困难和风浪,不屈不挠,顽强拼搏,以这种精神品质成就了发展,不但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也使国家走上了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 一、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著称于世,有着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中国人敬重劳动者,并以“劳动光荣”作为道德共识。自古以来,流传下了许多鼓励人勤奋的语句,如“天道酬勤”,“勤能补拙”,“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尚书》中有“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格言,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饱不忘饥,存不忘亡,福不忘祸,在胜利面前戒骄戒躁,继续保持并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而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也蕴涵着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

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过荣耀,也有过坎坷和屈辱,得顺势而不骄,处逆境而弥坚,一直是民族自强不息、绵延不绝的精神支柱。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无数英烈和人民大众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奋斗的结果。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过程中,为寻找中国出路的革命者就是在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下前进。在红军长征时期,路途漫漫,前后都有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环境险恶,物质条件严重匮乏,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而红军战士却以坚强的意志力,穿着草鞋在雪地、在沼泽中一路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这是一个人类超越自身极限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大扫荡”的恶劣条件,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得以发展壮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军事实力明显弱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经过南征北战尤其是三大战役的艰苦斗争,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

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sup>①</sup>

在当今条件下,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的长征。邓小平曾经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sup>②</sup>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先烈艰苦卓绝、英勇不屈的精神,把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一代代传下去,万众一心,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胜利。

## 二、普通劳动者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多次嬗变。在这期间,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制度体制的嬗变跃迁,日益改变着中国各个阶层民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催生着他们的现代文明意识。普通劳动者们通过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为中国走向富强和繁荣,为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谱写了一曲曲壮丽宏伟的创造之歌。他们中既有不愿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有不甘平庸无为的工人;既有向往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8—1439 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6 页。

出去闯荡、碰运气的城市青年,也有思想活跃、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浮浮沉沉,经历过“下岗”的阵痛与奋起,也感受到“下海”的艰辛与快乐,他们“痛并快乐”着,共同感受着命运的捉弄和嘲笑,经历着上天的眷顾和垂青,用自己的人生际遇,开拓出了一条属于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打工之路。

在这些社会各阶层的打工者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尤为引人注目。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内地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力,涌入城市谋生。这些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往往缺乏起码的职业技能。在谋求某一职业时,他们绝大多数根本拿不出相关的技能证书,但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出于挣钱谋生的热望,有时不得不接受一份报酬非常低廉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地位,也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见证人,也为“农民当家作主”这句话作了最生动的现实诠释。

1991年播放的电视剧《外来妹》,就是最早反映广东地区外来打工者生活和创业的电视剧。它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初,6个从穷山沟来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不同命运。如今,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可能已经被淡忘,“打工”的形式和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不同文化的冲突、人生遭遇的变化仍然困扰着每一个外来农民工。如何找寻自己的位置,怎样获得真正的幸福,人们似乎没有停止过追问。因此,剧中外来妹的悲欢离合,成功与失意,今天看来仍会觉得似曾相识,尽管现实生活没有电视剧那样传奇,但时代的变革和外来妹命运的转折是具体而可信的,也曾经激励了许多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敢的心。《外来妹》让我们有机会重温漂泊的甘苦,体味生活的绵长意义,更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群体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实现自身价

值,直面艰辛生活的奋斗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也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成员,他们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曾经受到过不公的待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重新确立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心有余悸,一方面欢欣鼓舞,重新在自己的知识领域中小心翼翼地焕发青春。在他们中间有一定经营意识的人,领会国家政策,抢得了致富先机,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成为国家鼓励和倡导的“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而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依靠制度安排,谨慎度日。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对现代化进程的展望的乐观主义情绪感染了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成为自由职业者,利用自身的知识去创造财富,成为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他们越来越主动地投入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

袁隆平,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代神农”、“米神”等。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

奖。从袁隆平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

改革开放至今,普通老百姓不同程度分享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但财富的二次分配与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不完全对应的情况,很多人感到自身所获依然与自己工作所创造的财富不相匹配。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呈扩大趋势。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使劳资关系变得比较紧张,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为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较强的竞争优势,但是,对普通劳动者个人来说,他们更加关心工资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长期处于贫穷和健康缺损状态,心态就容易失衡,甚至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状态。他们中有进城的农民工,有国企的工人,也有民营企业中的劳动者。不良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对普通劳动者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一些企业,由于竞争激烈,为了按时赶工赶时间,经常要求员工在正常8小时工作之外加班。根据一项专业调查,国内IT行业75%的员工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有的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不加班就是不热爱工作”;也有的公司甚至为员工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就是为了方便员工加班。2006年5月28日,25岁的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全身多个器官在一个月中不断衰竭而不幸去世。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胡新宇从事封闭式的研发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sup>①</sup>“胡新宇事件”一出,顿时在各大媒体和网络上带来指责声一片,并引起了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热烈讨论。

---

<sup>①</sup> 参见 <http://focus.scol.com.cn/zlk/20080310/200831085053.htm>。

作为全球五百强企业的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进入中国大陆以后,不断传出公司内部在员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自2010年1月23日员工“第一跳”起至2012年1月1日止,其在中国大陆各地的分公司已发生十余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有专家分析认为,富士康的跳楼自杀事件是整个社会自杀问题的集中反映,也与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缺失有关。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流水线上的工人重复着简单的劳动,会带来心理压力,再加上他们在恋爱、考核、奖惩及人际关系处理中遇到困惑而带来的情绪波动、思想郁闷、精神痛苦,这种情况下他们更需要关怀。富士康跳楼事件是一个普遍问题的集中反映。

新浪网援引《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7日的一则报道:“近日,就国内一些地区出现民工短缺的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的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结果显示:民营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尤为严重。”<sup>①</sup>用工荒预示大调整的到来,很显然,这一现象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重大转折关口。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不再能保持原来那么高的速度,这必然导致产业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进而波及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在面对用工荒的同时,我们发现还存在着几乎相反的另一现象:大学生就业难。2011年大学毕业生高

---

<sup>①</sup>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08/05343612560s.shtml>.

达660余万人,较2010年增加30余万人,而2012年这一数字将再增加20万,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未有改观。

在中国当代社会群体中,有所谓的“北漂”一族,他们是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的、非北京户口的、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们。这些人几乎都是青年人,多数人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中有画家、作家、音乐人、演员、IT工作者,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没有一个稳定的家,漂在北京,他们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去发展。他们在北京没有亲人,今天在这里工作,明天在那里工作;他们也没有多少存款,但唯有一样东西对他们非常重要,那就是对梦想的执著。《新闻晨报》曾对“北漂族”之一的歌手杨坤进行过采访。在采访中,杨坤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状态进行了真实的解剖:“1990年开始唱歌……我一直都在酒吧唱歌,北京大大小小的PUB几乎都唱过,就这样唱了近8年才有机会做唱片。从1994年到2002年,我始终没觉得北京是我的家,站在那个城市,我没有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直到2002年,我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后,才渐渐觉得北京是自己的一个家。不过,一直到现在,我在北京的住处仍然是租的,没有买房,似乎漂泊惯了,觉得有个固定的家会让人太安逸,先前我搬过50多次家,就是不想让自己太安逸,否则创作的冲动就没了。”<sup>①</sup>

……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当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中国的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更是千千万万打工者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结果。也许他们有不同的个人境遇和生活方式,但是,那种为了改变命运,摆脱贫困,实现理想的愿

---

<sup>①</sup> 《成名,不是北漂终点》,《新闻晨报》2004年8月9日。

望是最真实而热切的。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使中国人民跨入了与世界同步的新时代,其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会忘记那些默默承受工作和生活压力的普通劳动者的身影,也要在发展中解决他们的问题,抚慰他们的心灵,肯定他们的工作精神。

随着相关法律和政策的逐步完善,我国政府先后免除了农业税、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增加了职工工资,使越来越多的群众有渠道维护自身权益。同时,高科技——电脑和网络也在瞬间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党和政府正带领着全国人民迈步小康之路。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要努力实现普通劳动者从“人口问题”到“人口优势”的转变。中国的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但是,现在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已从人口数量问题转变为人口质量问题。在人口质量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素质高的人群生育率下降,素质低的人群超生情况相对突出,这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而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动力问题,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现状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问

题”,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始终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作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作为人口负担过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逐步将“人口问题”转变为“人口优势”。总结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我们坚持从劳动力丰富而且廉价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走上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制造业立国的发展道路,从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才使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基地”。正如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2007 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一书中统计认为的:1990—2005 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例从 53.4% 降低到 41.4%,降低了 12 个百分点。所以,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劳动力丰富而且廉价的比较优势不仅在过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现在仍是中国成功的“法宝”,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将是制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出发点。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投资环境的变化、劳动力工资成本的持续上升以及人民币不断升值,一些地区持续出现“用工荒”等多种因素所引发的某些制造企业的倒闭、外移等,引起了不少人对中国“人口竞争优势”的讨论和质疑。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依然十分充足,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导致的就业形势严峻问题挥之不去。人口学家们普遍预测,中国的人口峰值将出现在 2050 年,这就说明至少在未来的四五十年内,我国

劳动力丰富的基本国情不会有根本改变。

因此,把劳动力比较优势作为我国的一个竞争因素,仍然是未来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一是我国劳动力数量庞大、就业形势严峻的现象将长期存在。二是我国劳动力素质较低的现象将长期存在。虽然我国的教育和培训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劳动力素质不高却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国情。三是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较低的现象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吃苦在前、节俭当先,把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继续坚持下去。

### 三、在国际国内风浪面前清醒而又顽强地扎实奋斗

中国在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的各种压力和困难。不仅大雪、洪水、地震、旱灾等天灾肆虐中国大地,而且人祸——如“法轮功”等——也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国家的肌体,更有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所谓“违反人道”和“中国威胁论”的旗号,对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和中国政府造谣中伤,鼓惑煽动不法分子,唯恐中国不乱。

1999年5月8日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使馆建筑被严重毁坏。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不幸遇难。得悉噩耗,中国政府于5月8日发表声明,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了严正要求。同时,全国各地的广大群众、海外侨胞、留学生纷纷就此举行座谈、集会、游行、发抗议信或抗议电等各种活动,拥护我国政府的严正

声明,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行径。袭击事件发生后,世界舆论也为之哗然,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纷纷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这一野蛮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2008年3月14日,极少数不法分子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肆意打砸抢烧,一些暴徒殴打和砍杀无辜群众,焚烧学校和商店,哄抢商店和银行,破坏公共设施,拉萨弥漫在一片恐慌之中,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面对这样的疯狂,达赖集团和一些别有用心心的西方媒体却歪曲事实,居然谴责是中国政府“镇压”了他们的“和平抗议”。面对“藏独”分子的暴力行径,面对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武警官兵和警察没有使用任何杀伤性武器,以血肉之躯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力维护社会秩序。中央政府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并采取了一系列有理有节的措施,有效遏制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维护了祖国统一。

同时,在北京奥运火炬于全世界传递的过程中,“藏独”分子妄图破坏、干扰火炬传递。消息一经公布后,海外华人和世界各国具有正义感的人士,纷纷对“藏独”分子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谴责。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北川,8级强震猝然袭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重创了约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2010年4月14日晨,青海省玉树县也遭遇了7.1级强烈地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2010年8月7日22时许,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突遭强降雨,县城北面的罗家峪、三眼峪泥石流下泄,由北向南冲向县城,造成沿河房屋被冲毁,泥石流阻断白龙江,形成堰塞湖,造成特大泥石流灾难。

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

D301 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 D3115 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这次事故造成 40 人死亡,172 人受伤。经调查认定,此次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在事故抢险救援过程中,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存在处置不当、信息发布不及时、对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

从 1998 年的抗洪到 2003 年抗“非典”,从 2008 年初的抗冰冻灾害到汶川和玉树的抗震救灾,从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到温州动车出轨事故,中国政府和人民经受着重大的天灾和人祸的考验。从政治风波、“炸馆”,到“撞机”、“法轮功”……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别有用心的举动,使我们无法安之若素。但是,面对这些国际国内的重大压力和考验,我们的民族总是能挺直脊梁,不屈不挠;我们的党和人民总能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不畏艰难、团结协作,直至夺取最后的胜利;我们的政府也总是以实际行动,理性而务实地面对一切困难;我们的领导人也正用行动实践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诺言,扎实推进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使在艰难困苦中的广大人民群众深受感动,备受鼓舞。中国政府和人民无惧于一切艰难困苦,将继续沿着正确的发展道路勇敢前进。

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的变革时代,尽管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国际上,我们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的压力,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压力,面临着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渗透的压力;从国内来说,改革仍处于

攻坚阶段,社会情况出现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改革中利益分配不公,社会发展不平衡等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出来,所有这些因素都必然会给思想政治领域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天灾和突发性事件,更是要求我们要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精神,团结起来,继续发扬我国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 四、中国达到“小康社会”以后仍然需要艰苦奋斗

30 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78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 206 亿美元,2006 年达到 1.76 万亿美元,增长了 84 倍。而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显示,2011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36 42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2.5%。<sup>①</sup>2012 年 4 月 10 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 8 59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并扭转了前两个月累计逆差局面,实现 6.7 亿美元顺差,全年实现 10% 的增长目标仍然有很大的希望。<sup>②</sup>1978 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 10 亿美元,而截至 2011 年末已突破 3 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教育、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对外交流也

---

<sup>①</sup> 参见 <http://news.cntv.cn/20120303/111397.shtml>。

<sup>②</sup> 参见 <http://finance.eastday.com/economic/m1/20120419/ula6499547.html>。

日益增多,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通过相互学习,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很大提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sup>①</sup>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而且也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主流文明之中。

统计表明,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在这30多年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现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已经相继认可了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已经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有分量、负责任的大国,并逐渐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使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裕生活,还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是我们致富奔小康的思想武

---

<sup>①</sup> 参见《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全文)》,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11/19/content\\_9254101.htm](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11/19/content_9254101.htm)。

器。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实现宏伟目标,需要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和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瞩目。但是,在这种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环境下,盲目乐观、骄傲自满的情绪滋生横行,沾沾自喜、骄奢淫逸的情绪泛滥,经济上贪污腐败,生活上腐化堕落,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随着我国党和政府对反腐倡廉斗争的不断深入,很多贪官和不法分子纷纷落马。

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的成克杰,伙同情妇疯狂攫取钱财,大肆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达 4 000 余万元,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被执行死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据统计,截至 2006 年,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 800 人左右,近年来陆续缉捕到位的有 320 人,涉案直接金额达 700 多亿元人民币。同时,在全国各地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 都有情妇,相当多的干部腐败与“包二奶”有关。安徽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受贿 70 多万元人民币,于 2005 年 9 月被依法逮捕。他包养 8 名情妇,被揭发运用现代企管 MBA 知识管理“情妇团队”,后因失宠的“首席情妇”揭发,这出荒唐丑剧才得以曝光,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同志:我们要警惕敌人包裹着糖衣的炮弹的进攻,他还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只有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才能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巩固执政

党的地位。各级干部如果淡忘了或丢掉艰苦奋斗精神,就必然会导致贪图享乐、把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进而不择手段地攫取个人利益,最终导致腐败。

因此,各级干部只有像焦裕禄、郑培民、孔繁森那样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事为民所做,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执政党的地位才能自然得到巩固。而不应该像成克杰、胡长清等那样忘记了党的宗旨、不关心群众利益、贪污腐败、失信于民,最终威胁党的执政地位。

成由俭,败于奢。人民群众也只有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才能发家致富,提高生活质量。李嘉诚一开始并不富裕,而是靠着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才造就今天的成就。即使今天成了全世界的大富豪,李嘉诚的生活还是很节制,从不挥霍,还经常捐钱给福利事业。他佩戴仅值 26 美元的手表;跟家人的聚餐通常是简简单单的四菜一汤。有一次,李嘉诚接受《财经》杂志的采访,记者看见他穿了一套已经洗得褪色的西装,皮鞋的前面已经裂开了一个小口,便说道:“看到您我简直难以相信您是华人首富,我觉得您更像一个平凡的慈祥的长者。”李嘉诚听后认为,之所以选择三十年如一日的的生活,是因为生活简朴便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赚钱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实现人生价值、挑战自我的手段,所以无论有多少财富,他的生活享受与 30 年前无异。

2012 年是雷锋逝世 50 周年,也是毛泽东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49 周年。2012 年 2 月 27 日,中宣部举行“学习践行雷锋精神”新闻发布会。发布会认为,在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学雷锋活动,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它有助于激发人们思想道德建设热情,激扬人们心中蕴藏的美好思想品德,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匡正道德失范,矫正诚信缺失,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引导人们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实践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创造者。雷锋精神与社会价

值的主流和方向相一致,与人民群众的美德和共识相契合,与时代发展的节律和内涵相衔接,它植根于当代中国文化主旋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土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长期培育的结晶。雷锋的许多事迹和品德,如忠诚奉献、助人为乐、勤俭节约、谦虚谨慎等,既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它的核心是讲奉献,是脚踏实地工作,是拼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好的精神状态就是一种敢于拼搏、敢于创新的闯劲,就是自强不息、永不满足的韧劲,“艰苦”不是目的,贵在“奋斗”中进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寓意着深刻的忧患意识,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定要长期艰苦奋斗、节俭办事的思想意识,一定要常怀自警之心,精打细算,严格把关,真正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用在刀刃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也是慎自律的道德诉求。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应成为我们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多难兴邦,自强不息。坚忍不拔、艰苦奋斗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国人得以生生不息、血脉延续的内在动力和品质,它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各种各样的风险,经受住现在以及未来各种各样的困难和考验。



## 第六章

# 大胆尝试,勇敢闯关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从解放思想、打破“大锅饭”,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再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方向的根本理念,既需要科学的理性,又需要胆识和极大的政治勇气。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的道路,大胆尝试、勇敢闯关是贯穿始终的精神品格。



## 一、打破小生产方式和计划经济模式的习惯思维

长期以来,一直是小生产方式在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小生产方式,是指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 and 经济单位,家庭成员是基本生产单位的基本成员。传统中国社会的小生产大致上可以区分成农民小生产与手工业小生产两种,其中又以农民小生产方式为主。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生产的主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劳动分工主要是依据性别而来的男耕女织。在几千年的生产生活中,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相对贫乏,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始终局限在家庭经营的模式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所以这种农民小生产方式一般被人们称作小农经济,相应地,也就把农民的思维方式称为小农意识。

说起小农意识时,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拉帮结派、封闭守旧、目光短浅、视野狭窄、自由散漫、缺乏纪律。不过,这种简单否定的做法并没有认识到小农意识背后所反映的具体生产方式的影响力,也没有认识到小农意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民性相关。有人说,中国的国民性其实就是农民性,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平均主义的倾向,即所谓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第二,保守主义的倾向;第三,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第四,内向的、压抑的封闭主义倾向。<sup>①</sup>从根本上说,这几种心态的形成都与小生产方式有关。比如说平均主义倾向,就植根于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土壤之中。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农业的进步,产量的提高,都直接依赖于单位

---

<sup>①</sup>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75页。

面积劳动力的增加。而中国地少人多的局面,使得农民形成了牢固的“有限资源”观念。“(土地的)平均不仅在意识上而且在事实上也成了中国农民生存的基本前提。”<sup>①</sup>再比如说保守主义倾向,也与农业生产方式一贯是“靠天吃饭”,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十分低下直接相关。这就导致农民因循守旧,害怕任何变动,因为变动所带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他们无法承受的后果。

1949年以后,农村经历了土改、“大跃进”、公社化、“学大寨”等一系列变化,但农民的心态和习惯思维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红薯饭、茶麸火,除了皇帝就是我。”这句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在江西大部分地区流传的民谣,就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在江西农村广泛存在的受传统小农思想影响而产生的自我满足情绪,也表明农民的生活方式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未有大的变化。

伴随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这样评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说白了,就是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变,把经营权即耕种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其产品在交纳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之后的剩余部分归自己,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产到户’,也叫‘家庭承包经营’,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了,一则因为大家都享受到了这一改革的实惠,二则它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但这一改革,即使在粉碎‘四人帮’

---

<sup>①</sup>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9页。

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它违背‘两个凡是’,违背当时党中央的《决定》,按照传统观念,就是搞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安徽、四川一些贫困地区搞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凤阳县小岗村村干部搞的大包干的‘秘密协议’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农民实在无路可走了,他们要吃饭,他们要生存,继续走‘一大二公’的路子实在走不下去了。于是,他们胆子壮起来了,有点天不怕地不怕了,要为生存而斗争了。”可以说,正是农民自发地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才有了中国的改革。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人们常常称赞当年若干个‘1号文件’的作用,现在回头看,‘1号文件’根本不是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是行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从一系列数字中得到说明: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为30477万吨,1984年达到40731万吨,平均每年递增4.95%;棉花总产1978年为216.7万吨,到1984年达到625.8万吨,增长了188.8%,平均每年递增19.33%;油料总产1978年为521.8万吨,1984年达到1191万吨,增长了128.2%,平均每年增长14.74%。<sup>①</sup>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包产到户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小农经济方式。以苏南为例,在1983年苏南也基本上实行了农业生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当时已有一定积累的乡镇企业并没有分掉。<sup>②</sup>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承包责任制并不是分田单干。在承包制下,集体经济的所有制没有变,土地等生产资料仍然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是获得了使用权;虽然种田的任务分配到户了,但生产队或者村集体仍在一定的程度上贯彻集体经营,诸如统一种植计划、统一兴修水利、

<sup>①</sup> 《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sup>②</sup>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1页。

统一用水、统一抽调劳力等。<sup>①</sup>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其意义不限于农村，它使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sup>②</sup>可以说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变迁分为启动和巨变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以联产承包制改革为主，后一阶段是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农村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

从1978年开始，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惊人。1978年，我国乡镇企业为152.4万个，职工人数为2 826.6万人，总产值为494.1亿元；1985年，乡镇企业为1 222.5万个，职工人数为6 979万人，总产值为2 728.4亿元；1988年，乡镇企业为1 888.2万个，职工人数为9 545.5万人，总产值为6 495.7亿元。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更加迅速。从1992年的乡镇企业2 079.2万个，职工人数10 581.1万人，总产值17 975.4亿元猛增到1994年的乡镇企业2 494.5万个，职工人数12 018.2万人，总产值42 588.5亿元。<sup>③</sup>我们可以从一位普通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回忆中，感受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闻宝恒是北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③ 《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京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党支部书记。据他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92年春节过后，镇里要求各村组织党员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我们拿到手的学习材料是镇党委副书记传达谈话的录音带。我听着录音，心情越来越激动。尤其是听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些内容时，我感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找到感觉了。我在讲话中看到了我们村子的希望！散会后，我又把南方谈话内容反复听了好几遍。晚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以前曾经有过但是一直被压抑着的念头像水泡一样咕嘟咕嘟往外冒。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就等着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了。经过村党支部周密的讨论和研究，我们决定利用村子地理位置好的优势，以股份制的形式建一个加油站。万事开头难。筹措资金更是难上加难。当时村集体的账上没有一分钱，而建一个加油站的起步资金就得100万元左右。大部分村民对建加油站持观望态度。怎么办？我首先拿出1万元，其他村党支部成员也带头入股，筹到了30多万元。我又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了合作单位，资金终于到位了。1992年底，加油站建起来了。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加油站效益不错，股民分了红。1993年，我们又相继建起了农场、养猪场和造纸厂，也都是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经营的。刚开始，有些股民年底分红时有争议，认为同样辛苦一年，到手的红利却有多有少。这说明有些村民还没有摆脱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就反复做工作，给大家讲‘谁投资，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道理。1994年以后，村民们对股份制已经有了普遍的认可，参股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我们也在摸索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结构合理、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产权制度。最近我们刚刚统计出来，全村70%左右的村民都成了股民。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实行，使村经济有了突

破性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到今年7月份,全村经济总收入2亿元,人均年收入1.35万元。种猪场有位股民,2003年仅年底分红一项就拿到了10万元。”<sup>①</sup>

在这样的改革历程中,农民的心态和观念也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建立只是农民为了生存而采取的一种本能反应的话,那么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发展不仅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器,也为中国农民彻底改变其传统思维方式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和载体。产业发展中的市场压力,迫使每家乡镇企业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以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那种因循守旧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新技术、新事物、新要求呼唤新的价值观和交往方式。

根据无锡市有关部门的调查,农民的思想观念已经出现十大变化,如从封闭保守向城乡结合、全面开放的转变,从重农轻商向“无商不活”、“以销促产”的转变,从“不患贫而患不均”向敢于“冒尖”的转变等。<sup>②</sup>而相应地,观念和意识的更新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变化和精神因素的作用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在观念和实践的互动中,中国新型农民的视野、追求和活法都变得更加丰富健康。脸也许还是黑黝黝的,手也许还是粗糙的,但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技能,他们对经济社会政策的敏感和适应能力都将不同以往。今天的温州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宁做鸡头,不甘凤尾;今天的温州企业一般分工明确,质量优先,注重诚信。所有

---

<sup>①</sup> 参见《北京日报》2004年8月19日。

<sup>②</sup> 参见汪长根:《苏南农民企业家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这些经过市场打拼而成的文化品格依然体现了道不离器的精神。温州有许多全国第一,如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全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苍南金乡镇信用社,全国第一家私人跨国公司,全国第一条内地与香港合资兴建并运营的地方铁路——金温铁路。胆量和气魄并非天生,多半来自家用电器修理、矿灯配件购销、自产自销多品种螺丝等家族型小企业的务实实践;来自“一双手”(手工制作)、“两条腿”(外出营销)、“三分邮票”(订单邮寄费)、“四小产品”的白手起家;来自“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无所畏惧。真可谓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有了资本,有了经验,更增添了创造的勇气和智慧的领悟,更加坚定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我发展的信心,于是才有可能在别人看不到商机的地方发现商机。

## 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体制和机制

农村悄悄发生变革的同时,中国的城市也发生着巨变。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为我国工业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越来越显现出来。诸如计划制订与实施严重脱节,经济制度缺乏激励机制,劳动者劳动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使得整体国民经济效率极低。<sup>①</sup>这些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所确立的工业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总体发展目标未能实现,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

---

<sup>①</sup> 参见瞿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相当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表现为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政策和发展战略,克服计划体制的弊端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内在要求。

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以下几个事件可以作为标志: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1993年,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宣布要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确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三个时间段,不仅展示了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而且表明了中国改革的逐步深入,不断突破。如果说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是第一次思想解放,那么建立市场经济、冲破姓“资”姓“社”可以说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逐步深化,促成第三次思想解放,即在1997年提出所有制改革的问题。

每一次改革的深入,都像破冰之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就是经历了20多年的实践才最终得以实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感慨地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所遭遇到的阻力:“(有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提出这是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他们运用类似八十年代初期批判‘商品经济论’时的论据和语言,断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进而断言‘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这种针对市场经济的理论有

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批判,不能不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混乱,使他们无所适从。”<sup>①</sup>幸好在众多的争论面前,我们党因势利导,旗帜鲜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突破不仅是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基层民众不断自我开创的结果。一批批民众自发自觉地大胆尝试,造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王玉清是一家纺织品公司的经理。回忆起当年的岁月,他不无得意地说:“我今年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回想这20多年的经营,我几乎没遇到过大风大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上还没有‘下海’一说,我就已经提前‘试水’了。当年也是年轻气盛,‘摸着石头过河’嘛。我扔了国营企业的铁饭碗,到街道三产。当时我特别看好布的销售市场,并把第一步迈向了市场上不起眼,但特别缺少的儿童服装及中老年加肥服装。因为我好了市场空缺,很快引起市场共鸣,我也第一次尝到了顺应市场生产的甜头。不过,因为我闯市场闯得早了点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经济还唱主调的时候,我还差点出事。当时市民要凭票买布。购买一米的卡(的确良卡其)布,需要6元多现金和3寸布票。我看准了的卡布的市场潜力,就购买了白色的卡布,然后自己送到染印厂染印后拿到店里销售。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所以的卡布一米只卖3.6元,而且不需要布票。这样布的零售价格就降下来了,销售方式变灵活了,来买的卡布的顾客当时络绎不绝,一天就卖了好几万元钱。去农村卖的时候,农民都抢着往你手里塞钱。我们一共卖了好几车。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当时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违反了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属于典型的投机倒把行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是要坐监狱的。有关方面正在收集我的‘罪证’时,国家

<sup>①</sup> 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取消了统购统销政策,市场彻底打开,布票取消了。我的‘投机倒把罪’也就不了了之。现在想起来,这多亏‘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要不然我很可能会蹲监狱呢!”<sup>①</sup>

除了上面这种“公然违背”旧有制度的做法外,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即在表面上不违背既定制度,而通过某种方式从事制度其实不允许的事情。比如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正式实施,正式宣布自然人也可从事外贸经营之后,第一个以自然人的身份申请取得了第一号备案登记表的马龙,其实早就从事外贸生意了。马龙承认,由于他自己的企业注册资金只有3万元人民币,而一直以来,国家对外贸经营主体要求非常严格,最低注册资金标准为50万元人民币。所以虽然他早就开始从事外贸生意了,不过那是没有名分的,叫好听是“外贸自由人”。原来做成一笔生意麻烦极了,先要挂靠在一家大公司下,然后还得按时间或成交单金额向挂靠公司交管理费或手续费。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生意,可他没有合法身份,合同要盖外贸公司的章,还得在外贸公司走账,就得交代理费。而且在一些业务上也要看对方方便时才能办理,自然不如自己从事业务方便。直到《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实施之后,他才名正言顺地做起了外贸生意。<sup>②</sup>其实,不管是“公然违背”,还是“暗度陈仓”,都是对旧有制度的突破和改进。

### 三、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在3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也越来越频繁地

---

<sup>①②</sup> 参见《北京日报》2004年8月19日。

加入世界经济大潮。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各国和各地在“信息高速公路”下,时间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全世界的生产、贸易、资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着,这些就构成了所谓的经济全球化。随着麦当劳遍地开花,耐克鞋满地走,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新世纪里全球化的浪潮迅速席卷五大洲。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际贸易成为发展经济至关重要的因素。1978年世界贸易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9.3%,而1998年上升到24.3%,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5%,而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投资)则年平均增长25%,全球股票的总市值增加了250%。到90年代末,全世界虚拟资本的流动量达到平均每天1.5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50倍。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力 and 载体的跨国公司实力不断增强。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设立子公司,不仅可以绕过许多壁垒,迅速掌握当地的市场需求,有效利用当地资源,也可以通过内部贸易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这便促成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球化。

中国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经历了15年的漫长谈判后,于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来,中国把握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增强了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地位也得到很大提高。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连续6年增长20%以上,首次跃上2万亿美元的新台阶。其中,欧盟、美国、日本是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在2007年,中国出口达到12180亿美元,继续成为“世界工厂”。到2006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而到2008年4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增加到1.7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世界主要

七大工业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简称 G7)的总和。2003—200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4%,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 4.9% 的水平。同时,我国的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在世界上的排名大跨步前进。2005 年底,中国 GDP 增加 16.8%,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 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 年,中国 GDP 增速为 13%,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仅 3 年之后,在 2010 年,中国 GDP 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入世”十多年来,我国的出口规模增长 4.9 倍,进口增长 4.7 倍;吸收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投资 2002—2010 年年均增速接近 50%。<sup>①</sup>

但是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从国际经济秩序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少数发达国家起着主导作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这一过程是一种不对称的交换。发达国家所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所得。基于此,有人甚至将经济全球化称为一种“陷阱”。这样的全球化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垂直分工体系。体系的低端是发展中国家,生产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而高端是发达国家,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如在 1997 年的中法贸易中,法国向中国出口的第一类产品是 24 架空中客车飞机,这 24 架空中客车飞机价值 12 亿美元,而中国向法国出口的前十类商品包括鞋帽、衣服、小的家具、家用电器等,前十类商品的总和才不到 10 亿美元。这样的经济全球化不是利益和利润的全球的均衡分配,一方面是发达国家获得大量的价值转移、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人打工,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世界也在不断地分化,国与国之间的

---

<sup>①</sup> 李子阳:《开放发展与世界共赢》,《经济日报》2012 年 6 月 5 日。

差距越来越大。<sup>①</sup>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的差距从 1983 年的 43 倍扩大至目前的 60 多倍,贫困国家的债务超过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80%。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差距悬殊,前者为后者的 200 倍以上。

其次,全球化在带给各国利益的同时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和危机。经济全球化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国内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产生经济波动和诱发一国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极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两次颇具影响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成功地克服了种种困难,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其他国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中国实行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和前几年采取了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在危机中未受到直接冲击,金融和经济继续保持稳定。与此同时,为了帮助亚洲各国,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政策缓解亚洲金融危机。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巨浪滔天,世界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险象环生。中国经受了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2009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50%。这是二战以来全球首次出现的经济新格局。外国媒体感叹道,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sup>②</sup>

最后,经济全球化也是一种斗争。对于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种种

---

<sup>①</sup> 参见房宁:《反思全球化》,《凤凰大讲堂:精粹版(2001—2005)》,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sup>②</sup> 《迎接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答卷”》,《人民日报》2010 年 1 月 5 日。

原因发展起来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发达国家采取了种种遏制手段,它们不希望再有一个新的发达国家了。在这些发达国家眼中,全世界资源和市场都是有限的,它们不愿意其他国家来分享。所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始终处在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的过程中。这种博弈在中国对外贸易的谈判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正如业内人士所言,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主导了生产,但主导不了贸易。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低中端加工生产环节,成为境外企业、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夹心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各国及其人民的文化交往也日益增多。有人担心,全球化进程中的许多文化交流,主要反映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利益、价值和思想,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美国的通俗文化在全球传播,即世界的“麦当劳化”。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提出了警惕“单一思想全球化”或“新的专制”的问题。他们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念曾遇到过各种敌人,但在21世纪到来之时,我们已经几乎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声音了。对代议制民主的迷信、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崇拜、对效率即利润的渴求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一切与之不同的声音,或是被贬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或是被简单斥之为过时的谬论。人类思想的高度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限制,变得极度的统一,极度的沙漠般的贫乏。与此同时,也有人用民族文化的大旗来反对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的引入必然导致民族文化的衰退。比如,2006年发生“十博士反对圣诞节”一事。在那年圣诞节将要来临之际,国内十位哲学或教育学博士发出联合署名倡议书,号召慎对圣诞节。他们认为“圣诞狂欢”是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丧失后,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一时间引起了沸沸扬扬的网路大讨论。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疑虑,我们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人类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种文化宣称自己是最好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强迫所有人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接受它。这样的“普世”近乎强权。更加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倒是应学会以文明健康的方式与各种不同的文化样式相处,在彼此交融之中,各自取长补短,发展自己,并且从另一种文化的存在中确认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空间。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求同存异,在很大程度上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可以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成果。只有按照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而且“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我们才能在全球化的挑战面前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令人欣慰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绝不是仅仅在被动地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也在积极展示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截至2010年10月,各国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事实表明,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反而在兼容并包中不断壮大。

## 四、政治勇气和历史责任的高度统一

中国要往哪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推进？科学发展观如何真正落到实处？这些命题的破解需要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更需要非凡的政治勇气。

小岗村“包产到户”，在当时就是很严重的“违规操作”。其实，大凡想在改革中努力做点实事的人，都可能面对“违规操作”这个问题。因为旧有的体制虽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在新体制建立之前，仍然有其合法性。想要改革，想要有所突破，那就不得不或明或暗地“试错”。

当代作家周梅森的小说以反映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人物著称。在他的小说《我主沉浮》<sup>①</sup>中，形象生动地描述赵安邦这样一个省级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中经历的风风雨雨。在小说中，赵安邦是一位发展经济的能手，但同时也是一个屡次因违规操作而受到非议的人物。他甚至由于违规操作而几次遭到上级的处分。不过，也正是由于他敢于突破旧有体制的束缚，使得他所主管的地方经济迅速发展。

在改革中敢于突破现有体制的勇气值得称赞，但我们同时还需要辅之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违规操作”是为了探索改革，是为了以一种试错求证的方法来寻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发展中国。我们需要牢记，“违规操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体制。这就要求我们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违规操作”时更要清廉；其次，尽量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最后，要从突破规则走向建立规则。

---

<sup>①</sup> 参见周梅森：《我主沉浮》，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改革要求我们勇于突破现有的束缚。但在这种突破的同时,往往一些不应该破除或者可以不破除的规则也遭到了破坏。在改革需要人们尤其是需要领导干部勇敢开拓,也因此赋予领导干部以权力的时候,更要注意到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尤其是要保持自身的清廉。否则,当“违规操作”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思维定势,那么,一些良好的、必需的规则也往往会遭到轻视,从而使得改革所需要的制度难以真正建立起来。同样是在周梅森的小说《我主沉浮》中,除了赵安邦外,作者还描述了赵安邦的一位老部下钱惠人。同赵安邦一样,钱惠人也是一个发展经济的能手,一个在改革中勇于闯关的人物。他在担任某市市长期间,曾经将该市的GDP大幅提升,但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挪用公款收购一家上市公司,并将这家公司变成自己的私人提款机。钱惠人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他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除了保持自身的清廉外,还需要尽量在体制内解决问题。虽然某些体制可能的确不适合经济发展,但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体制都得破除。比如说,民主集中制就是一项值得坚持和发扬的制度。从1978年改革伊始,至今已有30多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探索。我们建立了不少新体制,修改了很多旧体制,这已经使得我国现有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适合了改革的需要。在当前的改革中,许多问题已经不再是突破旧有体制的束缚,而是如何将新体制落到实处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有法不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改革的一大因素。震惊全国的一些金融类的大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对既定的规章制度不严格遵守,导致腐败分子钻了空子。

突破规则是为了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新体制,以最终从制度上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有序高效发展。对此,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而现实生活

中也的确如此,改革中的突破和探索,最终会为新体制的建立打下基础。1997年,仇和在沭阳试行干部任前公示制,这一做法引起轰动,中央领导对此作了长篇批示。现在,干部任前公示制已被写进《干部任用条例》,在全国推广。由此可见,突破只是手段,只有在目的正确的情况下,手段的使用才会有所限制。

实践出真知,实践锻炼人的精神品质,中国人的勇气、智慧、力量,中国人务实、求真、创新的精神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

## 第七章

# 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品质之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学习、与时俱进的历史。在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精神品质同样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实际地参与和成就了“中国发展”。



## 一、重视学习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提出,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主要文明都经历了它们的“轴心时代”,即在文化精神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对后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时代。以中国文化而论,所谓“轴心时代”的发生时间实际更早一些,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中国思想史家徐复观称之为“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跃动”<sup>①</sup>。周代“人文精神”的要点是,从单纯尊崇外在的“天命”到“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理性自觉。

经过孔子“删订六经”的文化整理工作,周初的人文精神内化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经典的“传习”过程。此外,孔子“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私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其重大而深远,最突出的表现是作为“隆礼”和“崇学”等人文精神传统载体的“士”阶层的形成。虽然由于秦代“焚书坑儒”,上述“人文精神”传统和“士”阶层遭受过沉重打击,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献整理和经典传习的活动不仅具有单纯文化遗产的意义,还具体化为支配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官政治传统:作为“人文精神”主要承担者的“士”阶层成为社会生活的实际管理者。

人文精神落实为文官政治传统,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特别注重人文教化的民族。“文以载道”成为国民教育最核心的原则和最突出的形式,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至唐代用科举制度取代汉以来的荐举、察举制度而主要“以诗文取士”之后,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章大国、诗歌大国。

---

<sup>①</sup>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页。

如果说,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以及“文官政治”的传统还仅仅是从注重“文章”、“教化”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重视学习”的一贯品质的话,那么,与此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的,是中华民族注重民族文化间“交流”和“融合”的另一面:“夷夏之辨”下的文化融合和制度更新。

“夷夏之辨”由来已久,其重点是所谓“夷夏之防”,即“要以夏变夷,严防以夷变夏”。所谓“夷夏”,当然不仅是一个种族概念,更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核心观念是华夏文化远远高于夷狄文化”<sup>①</sup>。不过,倘若因为有“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就得出中国古代不注重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和忽视向其他民族文化学习的结论,那便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夷”和“夏”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是历史地变化的。并且,作为一种征候,越是强调“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的时期,往往越是民族间文化交流频繁、原初文化观念遭到巨大冲击的时刻。

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看,所谓“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非但没有造成民族文化间的分离隔绝,相反,倒是在下面的意义上使文化间的交流和学习变得更有成效:一切通过学习得到的东西都被视为从自身的文化根源中生长出来的,因而恰恰是在“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的名号下改造和重塑了民族文化的机体。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自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佛教东传引发的儒道释“三教融合”和“五胡乱华”之后的社会制度更新。

相比之下,近世中国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西洋强势与域外新知相互支持”,并随着“坚船利炮与商贸往来双管齐下”,中国真正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sup>②</sup>这种文化震撼的双重效应是:一方面出于

<sup>①</sup> 参见姜义华:《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

<sup>②</sup>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329页。

对自身文明信心的维护引发了所谓中西文化的“体用之争”,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生存压力而被迫积极地投身于向西方文明的全面学习。

大体说来,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短短80年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向西方文明学习的主题经历了从“兵战”到“商战”、再到“学战”的几次重大转折:<sup>①</sup>随着国门洞开,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西洋船坚炮利的威猛,以为中国之所以会遭受惨痛的失败,在于兵械方面落后于西方,于是疾呼“兵战”;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对西方“致强本原”考察视野的拓宽和对“寓强于富”认识的长进,人们将视野逐渐由军事扩展到经济,由练兵制器扩展到“商务”、“工艺”,萌生了以“工商立国”的“商战”、“商本”思想,并致力于民族工商业的振兴;随后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动摇了以“兵”、“商”强国的思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有识之士痛切体悟到“泰西”乃至“日本”之所以“胜我”,关键在于“究理劝学”,由此萌生通过变法维新向西方学习政教体制和学术文化以与之抗衡的“学战”思想。逐渐认识到中西之争的根本乃是一场“学战”,这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最突出的一环。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但由此开启的“新学”启蒙运动却日益蓬勃发展,并且,“学战”思潮本身直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导。

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后,国外各种文化思潮相继涌入中国。在同一个历史舞台上,围绕着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的和东方的,各式各样的观点和主张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文化碰撞中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中

---

<sup>①</sup> 参见刘崇敬:《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与反思(1840—1919)》,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方平:《略论晚清“学战”思潮》,《史林》1994年第1期;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国现代社会革命的灵魂和脊梁。

不过,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并不能通过简单接受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或普遍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实现和保持。相反,这意味着一种艰难的文化创造,即必须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有机结合。这一有机结合的任务决定了“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最内在的精神品质和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是这一有机结合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优良“学习”传统的成功奠立,并且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理论、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成就和进一步学习与实践的思想指南。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sup>①</sup>这两大历史任务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的两大“学习”主题。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出色地完成了第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并对第二个历史主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但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才真正从根本上破解了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学习”难题。

## 二、改革开放时期执政党的“学习”品质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最

---

<sup>①</sup> 参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根本的“学习”任务。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任务始终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展开的,这意味着我们党“重视学习”的传统在新时期具有了全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和领导力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是顺利完成这一事业的内在要求和基本保障。重视学习、不断学习的精神品质首先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有着最集中的体现,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各条工作战线人才稀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迫切感到提高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思想文化素质的重要性。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前提之一便是“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sup>①</sup>。1982年1月,邓小平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sup>②</sup>。

党校教育是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重要途径。1983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提出党校教育由“短期轮训干部为主”向“正规化培训干部为主”转移的工作要求。党校培训的内容,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即深入学习和领会一定时期内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另一方面是科学文化教育,即扩展与增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所必需的专业文化知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除了常规性的党校教育之外,中国共产党还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

抓住种种契机在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展开各类专项教育,促进和改善党的学习。这些专项教育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1)以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专项教育活动;(2)以学习和贯彻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为主题的专项教育活动;(3)以纪念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继承优良传统或汲取经验教训为主题的专项教育活动;(4)以应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主题的专项教育活动等。<sup>①</sup>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热情并没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开展而衰退,相反,他们甚至以“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来表达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性。进入 21 世纪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学习”的力度:2001 年,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上,提出了“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要求;2003 年秋天,中共中央提出了为了带领人民建设好学习型社会,必须首先把我们自己建设为学习型政党;2004 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2009 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个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作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举措,自 2002 年 12 月起,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共进行了 44 次集体学习。平均下来,几乎每 40 天就有一次集体学习。自 2007 年 11 月 27 日以来,到 2012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也已经进行了 33 次集体学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制度化推动全党掀起了新的学习热潮。2003 年 6 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陆续开工建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

<sup>①</sup>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 年—2011 年 6 月)》,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282.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282.htm)。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并于2005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在原有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的基础上又为党的干部教育培训提供了新的重要基地。此外,2004年,中共中央开始部署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6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对于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不断学习的精神品质不仅体现在执政党自身的建设过程中,也体现在她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为振兴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人才作出的持续努力中。

恢复高考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在培养人才和发展教育方面的重大举措。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批判了“两个估计”,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并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sup>①</sup>8月13日—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时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71页。

<sup>②</sup>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100页。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的科教事业由拨乱反正向全面振兴与市场化变革的阶段转移。从此以后,尤其是在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之后,党和政府一方面围绕科研项目设立和完善了一系列科研资助计划,如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863计划、攀登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另一方面,为人才合理流动、科研与生产横向联合、推进科教事业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积极创造条件。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确立之后,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9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到20世纪末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同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技术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教委开始实施“211工程”这项以支持科学研究基地为主的国家计划。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1997年,科技部开始实施“973计划”,这是继自然科学基金和攀登计划后又一个高强度的以支持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计划。1998年,教育部实施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985工程”。进入21世纪之后,党中央又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人才强国”的战略。2010年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13—14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明确要求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把发展教育和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

### 三、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的“学习”品质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不断学习”的精神品质对中国发展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体现在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即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及其推进民族科教文化事业的积极努力中,同时也突出地体现在中国知识阶层与实业阶层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经验与先进文化成果的过程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在自告奋勇整顿国内科教工作的同时,他已经明确意识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sup>①</sup>

最简单的“引进”方式是直接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但由于一方面外汇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直接购买并不能保证在技术设备的运用与管理上能够达到相应的先进水平。因此,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并不是最有效因而不是最主要的方式;最主要的方式是“走出去”与“请进来”,即派遣大量优秀学生到海外留学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sup>②</sup>邓小平的指示吹响了青年学生走向世界的号角,迎来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浪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sup>②</sup> 《邓小平同志谈清华问题时关于派遣留学生问题的指示(1978年6月23日)》,参见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366页。

潮。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破了公派留学的单一格局。这一政策曾经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中最大胆的步骤”<sup>①</sup>。

30多年来,中国留学生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教育部截至2011年底的统计表明:从1978年到2011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截至2011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42.67万人,其中110.88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81.84万人,有72.02%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sup>②</sup>

引进外资是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的另一条重要通道,设立经济特区则是引进外资的最初桥梁。1979年7月,根据中央审定的“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经营方针,袁庚领导下的招商局在深圳南头半岛的蛇口创办工业区,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引进外商和外资。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我国第一个关于特区的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不久,国务院相继划定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的区域范围,于1980年和1981年分别动工兴建。经济特区创办数年后,便发挥了突出的战略示范意义。1984年春邓小平亲自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的发展状况,对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的积极作用作了高度评价。<sup>③</sup>

---

<sup>①</sup> 参见张雷等:《现象100:目击改革年代》,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sup>②</sup> 《教育部发布2011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 <http://edu.people.com.cn/h/2012/0210/c227696-3809439184.html>。

<sup>③</sup>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鉴于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全部开放由北向南从大连到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此后又将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至80年代末设立海南经济特区时,全国已经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全方位开放格局。20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和21世纪初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更是把中国对外开放的事业推向了沿海、内地和沿边相结合的立体开发新阶段。

学习包括管理经验在内的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是海外留学与引进外资的基本目标。如果说海外留学主要是“以人才换技术”的话,那么,引进外资则主要是“以市场换技术”。30多年来,“以人才换技术”所取得的成绩相当可观。数十万“海归”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知识,缩短国内外科技水平差距,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十年来,“海归”创业更是高潮迭起。苏州高科技园区、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诞生,向国人充分展示了“海归”在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方面的绝对优势。而“以市场换技术”主要是利用物质资源、劳动力和政策法规方面的优势吸引外来投资,一方面通过企业创办时明文规定的设备投入与技术转让,另一方面通过隐性的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产业链条上的辐射效应等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以人才换技术”和“以市场换技术”显示出很强的互补关系:后者收效快但后续艰难,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与外资合作的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引进、消化、创新把这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在根本上摆脱依赖跨国公司提供技术和不断引进技术的被动地位;前者相反,可谓先苦后甜,早年的“留学热”确有“移民

潮”和“人才流失”的嫌疑,近年来回国创业则蔚为风气。因此,至少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得到快速提升的主要杠杆,但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以“海归”为主导力量的高新科技产业则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如果说模仿与创新是一般学习过程中蕴涵着的两个基本环节的话,那么,创新则可以说是学习的最高品质,或者说是学习品质的升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验与先进文化成果为主到以知识与文化上自觉创新为主的发展历程。

从科技与知识创新的方面来看,尽管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已经提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sup>①</sup>,但真正把科技与知识的自主创新放到和技术学习与引进同等重要的位置,则是90年代的事情。确切地说,1995年党中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之后,“认真抓好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的一贯提法才为“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所代替,“自主创新”正式成为科教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中国知识阶层积极参与了“知识与科技创新”的努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数中国科学院承担的“知识创新试点工程”。1997年,中国科学院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呈送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提出建设面向21世纪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并主动请缨承担“破冰”重任。1998年6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十多年来,中科院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科技成果创新、优秀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以重大的自主创新成果而论,就完成了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月球探测工程等战略高技术研究课题,青藏铁路工程、国家主体功能区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课题,以及正负电子对撞机、激光物理、基因组测序、纳米等重要基础研究课题。这些重大创新成果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知识创新工程”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卓越的示范。<sup>①</sup>

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入世”背景中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中国实业阶层在参与“知识与科技创新”上也表现不俗,逐渐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实际上,尽管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是中国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首要目标,但这一学习过程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单纯的知识与技术的范围,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就是在社会规范和文化心理上融入当代世界的过程。

现代科技决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手段,而是意味着整个现代生活方式。这一点在马克思《资本论》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分析中已经得到阐明。在海德格尔追问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提出“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命题之后,关于现代科技与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之间有着本质关联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常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不仅在思想上了解,而且在实践中学习、体会并努力实现这种关联。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

---

<sup>①</sup> 郑杨:《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10年结硕果》,《经济日报》2008年7月9日。

现代文化思潮的全面引介与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激烈论争,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的学术争鸣,都是这一学习过程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应当说,只有当中国的知识阶层普遍开始反思和诠释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基础或文化精神前提,而中国的实业阶层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致力于重铸以现代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石的社会秩序时,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规范与先进文化而不仅仅是学习知识与技术的过程才真正达到自觉。

### 四、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通百姓的“学习”品质

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民动员的时代,也是我们党真正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时代。尽管与西方知识经济时代提出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以及学习型社会的标准可能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确实可以把30多年来的中国发展看做是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过程。正如执政党振兴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是其“重视学习”这一优良品质的重要体现一样,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通百姓对待“教育”的基本态度也是反映他们“学习”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初期,高考恢复和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在全社会促成了一股尊重知识的清新风气:“知识就是力量”作为一种信仰,渗透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陈景润、蒋筑英等科学家代表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千军万马都拥挤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上,大学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受全社会呵护的“天之骄子”。

当年人们对知识的渴求,至今还在许多人心中留有深刻印迹。由于高考刚刚恢复,“天之骄子”中的大多数都属于“被耽误的一代”,想要把流逝的光阴弥补回来,刻苦攻读自然不在话下。在全日制高校教育之外,夜校和自学考试教育也随之兴盛起来,高校和各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常常人满为患,许多工厂企事业单位也自发地组织起许多读书小组。在上海,这种自发的读书小组后来甚至发展为全市范围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并一直持续至今。农村的交通和信息传播相对落后,但人们同样知道读书考学是决定人一生命运的大事,虽然很可能一个自然村连高中生也稀缺。考上大学的小孩被看做是全村人的荣耀,农村人往往通过集体欢庆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

随着农村经济的复苏和城市改革的深入,无论城乡,依靠个体商业活动勤劳致富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分配“脑体倒挂”现象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不是流向科研单位或者留校读研,而是投身商海或者出国留学。老百姓对待知识与教育的心态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拿手术刀的比不上拿杀猪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说法风行一时。

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对科研和教育部门的冲击,以及随市场经济大潮而来的高等教育费用的急速攀升和就业方式的市场化改革,再加上低学历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往往是高学历的科研人员平均收入的倍数甚至更多,这些因素至少一度在心态上制约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投入的积极性。不过,随着中央“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等发展战略的积极实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都有较大提高,整个社会又逐渐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通百姓对待“教育”或

知识的心态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和波折,但从实际的教育“需求”来看则始终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动摇,无论是就群体还是个体的“需求”绝对量来说都在持续增强。道理很简单,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除非的确是由于生活困难到难以为继,否则父母总是愿意让小孩去尝试接受尽可能高的教育,因为即便是一个好的教育背景已经不完全等同于一个好前途,但仍然是彻底改变命运的契机所在。甚至当教育水平不高的父辈由于种种机缘发家致富之后,也往往并不因此轻视教育,相反,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给子女提供他们认为的尽可能好的教育机会。可以说,正是由于绝大多数人对教育、知识与命运紧密关联的高度认同,为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持续发展和国民素质的逐步提高提供了最根本的支撑和最强大的动力。

对知识和教育的尊重是30多年来中国普通百姓“学习”品质的重要方面,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怀有“尊重教育”意愿的人未必就是实际去努力追求知识的行为主体,其结果,父母师长往往比受教育者本人更加重视学习。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正如执政党的“学习”品质既表现为对科教工作的促进,也表现在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中,普通百姓的“学习”品质也同时体现在与直接的教育活动不同的其他生活实践中。换句话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学习”品质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对教育与知识的尊重上,还体现在他们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付出的一切艰辛努力中。

撇开种种细节不谈,农民工进城和下岗工人再就业可以说是30多年来最能体现中国普通百姓“学习”品质的两件大事。20世纪80年代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农村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城市扩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镇建设步伐与规模不断扩大,制造业、建筑、环境卫生、餐

饮和家政等方面的劳动力需求也急剧增加,于是出现了首批“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全国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蓬勃发展,大批内地农民开始背井离乡,踏上走南闯北打工谋求生计的道路,形成日益磅礴的“民工潮”。国务院《2006年全国农民工工作综述》指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全国13亿人口中农民工就有2亿多,其中异地转移进城务工的约有1.2亿人。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亦工亦农、流动就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sup>①</sup>

农民成为农民工,是为了到工厂和城市谋生存,而从这种生存需要中激发出来的却是一种内在的学习品质和创业冲动。这一点已经为蔚为大观的返乡创业潮所证明。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公布的数据,在1.2亿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已有近500万农民工带着打工学来的技术、赚来的资金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五分之一。<sup>②</sup>

与农民工一样为生存而学习、为生存而创业的还有城市下岗工人。在长期处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从国有传统产业分流了一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这些下岗职工普遍存在所谓“两高三低”现象,即年龄高、女职工比例高,文化低、技能低、竞争就业能力低。为此,党和政府提出了一整套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政策:大力开发就业岗位,搞好再就业服务,增加再就业资金投入,强化再

---

<sup>①</sup> [http://w1.mohrss.gov.cn/gb/zt/2007-01/23/content\\_161427.htm](http://w1.mohrss.gov.cn/gb/zt/2007-01/23/content_161427.htm).

<sup>②</sup> 参见赵静:《农民工回乡创业呈加速之势 如何引导应引起重视》,《光明日报》2008年1月17日。

就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下岗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等。

2007年10月,国家劳动保障部负责人透露,1998年以来,全国累计有2400多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享受了基本生活保障待遇,有近200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其中包括数百万“40(女)50(男)”以上的困难人员。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任务基本完成”<sup>①</sup>。

尽管在劳动就业培训的水平上差别极大<sup>②</sup>,但应当说,无论是农民工进城还是下岗工人再就业,都以优秀的“学习”品质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 五、“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

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发展历程中,无论是执政党、知识阶层与实业阶层,还是普通百姓,无不重视学习。可以说,不断学习不仅作为民族传统,而且作为时代精神,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民族现时代的一种精神品质或精神素质,而精神品质之所以为精神品质,就在于它往往是一种持续发挥作用的活的传统。

作为一种精神品质,“不断学习”在我们的民族性中有其深刻的渊源,即一种根深蒂固的灵活性或适应性。说根深蒂固,一方面是言其彻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灵活性早在数千年前的原始经典中已经有

---

<sup>①</sup> [http://www1.www.gov.cn/wszb/zhibo163/content\\_778409.htm](http://www1.www.gov.cn/wszb/zhibo163/content_778409.htm).

<sup>②</sup> 作为下岗工人再就业政策落实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计划,即在1998—2000年三年内在全国培训1000万下岗职工。其余由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以及民办机构提供的培训更是不计其数。

了清楚的表述。比如,《论语·子罕》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虚己以待、不自设牢笼的意思;又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把人与人之间一同达权通变看得比“共学”、“适道”和共同有所建树要更困难,境界也更高。《老子》强调虚己以应物、随顺而无执的地方则更多,比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第四十九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等。

这种民族性格中的灵活性,哪怕是在社会生活最边边角角的地方也有显露。比如,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民间流行的命运观念是极其“灵活”的,人们既相信有“命”因而可以心安理得地顺应现状,同时又认为“命运”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因而也可以对生活存一些幻想。当然,鲁迅先生可能更多的是从批判的角度来揭示我们国民性的弱点,即“灵活”意味着自欺欺人,无特操等。但是,倘若我们能够不再过于为近代以来产生的民族文化挫折感所支配,能够以更为宽容和成熟的心态来看待这种渗透在我们民族血液中的“灵活性”的话,将会发现,尽管从这种“灵活性”确实可能生长出最极端的“做戏的虚无党”来,却也同时孕育着打破一切僵化的束缚走向民族新生的可能性条件。

虽然30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所谓左与右、“西化”与本土化等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正如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和近代以来的中西之争从未阻断中华民族“重视学习”的优良传统一样,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本身的展开过程对这些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实际上,“摸着石头过河”以及“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提法,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看做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灵活性”在新时期的具体表现,而这种“灵活性”也正是作为一种精神品质的“不断学习”的初始内涵。

不过,如果我们把作为一种精神品质的“不断学习”,仅仅归结为在基本生活态度上的彻底的“灵活性”的话,那么,这种“灵活性”实际上也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正因为还只是抽象的可能性,不仅“不断学习”尚未获得充实的内容,并且这种“灵活性”本身也的确存在向消极的亦此亦彼、无所作为或者类似鲁迅先生所批判的那样转移的危险。

实际阻断这种危险,并使“不断学习”这一精神品质由抽象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行动的关键,是历史性因素的介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史官文化发达,“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由此培养起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但令人惊奇的是,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厚重的历史感并没有成为日益消极的负担,而是与基本生活态度上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合成一种试图将一切优秀的历史遗产背负起来同时又对时势、时机特别敏感的实践智慧。

这种实践智慧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易道”或处变之道,讲究的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道”的基本途径是“极深而研几”——“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sup>①</sup>而所谓“极深研几”或者“通天下之志”与“成天下之务”,用现在的话说,实质就是“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是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sup>②</sup>很显然,“与时俱进”中所谓的“时”与“进”,绝不是抽象的时间

---

<sup>①</sup> 《周易·系辞传上》。

<sup>②</sup>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

刻度和同样抽象的前进愿望,相反,它们恰恰是已经在内容上从“不再适用”的“做法和经验”和“新的实践要求”这样两个方向被具体地、历史地规定了的。

“极深研几”或“与时俱进”,同基本生活态度上的“灵活性”相比,根本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不仅仅包含一种抽象的“不断学习”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在原则上包含了对“不断学习”的具体历史性内涵的基本领会。由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作为一种精神品质,“不断学习”的核心与目标乃在于“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内在素质不仅意味着“重视学习”,而且意味着“热爱学习”;“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又意味着不仅要“热爱学习”,并且要“善于学习”。

最后,当我们在原则上把作为一种精神品质的“不断学习”最终归结为“与时俱进”,并且与中华民族传统的“极深研几”的实践智慧联系在一起时,同时也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古今相通的精神品质,实际上关联着很不相同的历史性课题。

前文提到,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明遭遇后被迫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道统)及其文以载道的“文章教化”方式和主要由“士”阶层承担国家治理的文官政治遭到严峻挑战。不久,民主与科学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重视学习”的两面旗帜。今天看来,就对西方的把握而言,这两面“学习”旗帜是颇得要领的,但同时对自身民族的文化传统却逐渐失去同情的了解和基本的尊重。如果说自鸦片战争起到新中国成立,我们民族向西方文明的学习过程总体上仍然从属于一种被动性质的消极“应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门重新打开,所寻求的则不仅是民族独立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是以振兴民族文化传统和真正融入当代世界为前提的民族伟大复兴。

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

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sup>①</sup>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准备了基本条件,反过来,这一历史任务又从根本上规定了“不断学习、与时俱进”的当代主题。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以及普通百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学习”品质,正是在对这一历史性主题的积极领会中实际推动着中国发展。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 第八章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中共十七大报告对改革开放历程作了整体的概述，这是对中国发展之路的回顾，对继续发展前景的展望。今天，我们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之成就和问题进行总结、肯定和思考时，不可忽略推动中国发展的民族内在精神因素，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因素。



## 一、“三省吾身”、“居安思危”的民族传统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出现过传统文明断层的国家,其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的诸多优良要素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忧患意识可居其一。在浩浩荡荡的发展史中,中华民族被证明是一个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三省吾身”的反思精神以及纠错传统的民族。具备这样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国家才能在浩瀚的历史洪流中不断发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忧患意识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之居安思危的意识。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其是人类理性意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于事物的肯定之中发现潜在的问题,通过对潜在问题的认知和预防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中国无论是在灿烂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当下的全球化背景下,忧患意识一直内嵌在民族精神之中。就传统而言,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忧患意识。“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则是在和平的环境下产生的对危机预期的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可以是个人心理,也可能是社会集体心理。《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记载: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魏绛推辞时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儒家圣贤孔子亦曾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孔子之言,其意就是让人们对自己的处境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同时也指出了忧患意识不仅是个人安身的个体心理,也是可保国家的社会集体心理。另一儒家集大成者孟子也发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之论。

近现代的中国史,可以说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忧患和图强的

互动中奋发崛起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同样强调要增强全党和全民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作为改革开放战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更是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他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即提出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要对未来改革可能面临的困难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sup>①</sup>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而消除危险的途径就是居安思危、深谋远虑。我们可以这样说,忧患意识与中国发展史的脚步相伴始终,它从古到今绵延不绝,逐渐由精英个人自觉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作为古代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其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并至今仍然对中国社会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如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风险、能源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都可能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改革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因此,各级政府和政策决策者能否对这些危险具备足够的认知和防范意识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能否为继。只有具备了忧患意识才能防患于未然。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中华传统不仅具有强烈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而且更具有深刻的反思精神。从“反思”的最初和最根本的内涵而言,其就是一种个体的内省过程,就是个体对自身之思想、认识、行为等再认知。我国的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了反思的意义,并认为“内省”应该是君子修身之必需。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见到贤人,希望和他齐头并进;见到非贤之人就要反省自己是否有和他一样的毛病。就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四部曲”而言,修身无疑是最基本也同样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因此,内省、反思作为儒家修身所必须的方法就成为后来中国士大夫们的自我要求。

在治国的实践环节,反思精神更是被统治者和政治精英阶层自觉或不自觉所吸收和发扬。以西周礼乐制度为例,西周礼乐制度其上承夏商、下启中华传统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礼乐制度的形成不是对夏商礼乐文化的简单继承。西周统治者在反思精神之下,吸取了夏商两朝在礼乐制度中对音乐滥用的教训,对使殷商亡国之“淫乐”进行改革,形成以“德”为核心,以“节乐”为手段的西周礼乐制度。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不仅对前朝灭亡之原因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而且对本朝同样具有反思精神。当然这种反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反思精神。从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反思、不断自我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遵义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最初的全盘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做法进行深刻反思的标志。也正是因为遵义会议上的反思,中国共产党人才痛定思痛,经过伟大的长征之途,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错误决定

和政策同样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本身就是共产党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反思和纠正的结果。

从逻辑而言,伴随着反思精神的必然是纠错传统。就如海涅所言:“反省是一面镜子,它能将我们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故而说反思不是目的,而是通向纠错这一目的的手段。就像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反思精神一样,我们同样具备悠久的纠错传统。《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就提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他还提出“过而不悛改”。可见,对错误的纠正也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精神。纠错就是在对错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错误的修正。对国家而言,纠错包括了改革和革命两个层面。回顾中国历史,整部中国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变革史。当然这种纠错式的变革通常是由政权体制外的力量来推动和完成的。中国的纠错传统从国家整体而言,其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诸多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即秦末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本身就是对当时秦朝当权者诸多暴政的一种抵抗与纠正。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陈、吴两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秦朝晚期的暴政却在农民起义的大浪中被摧毁了。此后,农民起义就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更替过程中的重要的纠错途径之一。纵观中国封建王朝更替史,农民起义往往是在王朝末期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农民起义本身而言,其本身就隐含了社会大众对王朝晚期统治者错误政策的一种反思、抵抗和纠正。当然,这种反思、抵抗和纠正或许不是自觉自省意识下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不堪生活重压下的无奈之举,但是其结果却是对执政者错误政策的一种纠错。同时,在王朝发展过程中,统治者受到外部压力,也会与一些上层政治精英一起共同推动政策变革,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政策纠错,其通常以变

法运动的形式出现,如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等。

在近现代中国,作为政权体制外的纠错力量已经从农民转变成了学生、工人、一部分知识分子等新的社会阶层。以五四运动为例,由于民国初期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积重难返,以及外国列强的侵略,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首先在文化层面开始纠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习进行改革,积极推动现代性的变革。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这种文化层面的纠错开始显现其溢出效应,逐步由文化向政治和社会领域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战略实施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将这种亡羊补牢式的纠错传统发展成为更具现实意义的预防式试错模式。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而言,在局部区域进行有限的政策实验,然后根据实验结果来最终决定政策的实施和转变与否,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模式。从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特区设立,到当下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位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它们都带有一种试验性质。在这种局部政策试验的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借助中国共产党内部自成体系的反馈机制和官员问责制都能得到及时发现、及早解决、防患于未然。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自我试错模式是中国纠错传统的再发展和升级版。从微观层面来看,这种“试错纠错”的精神更是体现在我们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试运行就是这种“试错纠错”精神的完全体现。虽然拥有了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的经验,但是对于历时更长、接待任务更重、游客更多等诸多新问题,上海世博会的主办者就充分继承和发扬“试错纠错”精神,在世博会正式开幕之前的数次试运行,对安保安检、入园人流引导控制、观展密集人潮的疏导等方面出现的诸多不足估计和认识进行了有效的纠正和调节,为之后世博会的顺利举办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从中国传统的纠错机制而言,纠错的力量通常来自体制外部,成功的纠错也往往采取颠覆式的革命模式,如农民起义。来自体制内部和统治者自身的改革式纠错,如变法运动,从数量上远远少于农民起义式的革命纠错,而且成功率也远低于前者。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的纠错机制具有纠错成本高的局限性。

与中国传统的纠错机制不同,中国共产党的纠错更多的是由共产党人自身推进的。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整体纠错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一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对过去纠错的一种探索。因此,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生于中国纠错传统之中的,其必然也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纠错传统。事实也已经证明了这种论断。如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对此前自身“左”倾错误的反思和纠正。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一直坚持着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发扬反省传统,在修正错误中推进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诸多的反复,但是无论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犯了多少错误,中国共产党都有勇气和行动力及时认识和纠正自身的错误。例如,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速度,尤其是钢铁生产的高速度、高指标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巨大的损失。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第

一回合,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随后的“反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延伸。就国民经济的总量而言,“大跃进”第一回合客观上还是使得“国家的物质基础有所增强”,如粮食产量同比增加了2.5%,钢产量增加了49.1%,但是这些增长的取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时负责财经工作的薄一波后来将这些代价总结为:“第一,投入很大,经济效益很低。第二,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尤其是工农业比例。第三,企业管理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对“大跃进”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党中央在发现之后进行了及时的纠正。首先,对“大跃进”中“以钢为纲”,不顾其他的错误,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就提出重新讨论关于“农、轻、重”的次序问题,希望能纠正“以钢为纲”的错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当然,由于受到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等国家决策者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只能是初步的、表面的。而且,庐山会议后又从最初的“纠左”发展到最后的“反右倾”,进一步加剧了“大跃进”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共产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则是历史罕见的纠错壮举,但是这个壮举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认识规律而言,个人或者组织对其自身问题和错误的认识在时间上总是有一定的滞后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和错误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对发现了的问题和错误都进行了及时的纠正。例如,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全面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虽然“批林整风”运动并不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全面认识和纠正,但其

对提高大众对“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给“左”倾的狂热踩一脚刹车是具有相当意义的。同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也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激进的政策和认识进行调整,尤其是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部分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例如,毛泽东通过自己的讲话对叶剑英、陈毅、邓小平等进行重新评价。1971年,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是‘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当然,“批林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对一些老干部的重新评价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

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虽然宣告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完全认识“文化大革命”极左运动的错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纠错是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的。全会认为,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揭批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因此,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同时,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反思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一步在具体问题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改正。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到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先后为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同时中共中央还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的党、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和老干部、老同志平反。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数千万因与这些干部有亲戚或工作关系而受到牵连的干部和群众都得到了“解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1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文件决议的形式全面反思和修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决议》同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建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可以说《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真正完成。

中共中央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来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纠正,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曲折。事实上,正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言,我们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探索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在这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不断地、及时地、有效地发现错误并予以纠正。同时,在这个不断自我否定、自我修正的过程中,改革开放才得到逐步推进和深化,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才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1985年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sup>①</sup>

事实上,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最早进行思考的正是改革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干部腐败问题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sup>①</sup>他进一步指出要针对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干部腐败问题对传统的反腐机制进行重新修订。又如,对于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于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认识,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sup>②</sup>。

邓小平这种发现错误及时纠正的精神得到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继承和发扬。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GDP至上”、“金钱至上”、“发展至上”等盲目错误的发展观,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行纠正。正是在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可持续的行为进行了整治。近年来,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到加强社区党建、“两新”组织党建、农村基层党建;从推动党内民主发展到改革干部责任制和干部任命选拔制度,从积极吸纳新党员到完善党校系统对领导干部的人才培养计划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情、国情、社情之下进行的一种自我纠正和自我发展。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员个体和部分领导者身上出现的不良作风问题也通过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进行自我修正和纠错。反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腐倡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90年代的“反腐败斗争”到后来的“反腐制度建设”,并出台《党内监督条例》、《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制定“对地方党政高级干部的巡视制度”,再到之后建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等,都彰显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发现错误及时改正的勇气和力度,更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加强自律的体现。

### 三、成绩面前特别要防止骄傲自满

如果说,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反思传统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的精神是促进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的话,那么在成绩面前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则是保证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在我国,成绩面前防止骄傲自满具有相当的历史传统。

我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谦受益、满招损”的思想。在《尚书·大禹谟》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意思是说,自满的人会招来损害,谦虚的人会受到益处。它告诉人们骄傲自满有害,谦虚谨慎有益的道理。《商君书·战法》也有言曰:“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意思就是要胜不骄,败不馁。《汉书·魏相传》:“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意为仗着人多势众、刀锋剑利的军队叫做骄兵,骄兵必定要打败仗。谭嗣同也说过:“不骄方能师人之长,而自成其学。”著名作家老舍也认为:“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鲁迅更是指出唯有不自满才能推动我们不断前进,他说:“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由此可见,防止

骄傲自满,在成绩面前要谦虚谨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的传统思想同样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继承和发扬。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对骄傲自满的危害曾经一针见血地说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陈毅,作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对骄傲自满的危害具有深刻的认识。他在《七古·手莫伸》一诗中说:“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告诫我们在成绩面前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和蔓延。陈云也多次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要反对骄傲自满情绪,要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执政党生存发展的力量源泉。他说我们取得的任何成绩,“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起落落使得他对骄傲自满的危害认识得更为深刻。他认为,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成绩面前尤其要防止个人的骄傲自满情绪。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谈到必须建立培养接班人的机制。他说:“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sup>①</sup>江泽民也同样提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谦虚谨慎。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尤其要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更好地发扬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以自己的言行对防止骄傲自满,成绩面前要谦虚谨慎予以了正面的肯定和强调。而苏联作为曾经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最终的解体则从反面向我们揭示了成绩面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前骄傲自满的危害。作为超级大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土面积,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大规模的核武库,苏联作为世界的一大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显赫一时。然而大厦倾倒,庞大的苏联一夜之间解体。对于苏联亡国的原因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但是苏共在成绩面前的骄傲自满必居原因之一。自古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兴亡的关键,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苏联初兴在于顺乎民意。在随后的国家建设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民同心协力,在经受了建国初期重重困难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终于使苏联走向强盛而成为显赫一时的超级大国。然而当苏联逐渐强大起来,苏共也日益骄傲自满。对内,苏共开始不思进取,逐渐脱离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造成人民内部矛盾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加之大俄罗斯主义思想的蔓延加剧了民族矛盾;对外,苏共的骄傲自满表现在其将苏联模式强行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认为苏联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对违反者通过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等手段进行惩罚和报复。可以说,苏共的骄傲自满加快了苏联解体的速度。

值得庆幸的是,历经重重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对成绩面前防止骄傲自满的重要性不仅仅停留在认知阶段,更在实践过程中加以内化为一种自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具有充分清醒的认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提及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完全有理由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而自豪,但是却没有丝毫理由因此而自满,中国共产党决不能也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全体党员提出了“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的要求。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实施的“排头兵”和“试验田”,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过去的一个小渔村逐步

建设成为眼下的现代城市。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如此成绩时仍然清醒地意识到骄傲自满是阻碍深圳乃至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胡锦涛在考察深圳南岭村时对当地的党政领导明确指出：“南岭村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缩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你们要努力做到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把南岭村建设得更好。”

对于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的“温州经验”和“苏南经验”，我们没有被短期内的成绩冲昏头脑，而是对两种经验存在的问题具有清醒的认识。苏南经验和温州经验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典型。一般而言，苏南经验的特点是在基层政府的领导下，农民依靠自身力量发展乡镇企业；温州经验是市场主导下自主发展，其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经济发展。这两种经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两者同样具有明显的劣势。就苏南经验而言，政府主导干预之下使得苏南经验存在一些类似传统国企普遍具有的弊端，如企业产权结构不明晰，政企不分，市场反应滞后等。温州经验由于受到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在发展上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形成小而散的家庭作坊式的发展，没有规模效应。随着近年来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市场不可预见性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普遍遇到出口受阻的困扰，温州经验以加工出口为主、“粗放式生产”的民营经济发展遇到困难。面对问题，苏南人和温州人没有被改革开放早期取得的成绩蒙蔽了双眼，他们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都具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并相互取长补短。由此可见，虽然温州经验和苏南经验都在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很大的成绩，而在成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不骄傲不自满则进一步促使温州经验和苏南经验继续发展并取得更大的成绩。

同时,社会发展的现状也要求我们要防止骄傲自满。回首中国共产党建政 60 余年的历程,中国的发展成果确实值得欣慰,但我们也切忌以此为知足自得。尽管就总量规模而言,中国经济已经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但无论就国民所得还是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中国仍与世界先进标准差了不只一截。这也意味着中国当前只能说是挥别了挣扎在温饱之间的过去,而远没有进入高度发展阶段。调查发现,中国奢侈品消费大盛,单年涨幅就超过百分之六十,已日益成为奢侈品消费的大国。但是,无论就国力还是国民收入的普遍水准而言,这都是一种“过度”的超前消费。支撑这种超前消费的社会背景是严重的贫富差距。这种严峻的社会现实业已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绊脚石。因此,防止骄傲自满在当下更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

#### 四、“风险社会”中更要有忧患意识

日本地震、印尼海啸、汶川地震、9·11 恐怖袭击事件……这些灾难和意外不断提醒着我们,风险无处不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型社会形态:风险社会。风险是依未来的可能性来计算损失。在各种具有风险性的问题发生之前进行预防,能够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估,以求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任何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都要进行先期的评估和预警,必须考虑所有可能的风险因素,避免以危害长远利益获取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因应于风险的忧患意识无疑更是成为关系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因素。风险社会与风险理论也日渐成为显学。德国学者乌尔利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则是其中的翘楚。

根据贝克的观点,当代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与其他社会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是风险社会中存在的风险不同于其他社会中的危险。这种风险首先不是主要由“外在的、自然的”因素造成的,而是人为的、内在的,来自人的决策,即风险具有决策决定性。通常而言小部分具有足够能力的专家或者政治领导者就能通过操纵科学决策而造成不同的风险。例如,学者和政治领导者在通过建立核电站获取清洁能源的同时也造成了未来核泄漏之风险的可能。同时,这种风险及其后果具有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的特征。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不仅仅涉及个人或单一国家,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威胁。例如,日本东电公司的核电站在地震中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不仅对日本自身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种危害还通过海洋等自然传播媒介向全球范围内传导和扩散。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无论在传播范围还是在影响程度上都与过去的社会风险具有质的区别。<sup>①</sup>一般而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当代全球性风险突出表现为:国际性的政治风险,通常由南北发展不平衡所引发;全球性经济风险,主要表现为由能源短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和金融风险;地球生态和环境风险,主要由人类无限制开发自然、破坏生态环境造成。

根据贝克的危险社会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国际政治风险、全球经济风险还是地球生态和环境风险,它们的后果都是我们单个个体或国家难以控制和规避的。同时对于这些社会风险的管理和预防也难以通过一己之力完成。就中国而言,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多重社会风险已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如生态危险等。同时,受我国人

---

<sup>①</sup> 参见章国锋:《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乌尔利希·贝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程新英、柴淑芹:《风险社会及现代发展中的风险》,《学术论坛》2006年第2期。

口规模大、密度高等国情的影响,现代风险将可能对我国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我国人口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也决定了我国民众对现代风险的防范和抵抗水平相当低。此外,由于我国的社会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转型的阵痛与现代社会风险将可能共同作用于我国,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我们在风险社会中更要具备对风险的“忧患意识”。

在我国,强调“风险社会”中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突发性社会危机已经屡次对我国造成严重影响。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温州高铁列车追尾事故、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等自然或人为危机已经足以向我们证明我国社会风险系数之高。高度的风险系数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将对我国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培养和具备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已经刻不容缓。其次,受客观条件限制,我国信息传递的渠道还不完全畅通和透明。在遭遇突发风险危机之后,信息不畅容易引起社会集体恐慌心理。这种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比危机本身更具有破坏力。故此,我们更需要对潜在的风险危机做好心理准备工作,居安思危。

虽然受到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我国大部分民众可能对现代社会风险认识不足,忧患意识不强,但是,作为政策决策者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必须也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潜在社会风险的严重性,具备了相当的忧患意识。例如,在贵州省贵阳市就发生了要“青山”还是要“金山”的讨论。讨论凸显了当地政府发展理念的跨越,也证明了当地政府对现代社会风险的预防。“青山”与“金山”的讨论主要是在贵阳市治理具有贵阳人民饮用水“水缸”之称的红枫湖、百花湖和阿哈水库水质和周边环境的过程中提出的。近年来,随着周边地区的开发和工业发展,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业废水排入“两湖一库”,使得其水质恶

化,水体污染负荷量增加,自净能力减弱。在对“两湖一库”水质和环境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有的基层领导干部顾虑会影响地区的 GDP 总量,地方政绩难以体现。针对这种想法,贵州省和贵阳市政府提出发展不能竞争 GDP,而是要绿色 GDP,要有舍得“金山银山”保护绿水青山的勇气和胆略。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对现有的绿水青山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是规避风险的上策。总而言之,为了中国未来合理有效的发展,对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是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现代风险自身的“决策决定”的特性给有效预防和规避风险提供了一条捷径,即在决策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决策民主化、公开化,使政府治理在决策过程中就开始有效规避风险,谦虚地接受公众的意见,谨慎决策。例如,杭州市政府首开先河,通过网络等新型平台,在政府门户网站上通过视频直播政府常务会议全过程,并实现与公众在线同步互动,从而实现更快更有效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公众全程参与决策过程。市民对杭州市政府在决策民主化、公开化上的大胆尝试表示赞赏,认为通过网络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失控限制,改变了公众参与的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政府决策的公开化和民主化。事实证明,杭州市政府开放式民主决策治理模式能在源头上有效防范由决策带来的社会风险,借此创新,杭州市政府还入围了第五届“地方政府创新奖”。

## 下 篇

# 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

# 改革开放的精神效应

30 多年的改革实践,无异于一场革命,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而且也深刻改变了国人的精神世界。改革开放的精神效应构成改革开放总体效应的重要部分。30 多年来中国人普遍的精神世界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辩证互动,发展的条件本身也往往是发展的结果。

## 一、人们对现在生活的感受和评价

精神活动作为一种意向性活动总是指向特定对象的。在这些对象中,人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具有特殊的地位。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具有自我反思能力,正是这种反思,使人类生活具有意义、价值和精神内涵。人总是生活于当下现实之中,但这种现实生活不仅作为一种客观事件来自过去、走向未来,而且往往更作为一种生活状态,从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和理解、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中,获得感受和评价。在此,我们通过数据展示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影响人们对目前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评价的。

改革的首要目的就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1983 年 3 月 2 日,刚刚视察回京的邓小平跟中央负责同志谈到:“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sup>①</sup>这是邓小平在改革之初的直观基本判断。

30 多年后的今天,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2005 年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以下称“精神生活调查”)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94.7% 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处于中等水平,而认为自己生活处于上等和最底层的,都低于 1%。通过对个人收入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一,无论收入高,还是低,都有近 50% 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处于中等水平(如果加上“中上等”和“中下等”,数据则达到了 90% 以上)。而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 2005 年公布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分别为 9 422 元、2 936 元,中间值为 6 179 元)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 页。

来看,显然能够称得上中等的人群远没有如此庞大。第二,月收入低于3 000元的人群中,认为自己生活档次处于下等的比例,远低于月收入10万—20万元收入人群组的比例。第三,月收入最高的20万元以上的人群中,认为自己生活处于中等水平的比例最高,而且高于其他人群组近30个百分点。第四,月收入在10万—20万元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处于中下等的比例是所有认为“中下等”中最高的。通过这一组数据我们认为: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比较传统的“中庸”思想的痕迹还非常重,人们似乎很乐意认为自己是处于“中间”状态,而这种判断本身正是一种较乐观地展示自身生活的形式,如在调查中经常听到居民讲“我们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根据以上这些数据我们也可判断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知足常乐”的心态,但是,这种判断正随着近年来通货膨胀和财富向少数人和人群集聚的加剧而发生倾斜,并对人们的价值判断造成了影响。2010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分好“蛋糕”促和谐 怎么看分配不公》的文章。文章援引新华网开展的“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数据,认为“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群众普遍认为生活压力大并且处于弱势地位,并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另据世行测算,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攀升到0.465,这意味着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据统计,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收入差距达到20多倍。由此可见,从开展“精神生活调查”到今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和向“资方”高度集中的现实,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判断已经打破“中等观”,开始向“弱势观”倾斜。从居民对现实生活判断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人对生活变化判断的最主要原因正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条件——如经济条件和居住生活,而那些对生活判断产生直接影响的带

有“中庸”色彩的精神因素却正在退入一种“不公平”状态之中,人民群众的“不平等焦虑”正在日益加深。

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和精神诉求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于“财富增长”追求与精神“伊甸园”如何保护的矛盾之中。面对这种状况,民众总体上的生活满意度如何,这种满意度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精神生活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者中回答“非常满意”的占6.5%，“比较满意”的最多,占有效样本的38.4%,即有44.9%的人对目前的生活表示满意;有55.1%的人表示一般和不同意。可以发现,中国人虽然承认生活的变化,但是却对目前的生活状态不是非常满意。

为了搞清各种不同群体生活满意度的状况和影响满意度的具体原因,我们从生活满意度与个案类型、地域、学历、收入四个变量之间的交叉状况来观察一下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状况。数据显示,个案类型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差异,即城市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人口。显然,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并没有因为城市人生活水平高于农村而显示正相关关系。相反农村虽然与城市相比生活水平低,但是人们对目前的生活更满意。从地域分布来看,认为“生活非常满意”的呈现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的递减趋势。这与认为“很不满意”的趋势正好相反。从极值的分布看,西南地区生活满意度最高,东北地区最低。从学历分布来看,学历越高的人生活的满意度越低,满意度呈现一种由低学历向高学历递减的趋势。这说明学历越高对生活的要求可能就越高,由于对生活的高要求可能导致他们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最后从收入来看,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差异。调查中,我们发现这种满意度与一些比较宏观的因素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与人民群众的具体生活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高度相关——如人们的休闲、社保、职业等没

有成为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但是,这种状况到了2010年开始发生一些变化。2010年12月15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金融危机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在2010年逐步显现,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其中城镇居民的职业满意度、社保满意度、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等指标下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则保持稳定。<sup>①</sup>可以发现,随着物价的上涨及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已经日益感受到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满意程度开始下降并日益指向个体生活的变化。

自豪感也能衡量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就做起了自己的“强国梦”。1981年中国男排在战胜韩国队之后,北京大学的学生发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sup>②</sup>如果说贫弱状态下的“强国梦”所隐含的是一种民族与国家的自尊感,那么,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如何影响民众的自豪感就尤其值得关注。

在“精神生活调查”中,我们发现,被调查者中认为“作为中国人非常自豪”的为52.3%，“比较自豪”的为30.5%，“一般”的为12.2%，“不太自豪”的为1.8%，“一点也不自豪”的为0.8%，“说不清楚”的为2.5%。从累积有效百分比中看出,回答“自豪”的(“非常自豪”与“比较自豪”)占82.8%。总体上来看,中国人的自豪感指数非常高。关于中国人自豪感的相倚性“原因”分析显示,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原因往往是超越具体事务的宏观认知,而很少有就事论事式的回答。第一,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文化辉煌,每一个国民都对“中国”有清晰的认同。

---

<sup>①</sup> 参见 [http://www.21ccom.net/artiles/zgyj/ggzhc/article\\_2010121626478.html](http://www.21ccom.net/artiles/zgyj/ggzhc/article_2010121626478.html)。

<sup>②</sup> 邵道生:《现代化的精神陷阱——嬗变中的国民心态》,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深处存在比较明确的民族归属认同感。第二,在这种极高程度的国家认同的背景下,对具体微观状况的“轻视”可能蕴含着对目前某些社会状况的某种不满意,或者说中国人的国家自豪感有虚化的倾向。另外,我们从“非常自豪”的角度,分别从地区分布、学历、年龄、收入四个方面做了一系列的交叉分析,结果发现如下几个问题:在地区分布上,自豪感的指数没有显著性的不同,但是南北方有微弱的差异,南方地区的指数略高于北方。在文化程度上,自豪感指数虽无显著性差异,但是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态势。在年龄上,各年龄段自豪感指数亦无显著性不同,但是结果与文化程度相反,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30岁这个年龄段人的自豪感指数最低。特别是21—24岁年龄组,这个年龄组正是在大学或者进入社会的关键阶段,他们中一些人表现出对国家的“无意识”状态。而总体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豪感的指数也随着增长。在收入上,我们发现,个人年收入低的被访者回答“非常自豪”和“比较自豪”的比例高于个人年收入高的被访者。从总体趋势上看,年收入越高自豪感的指数越低。这某种程度上与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经济发展,国家意识可能淡漠”的说法相一致。

在“精神生活调查”之后,我国经历了一系列诸如汶川地震、奥运会、世博会等具有历史性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对中国人的自豪感有否影响值得关注。一个普遍的观点是这些重大的事件对国人的自豪感以及国家认同的提高一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类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的相关调查也相继开始。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7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感到兴奋,其中主要城市的受访者对奥运会的热情尤为明显。同时还显示了中国居民作为主办者对于奥运会充满了自豪感,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为中国

感到自豪,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为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感到自豪。<sup>①</sup>与此相对应,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发布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市民认知与关注度”舆情调查结果显示:九成以上上海公众对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充满自豪感和信心。<sup>②</sup>2011年,中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成功发射升空在中国民众间也激发了极大的民族自豪感。根据环球网的一项在线调查,有69%的受访网友认为“天宫一号”增进了其对国家的自豪感。<sup>③</sup>

可以发现,2005年以后的几项调查数据回应了“精神生活调查”中“具体事务不是影响民众自豪感”的关键因素的结论。由此也可以回应前述满意度的调查,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人们已经开始日益关注个体的微观生活,生活改善与否可能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人们国家认同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这可以从另外一项调查数据中得到佐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共识是‘发展、富强、和谐、仁爱’。发展是基本途径和手段,是首要价值观,是指社会的发展,更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富强是发展的经济目标,和谐是发展的社会目标,仁爱是发展的人际或群际的目标。”<sup>④</sup>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个体化进程。第一次个体化发生在中国生产大量剩余之后。这一次分化进程的机制和原因是社会剩余,整合机制是家庭和封建关系;这一时期社会的特点是差异和尊卑。第二次个体化进程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后。这一分化进程的机制和原因是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社会的整合机制是社会

---

① <http://biz.cn.yahoo.com/080310/6/pmmi.html>.

② <http://travel.people.com.cn/GB/175552/175558/10810842.html>.

③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10/2053227\\_2.html](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10/2053227_2.html).

④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认同调查》,《光明日报》2011年5月16日。

化大生产和制度机构；这一时期社会的特点是平等和个性。鲍曼认为，我们的世界现在正在经历第三次个体化的进程。这一时期社会的分化机制是社会流动性，而整合机制暂时缺失；这个时期社会的特点是碎片化，个体独自面对困难。与此相关，我们似乎可以通过中国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获得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传统中国人的“知足常乐”思想某种程度上正在因为“无法知足”而向“不乐”倾斜，这其中商业贸易发展及分配机制不公可能是主要原因；第二，中国人的个体主义时代正在到来，但是这种到来似乎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成熟后的个体与集体的博弈过程，而是一种碎片化的过程，一些人不再关心公共事务，而是更加关注生活本身。

## 二、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信心

与前述生活判断相关，生活期待及生活信心是评价一个社会精神的另一个基本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民众的信心指数高低会影响他们公共参与、创造文明以及服务社会的积极性，所以信心与期待虽然是一种未来指向指标，但是却能够较好地评价民众的精神诉求。

在“精神生活调查”中，提供了一个如何认识“理想社会”的问题以观察中国人对不同时代社会生活的看法。在问及“最想生活的时代”时，更多的人期待生活的社会是：“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28.2%）、“竞争激烈，社会公平”（26.8%）、“社会不富裕，人人道德高尚”（18.4%）。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在判断什么样的社会更适合自己的生存时，并没有表现出对“财富”占有的太高要求，而更多地表现了对“社会公平、道德高尚”的期待。在这次调查中，我们

从职业、学历、地域、收入对“理想社会”的判断作了一系列的交互分析,我们发现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更期待没有贫富差距,生活在社会中层的人群更期待社会公平,生活在社会顶层的人群对道德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收入与理想社会的相关性方面,调查表明,认为“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和“竞争激烈,社会公平”的人群在收入高低上明显呈现相反的倾向。以月收入在5 000元—10 000元这个档次为“界点”,两类人群判断逐渐走向分化,呈反向分布。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人群,对“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的期待,高达31.7%,而月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人群则仅有10%。相反,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人群,对“竞争激烈,社会公平”的期待只有25.6%,而月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人群则高达55.6%。有竞争能力的人希望社会能够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而竞争能力低的人群则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向弱势群体提供生存保护的合理机制。在学历层次与理想社会的交互性方面,认为“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和“竞争激烈,社会公平”的人群也明显呈现出相反的倾向。学历越低的人群更希望“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相反,学历越高的人群对“竞争激烈,社会公平”的期望越高。

以上的数据可以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有所不同,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群都会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生活或条件作出自己的需求判断,这种判断较好地印证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话题,民众都强烈希望“社会分化”、“社会不公平”、“道德水准低下”的情况得到改变。2009年,国家发改委“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sup>①</sup>课题组的调查显示,有七成以上的民众对目前的贫富分化过大和分配欠公平不满意。目前来看,分配领域的不公平正在日益影响居民的整个社会价值判断与评价。美国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认为:“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这种社会比较,同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历史比较。当职工对自己的报酬作社会比较或历史比较的结果表明收支比率相等时,便会感到受到了公平待遇,因而心理平衡,心情舒畅,工作努力。如果认为收支比率不相等时,便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产生怨恨情绪,影响工作积极性。当认为自己的收支比率过低时,会产生报酬不足的不公平感,比率差距越大,这种感觉越强烈。这时职工就会产生挫折感、义愤感、仇恨心理,甚至产生破坏心理。少数时候,也会因认为自己的收支比率过高,产生不安的感觉或感激心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民众除了呼吁解决不公平,会逐渐把这种不公平上升到社会道德层面。而这种基于不公平感的道德诉求,近几年正在不同的社会事件中被发酵、扩大,甚至演变为全社会的大讨论。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就是这类事件点燃民众道德反思的一个例证。2011年10月21日,中新网题为“广东‘小悦悦事件’引发全国性舆论大反思”的文章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国人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而相关的文化道德建设却被远远地抛在了时代后面,尽快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惩恶扬善已经刻不容缓。并要求严惩肇事司机,严厉谴责18名冷漠路人。”有人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参与道德讨论最为广泛的一次大讨论。有媒体评论认为,从目前对于“小悦

---

<sup>①</sup> “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课题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25期。

悦事件”的反思力度来看,整个舆论已经完成了一次道德启蒙。我们不断告诉自己,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责无旁贷,理应担负起我们的道德责任。

### 三、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状况

价值观是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观念系统。价值观与需要、欲求、兴趣、态度、理想、信仰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很难对它们作严格的区分,或许可以把这些心理现象看做是价值观的不同表现形式。在此可以从性与男女两性关系、婚姻与家庭、金钱与道德、信仰与宗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在性与男女两性关系问题上,男女平等历来被作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男女平等的基本点就是要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尊严、价值、权利、机会和责任上的平等。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精神活动与精神诉求决定着更高层次的社会平等、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男女平等这一价值理念存在于社会成员的意识层面并体现在社会行为中,相较于实践层面,认知层面的性别平等更为稳定和持久,在当今社会价值重构和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个体对性别平等的态度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精神生活调查”中,我们发现对男女平等表示同意的人数高达93.3%,其中,相比男性,女性对男女平等价值观的认同度更高。从性别与“男女平等”价值理念的交互关联性分析上可以看出,虽然总体上男性和女性对男女平等理念都有较高的认同,但是男性对男女平等持否定态度的比例高于女性。同时,也发现对“相爱是结婚的前提,不在乎性经验”的认同也非常高,但是性别与这一认知有显著性

差异。在对待婚姻与性经历问题上,女性相对保守一些。女性群体更注重性经历对婚姻的意义,传统的贞操与忠诚对女性的影响可能大于男性。当代中国女性广泛地参与社会生产与管理,平等的国民教育与社会同工同酬给予女性以思想和经济的独立,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我价值认同得到空前的提升。与此问题相关,2010年10月28日在广州召开的“世界华人性学家高峰论坛暨广东省性学会第14次学术年会”上,潘绥铭教授介绍了由他主持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调查的2010年数据,这次调查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当属“中国人的多性伴情况”调查结果。所谓多性伴,是指一个人至调查时为止,与一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但离婚情况除外。2000年,其发生率仅为1/8;到2006年,发生率已达1/4;而到2010年,发生率高达1/3。可见,中国人对待性的问题态度正在逐渐走向开放状态。

在婚姻与家庭方面,“结婚不幸福就要离婚”这个问题的总体分布上,七成以上的人都持赞成态度,说明中国人比较传统的“从一而终”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对于“结婚决定权在自己而不在父母”的认同也非常高。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个案都赞同“结婚决定权在自己而不在父母”,只有9.2%的男性和12.1%的女性反对“结婚决定权在自己而不在父母”。另外,调查中,96.9%的人对“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说法表示赞同。与前几组数据的对比来看,我们发现中国人在婚姻决定权等具体事情上虽然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他们对于父母的孝敬还是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些都说明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传统的“孝道”观念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过程中以社会保障为特色的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而减弱。与此相关,我们还发现,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光宗耀祖”思想还有很大的存在空间(占回答总数的52%)。而且,从各种文化程度、收入等人群与这一思想的

交叉状况来看,没有显著性的不同。由此看来,我们发现中国人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交往等方面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但是维系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孝”(“光宗耀祖”也是一种“孝”的体现)——却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从金钱与道德方面看,我们给出了两个问题,试图了解当代中国人对与金钱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总体上看,人们对“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持普遍的反对态度,一半以上的个案不同意“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通过对学历与“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交互关系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高学历的群体对这种说法的反对态度明显强烈于低学历群体。另外,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不必提倡节俭”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看,八成受访者都持反对态度。这说明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传统的勤俭节约思想还占有主导地位。从此问题来看,我们发现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还存在着对金钱崇拜的否定倾向。这说明虽然市场经济推行了多年,但社会普遍认为的人们思想已经逐渐“铜臭化”的说法有失偏颇。这抑或也能说明“物欲主义”更多的是一种人文学者的解读,或者是国人对“物质主义”比较矛盾的心态。

从信仰与宗教方面看,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信仰的私人化趋向明显。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今各宗教的信众之间都有某种程度的信仰交叉,各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俗神、祖先保佑的信仰之间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叉。在中国民间,信仰问题并不完全具有排他性,对于宗教的具体形式,信众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而可能采取亦此亦彼的态度。不执着于某一特定的宗教,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里是很普遍的现象。有人说中国民间的宗教意识不专于一教,而是“逢庙烧香,见菩萨磕头”。对此,可能的解读就是:一部分信

众的皈依与信仰产生了分离,信仰某种宗教时,不一定在组织上皈依于它,而皈依了某种宗教后,却又容纳了对其他宗教的信仰。这种分离,表明了对这些人来说,宗教越来越私人化,不仅与政治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关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教会组织的约束力也减弱了。

这种现象,与现代社会有没有必然联系,很值得探讨。而更值得讨论的是,它与中国宗教的特点有什么联系。本来,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与西方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宗教信仰的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学者将中国人信仰的多元性和不专注于一教称之为扩散性;也有的学者将中国人不定于一个宗教、可以出入于几个宗教甚至同时信仰几个宗教,称为“游宗”。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指谓着中国人信仰的多元与多重。这说明,对于当代中国人,与古代一样,很难以某一种宗教来统一其精神世界。

第二,信众的年轻化趋向显著。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现在中国宗教信众已逐步趋于年轻化。从年龄与宗教信仰的交互分析中可以看出,16—39岁的信众占全部信教人数的62%,而55岁以上的则只有9.6%。如果我们依照习惯将女性退休年龄55岁以上的算作老年人,那么40岁以下的青年和中年人在信众中的比例大大高于老年人;如果按照60岁以上才算老人,则只有5.7%,差距便更大。这种情形,与我们以前估计信教群众中老年人多,结论颇有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项调查表明,39岁以下的信众只占到13.9%,与现在的62%相比,差距极为悬殊。从社会层面看,说明中国的宗教正有一批年轻人为之输送信徒,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从个人层面看,则现今的一些年轻人对于宗教的兴趣正在增强,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宗教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点,《当代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一文也提供了依据:“本次获得的调查样本中信教人员占13.58%,与2003年相比上升了4

个百分点。”<sup>①</sup>大学生的信教情形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目前信众年轻化、年轻人中宗教徒增加的趋势。

第三,宗教选择趋向传统化。根据课题所做的抽样调查,信仰宗教的人群中,佛教占的比例最高,达33.1%;道教占6.4%;民间俗神占11.5%;“祖宗保佑”占15.1%;基督教占12%;天主教则为6.1%。这一调查结果非常值得关注。之前有说法认为“近20年来发展最快的宗教是基督教”,但从此项调查来看,其信众比例远远低于传统宗教。这种情形,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大陆宗教的发展正向传统宗教倾斜。

当代中国人向传统回归的心态,不仅表现在风俗中,还有对于被破坏得太多的传统道德向往、怀念的倾向。因为目前仍然存在的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中,积淀了大量的传统伦理因子,如孝、慈、爱、众生平等、公正、诚信,等等,成为一种象征,也成为一种资源库,使得一部分人希望从中找到失落多时或者目前社会上稀缺的传统道德。这些也是宗教在当今社会里还能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同时,对中国人信仰宗教的动机的调查显示,其中由于“告知做人道理,与人为善”而信教的人数是最多的,分别占全部回答次数和全部个案数的24.1%和45.1%。除了“其他”外,被访者选择最少的原因是“治病”,分别占全部回答次数和全部个案数的4.4%和8.3%。从这些回答来看,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非常现实,除了第二点的“慰藉心灵”被认为是比较符合信仰宗教的基本原因之外,我们发现,其他的每个选择都是来源于比较世俗的原因。而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中,由于

---

<sup>①</sup> 李志英、刘木春、颜晓华、王军为、姜涛:《当代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社会科学报》2006年10月26日。

“没兴趣”不信教的人最多,占31.4%。

从总的数据结果来看,对于不信教的内容与前面信教的内容呈反向对应状态,人们不信教的原因也表现了非常世俗的一面,例如,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回答,就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个认识。另外,数据也显示了人们对信教的人与不信教的人的心态差异的评价。在整个回答中,认为“心态没什么差别”的最多,占43.2%;其次是“好一些”,占27.5%;认为“好多了”的则最少,仅占7.5%。根据这组数据,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到被访者对是否信仰宗教的看法。在大多数人看来,信仰宗教对个体人的心境并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看来信仰宗教可能并不是基于寄托心灵这一根本原因,而是如前述的一些比较现实的原因。

#### 四、人们对人生和命运的看法

与前述价值观念相关,中国人一直以来被认为对人生和命运具有非常理性的评价,人们常常能够从极其发达的古代哲学中寻找对人生及命运的浪漫主义评价,并从中获得更加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及精神诉求。在“精神生活调查”中也选取了若干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

在中国人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上,数据显示,只有27.5%的人回答“经常思考生活的意义”。这说明当代中国人很少思考这类非常抽象的问题而毋宁趋向于更加实际地活着。调查先给定出10种职业,即科学家、教师、艺术家、慈善家、医生、运动员、厨师、侦探、市长、银行家,然后让被访者选择“如果他们都很有钱,哪些人生活得有意义”。结果显

示,认为“科学家”生活有意义的,在所有回答次数和个案数中的比重最大,选择“银行家”的在所有回答和个案数中的比重最小。从排在前五位(即科学家、教师、艺术家、慈善家、医生)的职业性质来看,我们发现,这几类人基本都是从事具有精神价值并且会对人类生涯产生深远影响的职业。而后几类职业(即运动员、厨师、侦探、市长、银行家)相对来说,则比较现实化,他们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可能比较局限于生活层面。这显示了人们对精神产品的关注度要远远高过物质产品。从最后一位都是银行家这个判断来看,我们更能发现中国人特有的价值判断取向。当人们物质处于满足状态时,显然追求的目标就会更趋向于精神。另外,从这个问题我们也能够看到当代中国人对不同职业声望的评价以及对其所代表的价值倾向所具有的期待。与此问题相关,为了观察中国人对不同阶层群体的价值的判断,我们设置了“几户人家的公用空间上放了一些垃圾,不知哪家邻居悄悄把垃圾清除掉了。您觉得最可能做这件好事的会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数据显示,有3 544位被访者认为“垃圾是普通市民清理掉的”,在所有选择中频次最大;其余依次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信教的人”;认为是“做生意的人”最少。与前述关于各种不同群体生活意义的评价相似,这个问题更加具体地给出了中国人对不同阶层群体“助人为乐”精神的评价。从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对不同信仰群体的价值判断可能与普遍认为的状况有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人对“来世”的认识上,我们也设置了对“这辈子做好事,下辈子就会得好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以考察中国人对待“来世”的态度问题。数据显示,有27.1%的人表示“不相信有下辈子的说法”。另外,对此被访者还提出了其他的理解方式,但是出乎预料的是回答完全一致,即被访问者都回答为“虽然不相信,但还是应该做好

事”。这个问题与宗教的信仰状况和对命运的看法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即,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中国人在宗教和命运这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上虽然比较现实,但是在对于“来世”这种相对模糊的问题上却表现了一种独特的“浪漫性格”。与此问题相关,我们还设计了另外一个情境性问题以考察中国人对待“自我(包括孩子、父母)”与“来世”的态度。在这个情境测试中,我们假设一个人开车撞倒一位老大妈后逃跑。他找到算命先生算命,让被访者选择这个人最怕算命先生说哪句话。其中,选择“自己大祸临头”的最多,其次为“孩子”、“自己内疚”、“父母”,选择“下辈子有恶报”的则最少。从这个问题中,我们发现,中国人对待“来世”的心态比较矛盾,在涉及具体问题时他们对自身的关注度明显提高并变得比较现实。而在这种状况中,也显示了他们的个体主义倾向非常明显。

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传统历来是比较世俗化的。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大多数人口都不属于某个有组织的宗教,中国人的主要文化传统是不谈论“怪、力、乱、神”的儒家。罗素在比较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时指出:“中国实际上是缺少宗教的,不仅在上层阶级当中,而且在全体人口中。中国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伦理规范,但这个规范并不是严厉的、惩戒性的,而且并不包含‘原罪’的观念。”<sup>①</sup>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赞成罗素的观点,认为虽然像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精神文化也是以宗教开端的,但后来,中国文化的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这里的“周”指周公,表示归在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名下的礼乐制;这里的“孔”当然指孔子,代表孔子所阐发的教人的道理。相比之

---

<sup>①</sup> Bertrand Russell, *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 Routledge, London, 1992, p. 551.

下,孔子阐发的道理是更为根本的贡献,而孔子学说的特点与宗教的区别正在于,他不谈对于宗教来说不可缺少的生死鬼神问题,而大谈宗教所贬抑的人的理性,主张依靠人所固有的理性来稳定人生,而无需像宗教那样向外寻求希望。这种理性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也就是人的自我省察、自主辨别、自求约束的能力。儒、道、释是中国传统的精英精神。与精英精神相比,中国传统的民间精神一方面似乎更“超越”——充满着大量“怪、力、乱、神”成分,另一方面又似乎更“内在”——在民间精神体系中,更多地追求福禄寿等世俗价值。用牟钟鉴的话来说:“在中国原始信仰发达和多种宗教并存的环境里,中国民间精神便形成了多神崇拜和实用功利的特点,见庙就烧香,见佛就叩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求临时抱佛脚。”<sup>①</sup>而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为基础,现代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和经济收入的群体差异,势必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

<sup>①</sup> 牟钟鉴:《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卷三:宗教、文艺、民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 当代中国的文化张力

把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提高到战略高度,并不意味着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只是一种振兴中国的手段,实际上这种发展背后的精神因素本身还具有一种强劲的文化价值张力,它对于世界全球化范围内塑造个体与社会的健康人格、价值观念以及文化精神方面,对于培育现代人文精神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 一、拉动消费与艰苦奋斗

全球经济由生产型社会迈入消费型社会的过程中,价值与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消费本身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消费文化也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费瑟斯通指出:“这里有双层的涵义: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具体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下的消费理念中人文因素持续增加,消费取向中的精神需求越来越强,消费结构中的非物质含量不断扩大。但是,在社会变迁中伴随消费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中奢靡之风引发的炫耀性消费对社会文化、价值行为方式,即发达国家向全球辐射的“奢侈、浪费型”消费文化、盲目追求高消费和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的不良影响也不容忽视。

2008年席卷全球并持续已久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敲响了警钟。整个海外市场都面临需求萎缩,中国出口遭遇“寒冬”。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扩大内需,不仅是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出路,还要为以后30年甚至更长时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反思2008年爆发的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原因归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以过度消费、提前消费的消费主义为基本价值观的“消费社会”发展模式。全球金融风暴之后不久,日本早稻田大学原英资教授就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这场由美国金融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标志着20世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高消费时代的终结,为“物”时代画上了句号,也许意味着人类进入了重视“身心”

价值的新时代。而近期持续在美国爆发并波及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从一定方面表达了发达国家的民众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的横暴”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否定。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社会的全面转变,消费主义现象就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和批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消费主义作为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的一个负面现象也伴随而来。消费主义的极端形式是贪图享受的奢靡之风,它既大量消耗着国家的财富与资源,又腐蚀着人们的精神情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对全民族的精神素质和道德面貌造成负面影响,加剧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矛盾。

第一,市场经济的享乐主义淡化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机制和“道德监护权”作用,使一部分人对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发生扭曲,甚至导致个别人的腐化堕落。当人们看重自己的财富地位、权力身份时,就要尽其所能地去炫耀和攀比,把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定位在不断满足日益升级的炫耀需求上。

第二,消费主义中炫耀性消费导致的资源浪费,有悖于创建节约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投入大量的资本和消耗大量的资源生产炫耀性商品:为了摆阔一掷千金、大肆挥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耗费了本可以节省的资源和财物。我国资源状况已经制约了经济发展,满足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基本需要的资源都难以保证,而炫耀性消费对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耗费,则直接影响到创建节约型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三,社会生产的非理性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炫耀性消费使社会财富的效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体现,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

炫耀性消费使大量的奢侈品生产耗资巨大,导致社会生产导向不合理,使大量资源和财力投入可供浪费的生产中。而过度消费能源和资源的问题,暗含着消费公共稀缺资源的负面影响。使用资源能源虽然是市场行为,但资源能源一旦被消费便不复存在。因此,自然资源具有社会公共属性,任何人只有依法合理使用的权利。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不正是对物质欲望的不断扩张,才造就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物质的繁荣和发展吗?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在何种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西方思想界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分别以韦伯和桑巴特为代表。他们从两个角度研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需的精神动力问题。

马克斯·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的肇始。<sup>①</sup>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了新教伦理与驱使资本主义产生动因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sup>②</sup>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勤勉、精心谋划及按照节省原则去获取利润的节俭积累观念、时间观念和诚实谨慎观念。在这种精神中,世俗禁欲主义与经济获利行为获得了统一,人们的经济获利行为不仅获得了道德的认可,而且具有内在的伦理张力。

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尽管同意韦伯关于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论点,但他不同意韦

---

<sup>①</sup> 参见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34页。

<sup>②</sup>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9页。

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结合的观点,甚至提出资本主义产生于犹太教。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认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的消费原则。从13世纪开始,西欧上层社会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财富的迅速增长,宫廷中讲究排场,注意享受的奢侈之风开始盛行,在宫廷的榜样作用下,奢侈之风又迅速地蔓延到了西方的整个上层社会。<sup>①</sup>透过奢侈之风的盛行揭示了社会财富流向的变化与社会结构重组、阶级分化的事实,以其特有的方式推导出资本主义兴起的经济基础与精神因素。

丹尼尔·贝尔认为韦伯所重视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另外还有一个精神起源,那就是贪婪攫取性。在这样的理论反思下,即便是西方资本主义也不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对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进行相应调整。“举债消费”试图通过消费来达到刺激或者说再造市场机制的活力;“消费民主化”进程,将消费渲染为一种爱国责任,以繁荣经济,稳定政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下,消费者虚荣心和无止境的消费欲望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现代科技革命等手段使消费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转而成为一种新的消费精神,无节制地消费和占有物品。炫耀、不顾后果的浪费和基于嫉妒的人们的相互攀比激起更加奢侈的消费行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膨胀,追求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规范和中心。然而,短暂的愉悦、浮华背后却是深刻的危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冷漠以及人与上帝的疏离。

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问题的认识方面,丹尼尔·贝尔的

---

<sup>①</sup>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韦伯和桑巴特是达成一致的。书中形象刻画了美国社会的文化矛盾：“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目前美国社会“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sup>①</sup>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教禁欲主义和贪婪攫取性成为现代化国家消费社会的深刻根源。

正是基于上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我们必须努力把艰苦奋斗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获得持续、稳定的增长，被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实际上，“中国式成功”的起点，并不局限于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传统对人的精神的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应有之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廉正的道德取向是古人立身修德的基本要求，也是其他道德范式形成完善的原动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良好品德和坚忍不拔的创业毅力，体现了传统文化崇尚勤俭戒奢、廉明正直的价值取向。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实践中，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培育了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特别是培育了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革命、建设、

---

<sup>①</sup>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119页。

改革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样,雷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影响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行。如今,雷锋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001年,雪村的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凭借后期制作的flash动画从网络迅速传播到现实社会;2004年5月,盛大网络游戏公司推出了让青少年以娱乐的方式来学习雷锋所代表的传统美德的教育游戏《学雷锋》;还有李宁公司推出的“雷锋帽”、“雷锋鞋”一时成为时尚……这都充分表明,雷锋已经成为一种熠熠生辉的文化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丰富张力的文化符号。<sup>①</sup>由此可见,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拉动消费的同时还要坚持艰苦奋斗呢?诚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老矛盾交织,短期困难和长期问题叠加,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唯有不畏艰难、矢志奋斗,方能稳中求进、赢得未来。如何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保持艰苦奋斗精神?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历来都是从国家层面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要求。从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勤俭建国”,邓小平的“艰苦创业”,到胡锦涛对艰苦奋斗“现实意义”的强调,无不说明要巩固中国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要有过紧日子的观念。

精神空虚不是社会主义。如今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发生变化。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看能否最终实现生活富裕和逐步提高生活品质,而不是简单的资产增值。在当今中国,中产阶级成为

---

<sup>①</sup> [http://www.wenming.cn/zyfw\\_298/djt/201203/t20120315\\_563158.shtml](http://www.wenming.cn/zyfw_298/djt/201203/t20120315_563158.shtml).

“新酷”，民众盼望着“文明的言行和举止”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重返社会。人们意识到，耀眼的名牌和华丽的珠宝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幸福。Prav(是 the proud realiser of added value 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骄傲的附加值实现者”)一族不是只图便宜，而是看重消费的价值。认为东西越贵越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务实化的购物方式回到了我们身边。Prav 不仅仅是作为反 Chav( Chav 指的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文化并且有反社会或者不道德行为倾向的人)的力量兴起的，它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符号。与经济大环境的发展有关，人们开始选择更理性的消费方式。

对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国际金融危机是改变世界观和现有生活方式的一个契机。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随之而来的是物欲横流的奢靡享受，“节约”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式。过度沉湎于物质享受难免会让人感觉空虚，而金融危机的到来则让习惯了各种奢侈消费的人们开始反思：节俭是否意味着落后和守旧？在狂热的消费理念退潮之际，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崇尚简单自然的生活，甘心做“NONO”<sup>①</sup>族。

## 二、提倡创新与脚踏实地

任何时代中创新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所处的生活状况在不断变化，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变化。

---

<sup>①</sup> “NONO”一词来源于加拿大记者克莱恩的畅销书《拒绝名牌》，倡导的是一种都市中的理性消费和简约生活，推崇“新节俭主义”的理念。

随着时代变迁,全球化的今天,创新这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变。创新精神成为从民族到个人,从国家到企业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创新,需要一种先进的社会文化。创新或创新意识,是先进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理论,目前已跨入“创新驱动”行列的国家有:英国(19世纪前半叶);美国、德国、瑞典(20世纪初);日本、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21世纪初)。那么,中国是不是?面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问题,仍有不同声音。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城市化率水平还比较低,故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和资源流动性需求,投资需求带动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以寻求合理的资源配置”,但“从GDP构成看,无论是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还是金融业中的创新业务收入占比,或服务业中的新兴产业、新型服务模式的占比,都非常低,累计不足其GDP总量的10%”。因此“即便今后还是延续投资驱动的现有模式,城市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10年之后的城市化率提升至60%,也仍然没有达到创新驱动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sup>①</sup>。上述观点直接来自西方语境下的经济学。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需要特别深入研究。例如上海浦东的发展20年前主要依靠体制和政策、环境和成本的驱动,技术创新驱动主要来自引进项目和资金。如今以自主创新为推动力、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将是实现浦东二次跨越的重要保障。<sup>②</sup>在新一轮的创新改革研究中,将改革与创新结合起来是改革开放继续发

---

① 朱敏:《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每经智库”2012年4月26日。

② 李玉:《学界寻找改革创新与转型发展驱动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5日。

展的首要任务。从2012年开始,上海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体现国家战略、体现上海优势、体现国际竞争力的发展定位,为上海发展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取得重大成果。上海临港产业区经验值得一提。他们坚持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以自主创新为主、以产业集聚为主,致力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全国领先的国家级自主创新装备工业园区。目前该区已引进项目154个,总投资超过600亿元,形成了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整车及零部件、大型船舶关键件、发电及输变电设备、海洋工程装备、民用航空产业配套、大型工程机械等制造业基地。

当创新从企业精神扩展到社会的生活方式,创新才有了活水源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国家创新的重大战略,融入新一轮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之中。在我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和科技工作正面临的种种严峻挑战中,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迅速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尽快占领一批科技制高点,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

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新看待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现实,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时代特征、世界形势、具体国情的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基础。中俄20年来截然不同的发展,令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也深刻感受到:中国的成功在于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创新境界的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突破主要体现在:第一,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创造,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第三,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

义模式的突破；第四，实事求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和民生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对苏联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

对待创新的态度，可以“看”一个国家或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话题，归根结底它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哲学创新的根基就在于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现实生活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脱离生活的哲学是否还是当代人的哲学。

哲学是记录生命自觉的历程。中国人在修养中自觉到人是在应对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展开出来的生命现象使得中国哲学不再仅仅是纯粹意识的力量，不是单纯感性或纯粹理性所能表示的力量。《周易·系辞上》中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变而通之以尽利”，“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通变之谓事”，中国哲学反复强调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创新，实现社会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 三、与时俱进与坚守信念

全球化下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如何在风云变化的国际舞台上坚守自己文化传统和民族的自我认同问题。在全球化世界的科技神话中，越来越难以划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但是，无论何时，文化传

统都不等于应该摒弃的思想包袱。中国文化历经千回百转而生生不息的动力正在于一种价值信念的精神支撑。

如今在全球化无法阻挡的浪潮中,反全球化的声音却越来越大,全球化走向何方引发新一轮的全球化反思。一些人把全球化理解为公司的全球化,他们之所以反对这种全球化是因为他们正面对着失业的压力,因为有关公司不断离开他们的所在国而到劳工成本、环境标准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一些人是因为肤浅、片面,甚至极端地理解全球贸易自由化,认为贸易自由化才是这个世界贫富悬殊与生态恶化的元凶。更有一些人担心全球化将扩大“全球民主赤字”,富者更富、更有发言权,弱者更穷、其声音更加微弱,国际组织可能不幸只服从于公司与资本权势的利益。一些人则是同情非洲、亚洲等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边缘化地位。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在《布鲁金斯评论》2003年春季号上刊登的《非对称全球化——全球化市场要求理性的全球化政治》一文认为,全球化既不是在全球引发贫穷和不平等的“罪魁祸首”,也不是解决这些难题的希望所在。改革国际经济组织和不平等的全球化政治现状,才能够最终消除全球的贫穷和不平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不同学者纷纷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角度来考察与研究全球化问题,并不断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全球化陷阱》一书指出“这种全球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政治学神圣学说的崛起同时发生的”,这种所谓的神圣学说的深刻思想背景就是新自由主义。因此,在“市场是好的,国家干预是坏的”<sup>①</sup>理论陷阱

---

<sup>①</sup> [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中,人类担负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风险,而政治风险很可能要远远高于担负经济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应对之路,是我国面临的当务之急。未来全球竞争,各国不再是简单地为生存提供保障,而更多的是向人类提供多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矛盾的深刻分析基础上作出的理论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爆发政治风波,当时有外国媒体就借此机会诋毁社会主义,预言“社会主义大失败,社会主义将退出历史舞台”。国外一些势力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害怕又仇恨。因此,中国高举的社会主义旗帜究竟如何凝聚人心、聚集力量?从中共十三大到十七大,中国在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将共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原则下,围绕三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等,体现了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发展三大问题的统一,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鲜明地表达了两个内涵:一是中国共产党庄严声明中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决心和勇气;二是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有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进方向,展现了我们的信念和精神支柱,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与价值追求。

“会通以求超胜”，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它必然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活”的灵魂融入时代精神之中。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家庭伦理在学校和社会教育中，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秉承“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会通”、“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勤俭廉正、精忠爱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生活在全球化的中国传统之中。

先进文化需要先进政党的领导。这决定了文化从哪里来、走向哪里、为谁服务的根本性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需要。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根本制度和要求相适应，必然要有一个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

正如一个民族要有民族精神做支撑一样，一个城市的城市精神也不可或缺。它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与品质，是市民们认同的价值观与共同追求。如今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城市核心价值观将宏大的国家核心价值落实在城市实际生活中，尤为精彩。2011年11月2日，北京市公布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指出要结合上海历史文化积淀和现阶段发展实际，积极倡导上海“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城市精神和价值取向。当代城市精神作为核心价值的个性表达，培育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文化和精神气质。

## 四、宽容多样与把握导向

全世界都在猜测着经济腾飞后的中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蕴含在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内涵之中。面对“中国威胁论”到“中国不确定论”,中国不断向世界展示着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全球化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围绕个体的价值观念更加多元,更加注重幸福感和精神生活质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生活具有较切合实际的行动能力,对克服困难具有更为主动的精神。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个体回归文化的热情被强有力地扭转为“一切向钱看”,一切以经济为唯一标准,但 90 年代的中国人升华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却并没有丢弃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困难面前,中国不仅不畏缩、不退后,反而展现出对克服生命厄运和与命运战斗的勇气。中国展现的人性魅力是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崇高体现。中国的主流文化方向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进步为目标,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为标准的荣辱观和价值观。即便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一个中国人仍旧有义务、有责任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的正义和道德文化,多元文化中如果与这一点原则相违背,就不是健康的文化形式。它代表着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方向,这个方向为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主体理念服务,只有在多元中把握导向,国家和民族才能健康生存与发展。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工业化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交织中,当代中国人所处的文化状态更为复杂而多元,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不断地产生新的文化形式和内涵。我们走进了多元文化时代,有了信息文化、数码文化、网络文化、博客文化、短信文化等伴随高科技的全新文化,使社会对个体价值观的选择更加宽容,网络自由度更加开放。但也由于发言者身份隐蔽,并且缺少规则限制和有效监督,围绕网络的平台成为一

些网民发泄情绪的空间。网友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对社会问题的片面认识等,能够利用网络得以宣泄,甚至有些还成为快速散播谣言的工具。伴随而来的是媚俗搞笑的肥皂剧,网吧里的裸聊室,黄碟赌场的六合彩,买卖文凭和学术造假……如果不有效地把握导向、打击制造和传播谣言,进行舆论监管,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近年来,网络造谣行为有蔓延趋势,既有对公民个人的诽谤,也有公共事件的捏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地震谣言令山西人街头避难、“滴血食物传播病毒”引发恐慌、“蛆橘”传言让全国柑橘严重滞销……<sup>①</sup>只有依法打击网络造谣传谣势力,才能维护网络正常秩序,捍卫网民的合法权益。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历来就与经国伟业联系在一起,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担负着社会教化、道德批判的重任。在当代中国,文学也可以从沉重的框架中解脱出来,不必再背负重压,而以一种轻松、直截了当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2008年的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之所以受到众多年轻观众的热捧,主要原因在于流行文化在言说方式上的创新。片中包含了很多流行文化元素,文化的多元要素有机组合,实现了中西合璧;剧中既有纯娱乐的肥皂剧台词,也有贴近观众实际生活的体会,正是因为观众了解这些,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看的时候自然就体会到乐趣。这种乐趣是一种生活中的沉淀,它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即友爱、亲情、爱情、奋斗等以流行文化的方式,进行中国传统价值观教育,取得年轻观众的认可。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45.5%的人肯定近几年来“主旋律”影视剧变得越来越好看了。“好看”的“主旋律”影视

<sup>①</sup> 《从根本上铲除网络谣言的土壤》,《南方日报》2012年4月11日。

剧中的典范有《建国大业》、《潜伏》、《风声》、《解放》、《奋斗》等。《潜伏》更是赢得收视冠军,制造出一股“潜伏”现象。主旋律要赢得观众认可就是要在创新上契合观众。这些深受广大观众热爱的中国“主旋律”电影电视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改变了以往程式化的政治说教方式和“高大全”的人物形象,避免了枯燥的政治说教和道德神话,成功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空间和市场空间,对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生存和文化产业之路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这就是中国智慧的故事。中国智慧是结合认知与逻辑的思维机制,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从《周易》开始就离不开一个“和”字。北京故宫的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名字都与“和”有关,体现了中国人对“和”所蕴含的精神价值的独特理解。中国人所谓的“太和”是最高和谐;“中和”是阴阳相互协调产生的和谐;“保和”就是当它不和谐的时候,进行一种管理调节使它和谐。这就比西方的“和平”含义更为深刻而灵动。

在人类社会中,科学与哲学对世界所进行的一切价值思考都日益显示出和谐的价值意义:事物间要得其平衡,方可产生新的事物。古代西方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用“数”来说明世界到达和谐方可进而发展:有限与无限、动与静、曲与直、方与圆、明与暗、善与恶、一与多、雌与雄、奇与偶、左与右,只有在和谐中,数以及数组成的世界才能获得发展。古代中国的《国语·郑语》记录了公元前806年至公元前770年之间的史伯与郑公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

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刳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这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并得其平衡,故而能产生新的事物。“迄今为止的量子论、相对论、测不准关系,都说明了世界的特点,其规模只有适中时才是可确定的现实。”<sup>①</sup>中国和谐智慧对世界的启示不仅在于一种平和的心态,更多的在于东方人所特有的对待生命、对待世界、对待他人自我的思维方式。具体体现为:

第一,关注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对人自身和谐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只停留在与普遍知识相关的思想方式中是不可取的。如果不同形态的知识联系着人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那么,以某一种知识压倒其他知识就意味着以一种生存方式对其他可能的生存方式的压制。然而问题在于,人类并非只停留在逻辑思维的方式中。生活没有既定答案。无论这种思维方式曾经取得过多少辉煌成就,都不能替代当代人正在进行的其他各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生命实践。在中国人眼中,和谐中包含着变通的智慧。

第二,高度重视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先进的现代科技一方面为实现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潜能创造了无限空间,另一方面也提出在社会历史和政治实践中,个人与社会、群己之间如何实现和谐共存的客观要求。生态问题是人类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影响着发展的全局,也决定着发展的可持续性;既影响着人类的现在,也决定着人类潜在的未来。历史与现实都警示我们,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

---

<sup>①</sup> 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I)》,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给中国的老百姓一个美好的生活家园,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发展。以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有利于培养广大群众的公民意识,增强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认知,锻炼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某种程度上,这也构成中国的软实力。

# 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中国没有成为人类的负担,反倒成为世界稳定与发展的一支促进力量。然而,既能够在硬条件上实现跨越,又必须在软实力上有所建树,这才能构成新时代中华文明历史使命的两大基本面。倡导“和为贵”的儒家理念,为国际经济社会新秩序提供思想支撑;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价值参考;积极整合现代化、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精神资源,创造新型的文明样态,是未来中国所应该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 一、大国崛起与大国责任

从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到巍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只用了短短的30年,时间之短、变化之迅速非常令人惊叹。中国人由贫困迈向温饱意味着解决了人类生存的一大难题,中国的存在没有成为全世界的一大负担,相反,中国的迅速崛起却能够积极为全球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中国离不开世界,因为中国的发展绝不可能游离于国际市场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的产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未来十年中,中国是解决全球三个主要问题的根本。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环境、能源和经济。中国将帮助决定世界如何发展,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努力赢得一个稳定繁荣的未来”<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国际生活中,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身处危局。通过理性而认真的思考,邓小平为当时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所制定的战略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同时他还要求“决不当头”。

在汉语文化中,韬光养晦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生存策略或生活谋略,人们迫于眼前的困境与压力,树立远大志向,努力克制自己过激的情感,强调通过清醒的理性计算与谨慎、踏实的行为,积聚力量,等待时机,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的,有时甚至还必须付出必要的代价,承担一定的痛苦,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智慧起源于早期兵家“以柔克刚”的哲学理念。《老子·七十八章》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

---

<sup>①</sup> [英]凯利·布朗:《为何中国对大家都重要》,《泰晤士报》2008年7月14日。

莫不知,莫能行。”弱者、柔者之所以能够战胜刚者、强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前者能够懂得迂回、守全的战略谋划。中国历史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都是韬光养晦智慧的极妙运用。

针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国际与国内都有不少人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对垒态势。但邓小平指出:“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sup>①</sup>“不当头”指不做所谓的“世界领袖”,不主动挑战任何国家和地区。邓小平还进一步强调说:“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sup>②</sup>无疑,作为“我们自己的事”的“一件事”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把中国的综合国力搞上去。这是“韬光养晦”策略的真实目标。而一旦我们先把自己的事做好了,腰杆就硬了,再遇到任何复杂的国际问题都能够应付自如。没有国,哪来的国际?如果我们的真实目标达到了,中国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其他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占世界人口的近1/4,而且大部分在农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都处于转型阶段,而且是多种层面的转型同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好自己问题,就是对世界承担了最大的责任。”<sup>③</sup>所以,无论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决不当头”、“干好自己的事”意义上的韬光养晦仍应该继续成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政治与外交的一项稳定国策。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③ 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然而,坚持韬光养晦的策略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始终只愿意扮演一个一无所为的角色,毕竟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毕竟中国还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并拥有一票否决权。自20世纪70年代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体系里始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定义国际关系、规定世界议程、参与解决全球事务等方面,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中国从来都没有自诩过所谓“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但却默默地充当着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身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上,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势头。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江忆恩在《中国和国际制度:来自中国之外的视角》一文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由原先完全孤立于国际组织,而转向于积极参加了约80%的国际组织。在战略上,参与与介入只是一种开放的姿态,表明自己在国际大家庭里还处于初来乍到的入门阶段。长期地看,中国将成为国际秩序中的变革力量,甚至还应该是一支重要的变革力量。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的介入和参与,世界便不完整。相反,对于任何发达国家来说,拒绝中国、围堵中国、孤立中国只能导致自我利益的丧失。于是,在许多领域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上,中国的声音已经不再可听不可听。另一方面,国际生活中,如果中国因素不发挥任何积极的或建设性的作用,则表明中国不能与自己的大国地位相称。

所以,中国政府在不违背“韬光养晦”策略的大前提下开始重新树立一种有所作为的国际形象,并寻找自己在改造国际体系、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的切入点。1978年以来的持续发展,为中国积攒了一定的重新塑造形象的物质基础。“对中国的最大挑战,不是力量的持续提

升,而是如何使用其力量。”<sup>①</sup>或者,中国将在什么方向上使用自己的力量。中国如何在美、俄、欧盟等强国与地区的夹缝里谋取自己的存在空间,赢得属于自己的发展机会,的确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2001年6月,在中国方面的积极倡导下,被世界媒体誉为“具有区域合作典范意义”的“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旨在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安全、经济合作向深层次发展,不断加强与对话、交流与磋商,致力于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政治基础,促进中亚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程。自成立之日起,上海合作组织便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2002年10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边境地区成功举行了代号为“01”的联合反恐实战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与外国军队联合举行的军事演习,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国与其他成员国首次举行的双边联合军事演习,因而备受世界瞩目。

“做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角色选择与自觉定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根据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我们的国际定位一直在调整,从最初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到“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到“中国属于发展中大国”,直至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支持公正与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反映了中国正在不断崛起。中国政府提出了21世纪的三大目标,即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维护世界和平。显然,现代化与国家统一完全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而维护世界和平则涉及全人类。应该说,中国政府的这一目标设定,首先出于为国内深化改革开放创造良性国际环境的需要,但同时又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威望与影响

---

<sup>①</sup> 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力。中国穷则世界穷,中国富则世界富,中国乱则世界乱,所以,即使是最纯粹、最简单的中国内部事务,如果处理不当,也容易产生消极的国际影响。同样,即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聚精会神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在为世界和平作贡献。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说过:“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sup>①</sup>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防御性国防战略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做任何破坏与危害现有国际和平的事情,中国早已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在国外没有任何驻军。中国人奉行自卫的原则,不对任何国家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挑衅。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裁军100万的基础上,“九五”期间裁军50万,2003—2005年间又裁军20万。中国政府公开宣布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因此决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应该承认,中国在参与国际军备竞赛控制和不扩散机制方面也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30多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参加了一系列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机制,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等。中国政府还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并且承诺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的指针和参数。<sup>②</sup>中国政府信守承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核武器和化学、生物武器及弹道导弹技术与物质材料的出口。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军事大国,但中国更是一个敢于并能够负责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页。

<sup>②</sup> 江西元、夏立平:《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任的军事大国,中国的军事存在没有令世界人民不安,却能够让世界人民放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人与环境、经济与资源协调发展的道路,是中国敢于对全球环境与人类发展承担责任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当前我国环境问题面临着历史上任何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复杂和严峻局面,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逼近其生态极限。30多年中国的高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建立在高能源消耗的基础之上。2003年,中国的GDP只占全球总量的4%,而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中国的能效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欧盟的四分之一。因此,中国政府决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将经济发展的方式逐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服务业水平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这无疑将有助于保护人类有限的生存空间。

## 二、和为贵: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支撑

传统儒家“和”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它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而启发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们如何正确对待身边的人、物、事和自己,而且还体现在它对全球伦理的建构也能够发挥积极的参照与借鉴作用。

伦理意义上的“和”,最先仅仅作为一种个体私德。《尚书·周书·毕命》中,康王称毕公“克和厥中”,即能够始终坚持和的原则,把持中道的基本精神。《周书·君陈》中,周公要求君陈说:“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即待人宽厚又有规矩,言行举止雍容、平和。对事情,必须有忍耐性,才能够取得成功。对人,

则应该宽容,于是才能够培养出深厚的德行品格。和,作为一种个体私德在人群中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即已被推广到王朝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

中国人很早就善于把和的理念运用到国家统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活动中,因而积累出丰富而深邃的经验智慧。《周书·多方》中,周公说:“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如果你们的领地尚有不和睦,如果你们的家庭还不是很和睦,就请竭力协调与调和吧!《周书·立政》说:“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周公希望成王和文武百官们能够治理好百姓,调和众多的狱讼是非。《周书·君牙》中,周穆王说:“弘敷五典,式和民则”,强调要颁布君臣有义、父子有仁、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典则,以和作为百姓生活的基本理想与要求。《周书·周官》曰:“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强调用和的理念治政,可以协调、处理好不同邦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尚书·顾命》又提出“燮和天下”的美好政治理想。

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多样性,因而是一个多元化的缤纷世界,不同国家之间显然存在着人种肤色的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经济制度的不同、思想意识的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等。这是现代化运动、全球化运动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现实。人种肤色、历史背景、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地域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作为群体存在的人类具有不可消弭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而这又客观地决定了道德共识的限度与深度。于是,全球伦理便不应该是一种强制性的观念主张,它所注重和追寻的应该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相互融通的道德共识。

后冷战时代,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都行不通,注定是走不远的。把本国的主义、思想、主张、宗教强加于别的民族、国家,已经

被证明是十分有害的。谋求世界新秩序不可能采取统一的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推销仅仅为个别国家、少数人群所信奉的价值观,而应该充分尊重各国、各地区的特殊性,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己所选择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提倡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相互促进,从而实现共同进步与协调发展。所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目标与理想。

正因为人类存在本身始终具有道德的倾向与维度,道德共识、全球伦理的建构才能够获得可靠的人性论基础。实际上,道德并不是附加在我们身外的累赘,而是我们生存在世、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一种必须。人类需要道德地活着,或者,人活着需要道德的指引,依据道德已成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断爆发的国际冲突、严峻的世界形势要求人类以自己的公共理性和共享的价值秩序为基础,整合不同文明的道德资源,努力扩大相互间的共识,尽快形成一套具有普遍合理性的正义规范伦理。但这又不应该以一种契约的方式,毋宁以一种道德对话的方式而进行。显然,和的思想观念能够被世人广泛吸纳,而呈现为一种共度性道德。

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认为,随着冷战结束,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将不再是军事、政治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紧张。<sup>①</sup>尽管准确把握了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但他却没有意识到,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只能够通过道德的方式予以解决。一个多元、自由而理性的世界新秩序的确立应当在保

---

<sup>①</sup> 塞缪尔·亨廷顿说:“文明的冲突是近代世界冲突演化的最新阶段。”“新世纪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如果真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它将是文明之战。”参见《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3年10月号。

持尊重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又能够保持对人类共同道德问题和道德责任的关切与承诺。国际争端中,尽管利益的牵制始终是第一位的原因,但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地看待问题,以道德的心态、以博爱的情怀理解对方,那么,就一定会发现更富有成效的解决路径。历史地看,政治宽容、宗教宽容、文化宽容的态度总胜过显赫一时的话语霸权、军事威胁、经济制裁乃至战争恐吓。

值得指出的是,儒学之“和”始终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定,而不是无原则的附和、苟同或迁就,“同”不是“和”,“和”有别于“同”。根据《国语·郑语》的记载,西周末期,史伯以乐声演奏为例阐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的思想观念,认为这是“先王聘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的根据所在。物与物同,则不可能呈现所谓世界万物。只有差异与矛盾才能化生万物,成就出世界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而在孔子,则有著名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sup>①</sup>之说。和与同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它可以现实地成为推动社会前进与历史发展的引擎。儒家讲“礼”,当然要在上下、尊卑的等级之间谋求一种平衡与融洽,而一旦尚同、等齐、划一,则扰乱了礼的既定秩序。但无论如何,和有前提,同无原则。

因此,和允许差异,容忍他者。万物之间有所区别才能够成就出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如果万物都只是同一个物而已,那么,怎么可能真实地区分出这一物与那一物呢!儒家一向强调有差别的和,而反对一味的同。“同乎流俗,合乎污世”<sup>②</sup>,和是君子的所作所为,而同、合

① 《论语·子路》。

② 《孟子·尽心下》。

则为小人之所据。和,绝不是随波逐流,也绝不是滑头主义的“乡愿”或“好好先生”,而始终是有原则、立场的坚执。

根据“和而不同”的思想观念,我们在解决当今国际争端的时候,既应该有对差异性的充分尊重,体现和的原则性,又应该致力于寻找跨地区、跨文化的共同点,扩大国与国之间的可沟通性和可通约性,尽量让不同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冷静地坐下来,通过谈判、协商,以和的方式解决问题,进而真正实现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谋发展。所以,就处理日常的国际事务而言,一种具有平等对话性质的“商谈伦理”的建立便显得尤为迫切。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首先来源于世界大家庭里每一个存在都能够获得最起码的尊重。《礼记·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认可、接纳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个性、文化个性和宗教个性,我们的世界才能呈现出和谐发展的生机。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自身的文明传统长达五千年之久,历经千万次劫难而又能够千万次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自身内部能够自行生发、催化出一种促使人群团结、提高社会和谐度的黏合剂,以增进全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即便在当代也是如此,今天的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与精神、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比之于世界上许多单以民族立国的现代国家,中国人似乎更善于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乃至求同(道德共识、可通约性)存异(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尊重对方、理解对方,而并不谋求改变对方、征服对方,因而善于建构并能够适应多元一体的共生环境。这或可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提供有效的精神资源和价值基础。得益于儒家“和为贵”的理念支撑,未来的国际生活和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

同文化之间方才可能形成一种建立于自立、自主、自强基础之上的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 三、中国道路的形成与价值贡献

在西方化之外,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中华文明在现时代对人类进步所作出的一大贡献。应该说,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便热切地思考与探索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马克思设想中的社会主义是完全建立在充分发达的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但如何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设社会主义,则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难题。唯有积极创造条件,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毛泽东始终强调自力更生,而自力更生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基础。1949年我们的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在这样一副烂摊子上推行与实现工业化,难度可想而知。出路只有两条:一是依赖进口,二是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业基础。

而当时的中国已经被资本主义国家封锁,要进口只能依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所设想的国际分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和轻工业国家,并不想让中国拥有自己的重工业基础。然而,毛泽东却并不愿意让中国成为任何国家的经济附庸,在关系国家长远利益的问题上,他把发展重工业摆上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并且,毛泽东发展和管理重工业的方式方法显然区别于苏联高度集中的“一长制”,而采取了集体领导与地方分权的方法。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突破“两个凡是”的

禁锢,重新确立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邓小平来说,他所必须遵守的“经”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他所行的“权”则是面对中国贫穷的基本国情、面对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他所要突破的则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左”的错误路线、“两个凡是”的禁锢,它们一度是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邓小平始终坚信,过去搞革命取得胜利,要靠实事求是,现在搞现代化建设,也还要靠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疑可以成为邓小平“改革的第一个号令”<sup>①</sup>。邓小平十分坚信:“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sup>②</sup>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一味唯书是从、唯别国是从,既没出息,也没出路。跳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逻辑关联,13亿中国人所从事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的一次应用、一个落实,毋宁是一部活的历史,其本身也在创造一种崭新的现代化经验。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念始终扎根于中国自己的现实土壤。邓小平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sup>③</sup>过去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sup>④</sup>,在今天仍还有效。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低工资、高就业,是中国工业化不得不走的道路,即便有苦痛,也得忍着点。因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sup>⑤</sup>。而始终

---

① [德]康拉德·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许文敏、李卡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④ 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被放在重要核心位置予以高度强调的中国国情又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生产力落后并且发展不平衡，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建设了30年，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现实情况。但同时，中国块头大，幅员辽阔，属于“大陆型实体”，东边不亮西边亮，经济发展互补性很强，整个社会的自组织性也很强，因为它有充分的自我调节能力，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一两个统计指标。所以说，在中国，“办事困难很多，但是有希望”<sup>①</sup>，这一现实情况应该成为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在中国，干什么事，心里都要装着这个底子。忘记这一点，必败无疑。

然而，指出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并不是要否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相反，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强调，国外有学者甚至直接把邓小平视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sup>②</sup>。在邓小平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sup>③</sup>。过去革命成功、建国立国所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搞现代化建设，也绝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能把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不能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做是改革开放的障碍。

建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如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及今后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根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② [俄]Л·Д·杰柳辛：《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本任务,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等等,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鲜活气息和有机内容。邓小平理论显然有别于指导中国革命历程的毛泽东思想,它有自己独到的使命、视角、内容甚至表述方式,完全可以称得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改革开放的成功、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其政治意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黄金时代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建立在对外进行殖民掠夺的基础上,中国的迅速崛起完全依靠改革开放的英明国策,依靠全体人民自力更生、自我发展来完成,具有很大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在其直接效果上成功地避免了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如大规模农民流离失所、难民潮的大量涌现、疾病瘟疫的肆虐、贫富两极分化或过度城市化、全面动乱与内战。相比而言,今日中国所走的道路成就最大,代价最小,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所以,当代中国人正在从事的现代化实践,客观上也在创造一种新的经验、新的发展模式,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从而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我们在不经意间履行着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

## 四、精神资源整合与文明重建

30 多年来的国际社会里,已经没有人否认中国的崛起,但中国时至今日的崛起似乎主要还只具有物质财富、技术层面、硬件的性质,如 GDP 的世界占有量、国民生活水平指数的迅速提高、中国产品的世界

覆盖率、华人人口的全球流动。至于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则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奏效,中国人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对于现行的国际体系而言,任何一支非西方力量的崛起无疑都是一个例外。中国的崛起让西方感到惊讶,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几乎无异于一种冒犯。所以,21世纪的中国必须解决国家力量迅速发展之后所随之而来的文明问题,换言之,中国要想发展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必须在两大方向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超越:一是中国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更高、更具有优越性的文明,二是中国所主张的全球体系能够被普遍接受。无疑,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决定着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而第一个问题又绝不只是简单的“中华文明的复兴”所能够了结的。

2008年7月13日,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塞巴斯蒂安·海尔曼在《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上指出:“中国人脱离了西方的模式,他们致力于一种与传统、现代和民族主义元素有关的新领导模式。某些思想先驱完全公开地说,现在我们在建立一个自己的制度,我们不要个人主义、多元论和西方的自由概念;相反,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关心我们的国家,它通过定期磋商的方式而不是选举的方式与公民的意愿相连。”<sup>①</sup>

的确,中国不应该只满足于物质财富在30多年的直线增长,而应该像它在历史中曾经起到过的作用一样,积极倡导并创造出一种新型文明体系。具体到精神资源层面,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与重建,今天的我们则必须面对与处理的主要是三大道统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现代化、传统文化、社会主义。

---

<sup>①</sup> [德]塞巴斯蒂安·海尔曼:《中国人不久将把我们甩下》,《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2008年7月13日。

现代化是一种发源于西方的生产与生活运动,中国人无疑也在追求现代化。传统的历史与文化积淀,是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丢却和放弃的精神家园。而社会主义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方法、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国家体系,通过60多年的意识形态作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理想追求。积极整合现代化、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道统应该是重建中华文明的重要切入点。而这三大道统又可以有机糅进中国人学习现代化、推行现代化的实际过程中,特别值得研究的是我们由传统进入现代的方法路径。改革开放的文明成果,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起点。换言之,正因为30多年的充分发展与积累,使得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反思我们自身文明的缺失,探讨中华文明复兴与重建的现实路径。<sup>①</sup>

中国肯定是需要现代化的,甚至只有现代化才是中国强盛的唯一出路。实现现代化是近世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光辉梦想,走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人在历史与现实双重层面上所作出的理智选择。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至最近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几乎近代史以来的每一段进程都打上了中国人追寻现代化的沉重脚印。战争不能使中国完成现代化,同样,革命也不是通向现代化的直接路径。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挫败之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真正把中国社会领上了现代化的征途。

西方人的现代化得益于西方现代科学的推动,中国人要实现现代化就不能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西方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又是在西方哲学理性精神的支持下进行的。中国人要接受直至发展现代科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精神准备。西方哲学的那种清晰的理性精神一

---

<sup>①</sup> 余治平:《新中国六十年与重塑民族魂》,《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直为中国人所阙如。晚清至五四时代,内忧外患下的中国人议论救亡图存,一开始以为只要把洋人的坚船利炮“拿来”即可;后来却发现,与洋人的坚船利炮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还应该有洋人的政法制度;不止于此,再后来又发现,还应该包括洋人的思想观念。今天的中国人要全面地吸收、利用甚至接着西方现代科学所开创的道路发展下去,恐怕也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其实,科学不仅仅是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器物,它毋宁是一整套的系统工程。同样,引进科学,并不是说“拿来”、马上就能够“拿来”的。

中国人在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也没法丢。儒家传统资源中,内圣与外王,既是儒家人格的终极理想,又是儒学实践的核心内容;既是儒学的本体论,又是儒学的方法论。儒学史上,圣、王的分途大约始自孔子以后,颜回、子思、孟子似乎可以归为内圣一路,而子张、荀子、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则明显有外王的趋向。内圣之学所关注的是道德实践主体的主观自觉,以为一切都依赖于源自本我的“不忍人之心”;而外王的兴趣则在于从客观制度层面来实现对道德实践主体的限制,只有社会、政制、教化的礼法规范才能够切实保证道德原则的最终落实。中国的传统精神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两个不相等同的系统,中国的传统精神是道德性的,建基于人的价值领域,强调的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意义。而现代科学则是物性的,发生在对象世界里,以客观存在为基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真理。让道德理性去开发、延伸出纯粹知性,在根本上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即使开发、延伸获得了成功,也不会有什么客观、公正、绝对性的真理知识。看来,内圣之学与现代科学的距离似乎更为遥远。《庄子·天下》曾说:“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然而在今天看来,即使内圣、外王之道既“明”且“发”,也无法创造出科学昌明的局面,甚

至连与现代科学衔接都不能够。

如果说传统儒家对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还具有潜在的价值支撑作用,但在思维准备与方法论自觉的意义上,从传统哲学资源过渡到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对于中国人来说明显存在着一个断裂层。社会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最终可能会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上留下点什么印迹?中国的学者们常常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一致性去理解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中国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而往往忽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其实,正是两者之间的异质性,才能够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文化心理固有缺陷的纠正与弥合。中国人如果要以自觉、积极、有为的而不是盲目、被动甚至无可奈何的态度去接受西方的现代科学,其方法论基础应当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哲学资源的局限,极大地凸显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巨大价值。

马克思主义源自西方,属于现代哲学的行列,从发生的人文背景、地理区域、历史时段等方面说,与现代科学之间都有着本质的一致性和可沟通性。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径直把现代科学的发展作为自己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马克思说过:“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sup>①</sup>。现代科学被理解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传统中国学术几乎从没有正眼瞧过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根本不将其列入研究对象,而是常常斥之为“奇技淫巧”。但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sup>②</sup>,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2页。

传统中国学术的基础是人生生活经验,当然也与社会相关联,但多只涉及社会的政治、伦理层面。传统中国学术有贵族化的倾向,它并不经意于社会生产。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只在情感上同情底层民众,而并没有对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的理论探索,所以,中国古代就不可能有专业化的经济学、社会学。同样,科学与技术只能总处在下里巴人的地位。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现代科学当做自己理论基础的自觉态度形成了鲜明比照。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如果从中国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还给我们送来了先进的方法论基础。既然现代化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切的现代方法论基础,而内圣外王的固有文化传统又不能提供这一基础,那么,我们就只有开拓视野,到更为广阔的世界文明范围中去搜寻。今天,随着政治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被大规模地输入中国。

当代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这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sup>①</sup>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正以不同的方式、多维度地渗入我们的灵魂,它已经进入全部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并且,还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体现于我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之中,甚至也已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能否在方法论的角度上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被动接受转变成为自觉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科学发展进程的缓急以及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所以,在现阶段,社会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值得大张旗鼓地宣传与普及。

---

<sup>①</sup> 钱学森:《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最大思想成果就是中国人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未来中国的发展无疑也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已不可能仅仅照搬马克思经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范型,中国的社会主义首先确立在对现实与未来的承诺的基础上,它首先能够为 13 亿中国人树立属于自己的理想,它追求建立一种比以资本为基础、以牟利为动机的社会更具有公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sup>①</sup>其次,未来社会主义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与社会安排,解决全部社会成员的教育、工作、就业、医疗、养老等人生问题,进而实现普通民众能够最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拥有对劳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最后,社会主义还应该是一种文化,应该是全体公民在继承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基础上的一种健康向上、自信自尊的精神风貌。显然,这种社会主义不应该使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里孤立于西方,甚至与西方形成尖锐的冲突与对立,也不应该遭到世界的冷眼与拒绝,它可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而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演绎成为广泛而真切的现实运动,表明中国人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尊重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吸收西方而又超越西方,描绘一种崭新的社会愿景,进而也正在履行着一项伟大、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尽管它刚刚揭开序幕。

---

<sup>①</sup> 参见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0 页。

## 后记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价值观在内的精神因素在中国发展中的动力作用的最好表达,同时也为新形势下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

我们最初选择这一课题,挖掘和表现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是为了总结和纪念中国人的精神对发展作出的贡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文化发展的总体部署之后,我们对这一课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归纳,是为了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出发,在新形势下塑造我们的精神文化,使之不仅作为中国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

全书共包括十一章,本着历史叙述与理论理解相结合的设想,从“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和“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这三个角度或三个层次出发,梳理和探讨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

参加本书撰写的主要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童世骏提出全书编写设想,并组织讨论确定编写大纲;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何锡蓉具体落实课题实施,并协助童世骏对书稿进行通读和定稿。全书各章的具体分工如下:何锡蓉(第一、三章),夏继森(第二章),李庆云(第四

章),侯伟东(第五章),马庆(第六章),姜佑福(第七章),朱雯霞(第八章),张文明(第九章),李元(第十章),余治平(第十一章)。

课题初稿约 28 万字,经统稿修订后,总体构想和基本框架大致未变,但在内容上做了很大的调整与更新,各位作者对各自负责的部分进行了增删和修改,特别增补了中国发展和精神动力方面的内容,包括文化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民族自信等。总字数虽有减少,却不失精华呈现。

何锡蓉

2012 年 7 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序言

上篇 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

第一章 打破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

- 一、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道路
- 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突破极左思想束缚的艰苦努力
- 三、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 四、不同领域的思想解放

第二章 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

- 一、物质生活、个人利益和主体意识的重新认识
- 二、打破“大锅饭”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 四、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第三章 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一、辉煌的古代历史与屈辱的近代遭遇是中国人民爱国为国的精神源泉和动力

- 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
- 三、海外侨胞同心支持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资源
- 四、中国要对世界有更大贡献

第四章 巩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 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制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 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 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
- 四、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篇 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

第五章 坚忍不拔，艰苦奋斗

- 一、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二、普通劳动者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 三、在国际国内风浪面前清醒而又顽强地扎实奋斗
- 四、中国达到“小康社会”以后仍然需要艰苦奋斗

第六章 大胆尝试，勇敢闯关

- 一、打破小生产方式和计划经济模式的习惯思维
- 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体制和机制

- 三、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 四、政治勇气和历史责任的高度统一
- 第七章 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 一、重视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 二、改革开放时期执政党的“学习”品质
  - 三、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的“学习”品质
  - 四、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通百姓的“学习”品质
  - 五、“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
- 第八章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 一、“三省吾身”、“居安思危”的民族传统
  - 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 三、成绩面前特别要防止骄傲自满
  - 四、“风险社会”中更要有忧患意识

## 下篇 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

- 第九章 改革开放的精神效应
  - 一、人们对现在生活的感受和评价
  - 二、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信心
  - 三、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状况
  - 四、人们对人生和命运的看法
- 第十章 当代中国的文化张力
  - 一、拉动消费与艰苦奋斗
  - 二、提倡创新与脚踏实地
  - 三、与时俱进与坚守信念
  - 四、宽容多样与把握导向
- 第十一章 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
  - 一、大国崛起与大国责任
  - 二、和为贵：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支撑
  - 三、中国道路的形成与价值贡献
  - 四、精神资源整合与文明重建

后记